

C H I N A S P R I N G

中國之春

劫機事件的幕後交易

中國大陸外交密件

中國之春部份留學生
座談紀要

王希哲 (電影文學·續)

一個「內定右派」
的控訴

總第 5 期





	新舊「洋務運動」	本刊編輯部	2
國內動態	劫機事件後面的骯髒交易 (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密件」)	本刊評論員	3
	我也來編一本「鄧小平文選」	(北京)柳平	5
	「新生活運動」和「五講四美運動」 (附：人民日報文章「新生活運動」)	本刊資料室	6
留學生園地	中國之春部分留學生座談紀要	本刊資料室	7
	二次留學有感	(訪問學者)劉振	15
	給胡耀邦的一封信	(留學生)南明	16
思想論壇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局限性	沙林	19
	新的好還是老的好	(紐約市)瓊旺	26
	評「包產到戶」	(芝加哥)怡文	29
大陸專欄	第二次「上山下鄉」	蜀申	38
	專政之下，豈有民主？	(留學生)陳偉	40
台灣專欄	韓愈是中國人嗎？	丁修伯	42
香港專欄	肥羊、狐狸和野豬	(舊金山)生	44
	中共秘密審判何時了	言	46
祖國未來	「聯邦制」的異議	曉	47

	談「一黨專治」和「兩黨共治」……………望 雲……………48 轉載自紐約「華僑日報」
來信摘登	售地於民……………(香港)徐 中……………50
	沒脫「文革」窠臼……………中 光
	致海外僑胞……………(英國)萬 鈞
	一花獨放不是春……………波士頓一讀者
	我是炎黃子孫……………(香港)勇 兵
	「朝氣」和「衝動」……………林 國
	「同志」……………蜀 申
雜 文	政躬康泰，胡先生。……………小 林……………53
	笑談「幹部年輕化」……………吳儉祥……………57
	從「獄」字談到言論自由……………(波特蘭)千 山……………58
特 稿	一個「內定右派」的控訴……………(波士頓)謝志揚……………60
文 藝	還望把根生(詩)……………(北京)一個老「民運」成員……………18
	化 石(散文)……………(英國)土 申……………67
	王希哲(電影文學)(續)……………小 楓……………68
封 面	萬萬歲!(雕刻)……………(北京)王克平
	——原載北京之春時期「星星畫展」
封 底	爭取更大勝利(攝影)

新舊「洋務運動」

本刊編輯部

一九八〇年前後，國內一批學者曾掀起了一陣為李鴻章等從事的洋務運動翻案的熱潮。鬧騰了一陣，突然冷了下來，不了了之。大概是有嫌於破壞了新洋務倡導者鄧小平的政治形像與聲譽之故，頗有點麻子怕人提起豆子的味道。

其實，形像與聲譽事小，經驗與教訓事大。回顧一下清末洋務的來龍去脈，與鄧小平的改革作個比較，我們發現，新舊洋務運動雖然不是歷史的簡單重復，但其相似之處，却令人驚訝不已。因而，這種比較無疑有利於加深我們對「鄧小平改革」的認識。

新舊洋務運動的雷同是顯而易見的。第一，國內的背景相似。當年有個專制的西太后，愛搞思想控制，愛操縱派系鬥爭，熱衷於「聖旨至上」。今天，剛剛把一個嗜好鬥爭的愛發「最高指示」的一代風流皇帝送上西天。清末的統治集團腐敗，經濟凋蔽，滿漢矛盾加劇。現今，是文化大亂之後，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共產黨特權階層與廣大無權的百姓的矛盾日益尖銳。第二，國際背景也相似。原來自以為天下之中的中國大清帝國由於長期閉關自守，突然被發達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戳破了外強中乾的假面具。於是外來的侵略與侮辱接踵而至，共產黨在取得了政權之後，也採取了關起門來自吹自擂的態度，大叫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全世界的希望」；事實上却是政治運動迭起，經濟長期落後。與此同時，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飛躍的發展。中國共產黨虛假的「優越性」與「希望」一旦破產，三信危機頓時四起。第三，新舊洋務運動出現了政治色彩相像的人物。當年有鐵桿保皇的，有主張君主立憲改良的，也有搞民主革命的孫中山先生等。而今則有所謂「凡是派」，有搞四個現代化的鄧小平，同時也湧現出一批為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吶喊的青年人。第四，

新舊洋務運動的措施也很相像，無非是向外派官員考察，派留學生學習以及從國外引進科學技術等。

耐人尋味的是，當年的洋務運動有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針。當今則有所謂「四個堅持」下的「洋為中用」，共產黨的意思，是要在四個堅持的大體之下，僅僅去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和技術，用現代化了的生活來收買人心，穩定失去民心的政權，從而反過來進一步加強「四個堅持」。孰不知，西方科技的引進，官員的出訪，特別是大批留學生的派出，勢不可免地要帶進西方的人權思想、民主觀念和法制要求等。先進的科技和先進的思想政治是不可分割的，相輔相成的。特別是對於中國的情形，落後的經濟完全是由於落後的政治造成的，豈可捨本逐末？

事情的本質是，舊洋務是為了解救和加強皇室的統治，而並非欲造福於民；鄧小平的新洋務恰恰重復了這致命的一點。用共產黨的高於一切取代皇室至上，用共產黨立憲取代君主立憲，歷史並沒有前進多少。將皇室或黨的利益於人民利益之上，欲以引進先進科技來「錦囊牆，雕朽木」，其下場不會有異。即使造成一時興旺發達的假相，假相也難持久；而人心的向背是終究不會為這一點假相所滿足。假相遲早要識破，人民的忿懣遲早還要爆發出來。

其實，鄧小平並非共產黨內搞洋務的鼻祖。毛澤東開國時的向蘇聯老大哥學習，也可稱為一種「洋務」。那一場「洋務」的下場已是見了分曉了的，無須贅述。我們複習一下這幾段歷史，就不難對鄧小平的改革的前景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我們絕不反對向外國學習，相反，我們認為向外國學習一切長處都是必要的。我們反對閉關自守，反對搞國粹，同時，我們也反對那種以假相迷惑人民的和為加強專制而進行的洋務。

劫機事件後面的骯髒交易

本刊評論員

一九八三年五月五日，中國大陸一架民航班機被騎劫到南韓，導致了一九五〇年韓戰以來，兩個交戰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第一次的官方正式接觸。政治現實就是如此戲弄了歷史，六個老百姓的行爲，導致了敵對了三十年的兩個交戰國的碰杯。

(一)

中國大陸和南韓沒有邦交。三十年來，中國大陸不承認南面的「大韓民國」，只承認北面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南韓也不承認大陸方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承認台灣方面的「中華民國」。在這種情況下，劫機事件按國際慣例，應由第三國出面交涉。

然而，雙方都沒有這樣做。

騎劫的飛機著陸時，南韓全部報章發表的新聞用語是「投誠」。但八小時後，一齊改為「劫機」。這裡的奧妙是，「投誠」應同台灣打交道，「劫機」則應按國際協定處理。南韓先向中共拋出微笑，給了「反共盟友」台灣一個難看，這是由於南韓有其外交和經濟上的考慮。今年二月份，全斗煥總統提出了「交叉外交」，即面臨北韓加強對美日的外交，南韓應針鋒相對地加強中、蘇的外交。在經濟上，中國與南韓的貿易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〇期間曾嘗試過打開僵局（按香港統計局資料，中韓的秘密貿易額達十六億九千九百萬元，折合二億多美元），但從一九八一年至今，却因北韓的壓力在一直收縮，對南韓來說，損失最鉅的是煤的貿易。

天上飛來的鴻鵠是一個「契機」。吳榮根事件沒有打開的渠道，却被這架劫來的飛機打開了。

(二)

中國接住南韓的這個繡球，中國民航總局局長沈圖迫不及待地於當天就發出了回應。原因很簡單，機上有近百名乘客和一大批高幹，還有一些重要文件，一旦發生新的外逃事件，後果不堪設想。權衡得失，中共馬上犧牲了自己多年來的「盟友」北朝鮮，不顧共產主義事件中的所謂「無產階級國際

主義」原則，不假第三國之手，直接派出代表團（內有大量保衛幹部），到南韓簽訂了協議書。在申請入境時，中國稱南韓為「大韓民國」，南韓官方和報章稱中國大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最後簽字者的官銜稱呼上，都用上了這種可以把北韓和台灣氣昏的字樣。

南韓爲此而表現出壓抑不住的興奮，報章盡力渲染這不是一次「單一行爲」，而是「國與國」之間的正式「外交行爲」。南韓官方對中共做了許多妥協，諸如送還飛機和全部乘客，對中共官方代表團盛情招待，甚至爲了使飛機能從春川機場起飛而令附近四千居民暫時遷離，並保證完全按照「刑事法例審判六名劫機者」。

(三)

然而，這只不過是南韓的一廂情願而已。在外面世界生活的人們，從來都低估了中國當局的權術能力。一步得手之後，中共馬上就把外交微笑收回。五月二十日，中共派出外交部長吳學謙親訪北韓，進行一連串的「解釋」工作，其中包括對美國和南韓的攻擊，對北韓的支持，以至給予一些虛偽性的「安撫」等等。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總部」最近獲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的一份密件，揭示了其中某些內幕。這份密件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五月十五日給北朝鮮駐北京大使館的一封信（原件附後）。

(四)

爲使全世界了解中共在劫機事件中的骯髒交易，我們決定公佈這份密件。這份文件，至少可以告訴人們如下幾個問題：

第一、中國政府在劫機事件的處理中，愚弄了南韓當局，中國政府在信中稱：「關於南朝鮮利用該一事件（指劫機）藉機向中國要求建立正式聯繫的所有對話，均係南朝鮮單方面一廂情願的自說自話。」這段文字，充份反映了中國政府對南朝鮮當局不屑一顧的輕蔑態度。回想劫機事件發生時，中國民航總局局長沈圖急忙致電南韓政府，尊稱對方

為「大韓民國」。會談中，沈圖等更是竭盡討好對方之能事，以微笑、握手造成親善假象。中共的這種伎倆，乃為了達到他們的二個目的：其一、利用南朝鮮急切想與中共建立正常關係的心理，盡量拉攏南朝鮮與中共合作，以圖將飛機、乘客及劫機者盡快索回中國，平息事態；其二、挑撥南朝鮮與台灣當局的關係。

中國共產黨的一貫作法是，一旦目的達到，就立刻翻臉不認人。這份文件把中共的這種伎倆揭露無疑。

第二、中國政府的反美外交基調並未改變；毛澤東給中共制定的全球戰略是反對美蘇兩霸，而自己要稱霸於第三世界。鄧小平實行開放政策，向美輸送留學生後，很多人幻想中共外交政策已走上親美路線。這封密信再次給持這種幻想的朋友們以有力的警告。此信把美國仍稱為美帝國主義，把朝鮮問題歸因於所謂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干涉。這種陳辭爛調除了欺騙中共自己和安慰北朝鮮外，已不能再蒙蔽任何人，包括我們從中國大陸出來的留學生。朝鮮問題的產生，有著複雜的歷史根源和國際背景，決不像我們在國內一直聽到的中國共產黨單方面宣傳的那樣，乃由於美國主動出兵侵略朝鮮半島產生的。事實上，當年北朝鮮主動進攻南朝鮮，才

直接觸發了韓戰的發生。後來，聯合國軍的介入，使問題更趨複雜化了。

從文件表露出的中國政府對歷史和美國的態度可以看出，中共反美外交基調並未改變。

第三、中國政府供認劫機事件是政治事件，不是刑事事件；在密信中，中國政府稱卓長仁等劫機者為「反革命份子」，並未稱為「刑事犯罪份子」；稱劫機事件為「反革命事件」。眾所周知，「反革命」是中共迫害持不同政見者的專有名詞。這說明，中共始終認為，卓長仁等的行動是帶有政治目的的行動。七月十八日下午，劫機者卓長仁等在南韓漢城法院也自稱「我們奪機完全是為了投奔自由，我們本意不想傷害任何人。」中國政府對劫機事件的看法與卓長仁等的看法是一致的，即都認為這並非是一場單純刑事案。既然如此，劫機者的人權問題就必須嚴肅對待。他們不應成為外交上骯髒交易的犧牲品。該事件亦說明，中國大陸內人民不滿共產黨一黨專政，從而設法擺脫其高壓控制，已達到不擇手段的程度。

我們一再告訴人們，不要對中國共產黨決策人抱什麼不切實際的幻想。中共在劫機事件外交上玩弄的伎倆，或許會給那些幻想派再服一次清醒劑吧！

往電第 413 號別 FAX 信 GD0396-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83) 外電第 31297 號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駐華大使館：

謹就貴國外交部部長許德遠請中國外交部部長許學謙前往訪問事通知貴國使館：

一九八三年五月五日，反革命分子卓長仁、安福偉等六人，以武力劫持中國民航飛機到南朝鮮半島，這一嚴重的反革命事件造成很壞的影響和不良後果，中國政府應責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許德遠，特派外交部部長吳學謙與部長助理羅運濤司長劉述卿等一行，前往貴國說明並澄清以下問題：

說明中國民航局長沈圖和他率領的工作組與南朝鮮方面的代表交涉歸還被劫飛機的經過。中國方面堅持南朝鮮應依照中國法律和有關國際公約的規定，將人機包含六名劫機罪犯全部交還中國依法懲處。南朝鮮方面聲稱已決定將劫持的飛機包括旅客和機組人員，俟技術問題獲得解決後歸還中國，六名罪犯由南朝鮮進行審訊和實施法律制裁。中國方面對此表示

GD0396-2

遺憾，聲明保留進一步交涉的權利。雙方就各項問題簽署一分备忘录。

關於南朝鮮利用該一事件借機向中國要求建立正式聯絡關係的所有對話，均系南朝鮮單方面一廂情願的自說自話，與中國堅定立場毫無干係。中朝兩國應緊密携手，克服南朝鮮統治者心態，謀求貴我兩國共同利益。吳學謙部長此次前往貴國携有鄧小平同志致金日成主席賀電信一封，並發表表明中朝兩國革命友誼牢不可破的談話，以證明中國仍將一如既往地支持朝鮮人民完成祖國統一的偉大事業的立場。談話要點如下，請貴國外交部同查。

一、目前的朝鮮南北分裂局面和緊張對峙局勢，完全是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干涉所造成的。這同朝鮮人民的民族願望背道而馳。

二、美國應該把它的軍隊撤出南朝鮮，停止干涉朝鮮內部事務，這是結束人為分裂局面和緊張局勢的根本辦法。

三、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將一如既往地，堅決支持朝鮮人民為實現國家自主和平統一和反對製造「兩個朝鮮」所做的不懈努力。

GD0396-3

四、我們相信，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朝鮮人民統一祖國的偉大事業是一定能夠實現的。中國人民非常珍視同朝鮮人民的傳統友誼，並決心把我們兩國友好關係千秋萬代地發展下去。

吳學謙部長訂於五月二十日啟程赴訪，隨員名單另告。

以上請即轉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請聯繫並安排有關事項。

順致崇高的敬意



我也來 編一本 「鄧小平文選」

柳平

今年的七月初，北京是非常炎熱的，今年又缺雨，實在難過。由於北京乾旱，供水也成了問題，有幾日我們必須在上班前把自來水接好，否則，下午下班時無水供應，晚上就吃不上水。

今年七月初，北京的政治氣氛也是空前炎熱的，主要是由於學習「鄧文選」的熱潮沖擊而造成，熱熱鬧鬧的新的造神運動正在北京興起。

「鄧文選」一出，市委就下了通知，各單位黨委立即緊跟，將組織對「鄧文選」的學習，當做頭等大事來抓。雖然比不上毛澤東時代的早請示，晚滙報，但學習規模，確實是毛死後最大的。華國鋒當年身兼黨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也沒想起來搞這個玩藝兒。北京人議論說，鄧小平看來年齡也太大了，像毛晚年一樣糊塗了，否則不會搞新的造神運動。的確，什麼事情一搞過了頭，就會走向反面效果，神一旦造起來，也就標誌着他人間生命的結束。

我的一位朋友在海軍大院工作。一次，我們在一起閒聊，我問他海軍大院和海軍系統對「鄧文選」的反映。他的話簡直使我吃了一驚，他說：「說實在話，海軍大院對「鄧文選」不怎麼「感冒」，（北京人說對某某人或事不感興趣，常說不「感冒」，是看不起的貶義提法），我們部裡也組織學，可是大家一邊學，一邊挑裡面的笑話。有位老兄更有

趣，有一次他在小組討論會上說，如果讓他編一本「鄧文選」，保準比現在這一本暢銷。

我忙追問道：「你們那位老兄編什麼樣的『鄧文選』？」

他說，他編的『鄧文選』至少要收集四篇文章：第一，鄧小平第二次復出前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寫的檢。鄧在那篇檢中明確提過不翻三案：不翻歷史的案、不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不翻黨中央給他做的結論的案。

第二篇是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前寫給華國鋒和黨中央的信，在那封信中，鄧高呼華國鋒為英明領袖，肉麻吹捧華國鋒可以帶領我們的黨走廿年。還指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正確的，自己有錯誤就是應該批等等。總之那封信除了沒有說給華國鋒下跪外，好話都說盡了。

第三篇要選鄧小平1978年底接見一位法國記者的談話。他在那次談話中同情在西單民主牆貼大字報的群眾，說群眾有氣，就要讓他們出。

第四篇要選1959年廬山會議上鄧小平批判彭德懷同志的發言。那次，聽說鄧小平的調子相當高，充當了毛澤東打擊彭德懷同志的急先鋒……。」

聽完後，我心裡琢磨，如果這個「鄧文選」一出，一天就不只賣出幾萬本了，恐怕要賣它幾十萬，幾百萬本。要是在出版自由的國家，這個出版商一定會掙大錢。

我在海軍大院的那位朋友最後講：「歷史從來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鄧小平文選』的編寫，也是一種編寫『歷史』。鄧小平既然宣稱自己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就應該面對自己過去的歷史。第一本文選就要反映這種真實的歷史。把那幾篇東西登出來，讓大家鑒別自己是個什麼樣的東西，那才是強者。否則，等著鄧死後由別人再出另一本『鄧文選』，其下場連老毛都不如了。」

我不只一次聽到海軍的朋友對我發鄧小平的牢騷了。有時連我自己也搞不清：鄧小平是心胸坦蕩的政治家？還是要盡手腕的政客？



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國共產黨開展了「文明月」活動，大搞所謂「五講四美」。五講是：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四美是：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

今年三月，正值學習雷鋒運動廿周年，中國共產黨再次提倡「文明月」活動。與去年不同的是，這次除了「五講四美」外，又加上了「三熱愛」：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

為了將「文明月」活動持久開展下去，中共中央還成立了「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委員會」，各省市也立即效法成立。

頓時，全國街頭巷尾，紅綠標語，大會小會，好不熱鬧。

正當三月份「五講四美三熱愛運動」走向高潮的時候，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於三月十一日突然在「學點國史」的專欄內，刊出了「新生活運動」一文，全面地介紹了當年國民黨政府為重整道德、改變社會風氣的所謂「新生活運動」。我們讀到該文，情不自禁地拍手稱快！這篇文章的

刊出，真是正逢其時！要知道該文的妙處，只要做幾處小小的改動，便可清清楚楚：

新生活運動	改為五講四美三熱愛運動。
學點國史	改為學點中共黨史
國民黨	改為中國共產黨
蔣介石	改為鄧小平
1934年2月	改為1982年3月
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	改為五講四美三熱愛委員會。
地主、大資產階級	改為中共官僚特權階級。

這樣小小一改，你便知道該文的高妙用意了。「人民日報」的這篇文章告訴了全國人民：歷史是往往重復的，面對今天中共的「五講四美三熱愛運動」，應該好好回憶一下當年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正像「新生活運動」未曾挽救國民黨的失敗一樣，「文明月」運動也不能使共產黨起死回生。「人民日報」和「參考消息」中時有幽共產黨一默的好文章。海外輿論界應該注意到這種動向。



新生活運動

原載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一日《人民日報》

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在江西南昌發起了他所謂的重整道德、改變社會風氣的運動。這一運動從改造國民的生活習慣着手，所以命名為「新生活運動」。

蔣介石發起新生活運動並不是偶然的。1934年初，蔣介石面臨內外交困的統治危機。這種危機表現在：一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已成燎原之勢，紅色政權遍布南方各省，并日益向前發展；二是從「九一八」事變東三省淪陷以來，日本侵略者向關內步步進逼，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國內抗日反蔣的浪潮不斷高漲。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深感單靠軍事鎮壓和政治欺騙已經難於維持統治，為了擺脫這種困境，就求助於另一種力量，即精神的力量。於是，一個以中國封建道德「禮義廉恥」為基本精神的所謂新生活運動，在蔣介石的大力提倡下開展起來。

新生活運動開始後，在短短的四個月內，蔣介石連續六次發表長篇演說，並頒布了《新生活運動綱要》、《新生活須知》等文件。這些演說和文件，對新生活運動的目的、內容和方法作了詳盡的說明，形成蔣介石關於新生活運動的一套理論和方針。

新生活運動的目的，按照蔣介石的說法，就是通過恢復中國的固有道德「禮義廉恥」，來革新個人，進而改造社會，最後達到民族的復興。蔣介石援引中國古代管仲講的「禮義廉恥，國之四维，四维不張，國乃滅亡」，提出復興民族的「最重要的根本前提」，就是恢復中國固有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實踐「禮義廉恥」四德。他說：「新生活運動是一個以道德的復活，來求民族復興的運動。」

新生活運動的內容，第一，以「禮義廉恥」為基本準則。所謂「禮義廉恥」，蔣介石解釋為：「禮」是規矩規矩的態度，「義」是正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在這里，蔣介石特別強調「禮」為四德之首，并把「禮」解釋為循規蹈矩，嚴守紀律，這同歷代封建統治者崇尚「禮治」，以防止「犯上作亂」，維持封建秩

序，是一脈相承的。第二，以改造國民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為實行起點。這是新生活運動的主要內容。為了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蔣介石把「禮」同資本主義國家的文明禮貌結合起來，並在《新生活須知》中作了具體規定。如：「披上鞋跟，扣上鈕釦，『集會入室，冠帽即脫』，『走路靠左，胸部挺起』，『噴嚏對人，吐痰在地，任意便溺，皆所禁忌』；公共場所，遵守紀律，就位退席，魚貫出入」；「閱國歌歌，肅然起立，約會守時，做事踏實」；等等。第三，以「軍事化」為最終要求。這是新生活運動的最後指歸。所謂「軍事化」，就是通過新生活運動，使全體國民的生活、行動以至於思想，都能夠根據「禮義廉恥」的精神，按照「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六項標準，做到「整齊劃一」的程度。這種「整齊劃一」，按照陳誠在《新生活運動要軍事化的真諦》一文中所解釋的，就是「在一個政府，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之下，絕對的統一，絕對的團結，絕對的服從命令」；顯然，這正是當時盛行於德意兩國為蔣介石建立獨裁統治所需要的法西斯主義。綜上所述，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既以中國的儒家教義（四維八德）為基準，又吸取了資本主義的精神文明的某些形式（文明禮貌）和德意的法西斯主義（整齊劃一），是三者相混合的產物。其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明禮貌的某些形式是沒有階級性的，各個不同的階級都可以適用。但蔣介石則利用它來欺騙人民。

新生活運動大體上經歷了三個時期。（一）創始時期。從1934年2月南昌倡始至1934年7月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成立。這一時期，以江西省為試驗，主要是創立新生活運動的理論，制定各種章程，并由蔣介石親自出馬，大造輿論。（二）發展時期。從1934年7月總會成立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這是「新運」工作推行到全國各地的時期。總會最初設在南昌，后遷往南京。由蔣介石任會長，宋美齡任婦女指導委員會的指導長，何應欽、陳果夫、張群等為總會指導員，錢大

鈞、鄧文儀為正副主任幹事。全國共有20個省和四個直轄市成立「新運會」，省之下又成立1,355個縣「新運會」，形成了遍及全國推動新生活運動的網點。這一時期，新生活運動雖然噱頭熱鬧一陣，可是實際效果却很差。正如蔣介石在《新生活運動二周年紀念之感想》中所講的：「我們現在到處都可看到新運的標語，而很少看到新運的實效」。為此，他悲嘆道：「雖經兩年之久，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不但如此，簡直可以說洋運無法，……這是很可痛心，很可惋惜的』」（三）衰落時期。從1937年抗戰開始至1949年國民黨政權垮台，這是新生活運動由衰落走向消亡的時期。抗戰期間，由于蔣介石撤退南遷，丟失大片國土，多數省市的「新運」工作陷於停頓，少數有「新運」組織的地區，也都轉移方針，側重於戰時服務工作的開展。日本投降後，總會由重慶遷回南京。這時國民黨政權已腐敗透頂，又發動全面內戰，完全喪失人心，所以新生活運動只是虛應文章，點綴門面，氣息奄奄地在那里苟延殘喘而已。1949年國民黨政權的覆滅，宣告了新生活運動的徹底失敗。

新生活運動究其本質來講，是反動的，是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的。新生活運動發源于南昌，其矛頭首先對着中央蘇區，以配合當時正在進行的第五次「圍剿」。蔣介石發起新生活運動固然以儒家教義為思想基礎，可是更為直接的思想來源，却是從鎮壓農民運動很有經驗的一代名儒王陽明和曾國藩的著作中吸取的。王陽明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曾國藩說：「禮」是「息天下之爭」的當務之急。據此，蔣介石採取「攻心為上」的方針，企圖通過一次恢復「禮義廉恥」的道德運動，來扑灭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的民主革命，阻擋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蓬勃發展。蔣介石既依附帝國主義并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人民實行法西斯專政，又高唱什麼通過新生活運動來革新個人，改造社會，復興民族，這樣的騙局必然是不得人心的，也是根本行不通的。蔣介石標榜新生活運動是什麼「心理建設」、「社會建設」，說穿了，不過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人民的思想統治。（任一人）

「中國之春」部份留學生 座談會紀要

本刊編輯部

編者按

一九八三年七月九日，「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利用暑假時間在紐約邀請了在北美留學的幾位中國大陸公自費留學生舉行座談。座談會由「中國之春」主編汪岷主持。留學生們對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前段開展的情況及今後面臨的問題廣泛地發表了意見。由於通知時間倉促，留學生們學習又忙，發言者未能做充足的準備，某些問題只是點到而未有談透。盡管如此，編輯部仍決定整理發表，以引起大家之討論，收到拋磚引玉之效。

座談會主要發言者如下：

汪 岷：中國之春雜誌主編
李大宏：中國大陸公費留學生
劉海健：中國大陸公費留學生
柯 楓：中國大陸公費留學生
施燕人：中國大陸公費研究生
朱 明：中國大陸自費留學生
李 毅：中國大陸自費留學生
易 平：中國大陸訪問學者
吳力明：中國大陸自費留學生

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舉辦
中國大陸公自費留學生座談會
座談會記要

汪 岷：「中國之春」民主運動開展半年多來，在輿論宣傳方面，我們對於「民主、法治、自由、人權」這個基本原則，作了一些討論。與國內聯絡的渠道也愈來愈多。在組織方面，我們在全世界十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廿一個聯絡站。這是第一階段所取得的成績。

現在形勢要求我們，必須把運動推向縱深，同時許多關心民運的同志都希望我們對當前形勢及任務有一個比較明確的闡述。今天我們召集這個座談會，就是想討論這些大家都關心的問題。我建議今天的座談，圍繞下列問題進行：

- (1) 單獨依靠國共兩黨是否能解決中國的現存問題。
- (2) 「第三勢力」形成的可能性。
- (3) 中國之春是否要提升為正式組織。

李大宏：我覺得「中國之春」既然是搞民主運動，就應該很自然地反映我們的各種看法，不要強求統一。搞民主運動也不是光靠幾個人，要傾聽其他同志的意見。我希望中國之春雜誌發表座談會紀要時，能反映我們的真實想法。

汪 岷：我完全同意，「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本身就是「多元化」，我們就是希望能聽到不同的意見。

劉海健：關於中國共產黨能否解決中國現存的重大問題，我看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願不願」的問題。依我看，它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保住它在中國的統治地位，它提出「四個堅持」

的目的就在這裡。我不認為它真正能夠把中國引向現代化、民主化，他們的目的是在於加強專政，鞏固權力。

柯楓：對中國共產黨大致有兩種看法：一、認為它原來是對的、是革命的，但後來起了質的變化。第二、認為它從一開始，基本理論就錯了。我傾向於後者，它的基本理論就不適合中國國情。

有人說，中共初期是朝氣勃勃的，所以它取得了政權。我認為這並不能說明它的基本理論是正確的。共產主義革命通常都發生在落後國家，封建性是這些國家的基礎，中國的封建性更是根深蒂固。孫中山推翻了滿清，並非是民主推翻專制，很大成份是依靠漢族人的民族意識。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不但沒有很好將反封建的革命進行下去，而且還在許多方面，利用反對資本主義來掩蓋其封建色彩，所以很多人稱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封建性的社會主義。

劉海健：我覺得中國的老百姓缺乏民主觀念，做順民的思想很重，這就是封建獨裁滋生的土壤。我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前景並不抱十分樂觀的態度，關心民運並為之奮鬥的人只是少數。

我不認為中共會很快滅亡，中國有比其它國家更有利於獨裁的土壤。從這個角度來說，民運是長期的。爭取民主人權是我們認定了的大方向，不管形勢如何，我們都要幹下去。中國之春可貴之處是開了這個頭，但不切實際的盲目行動，我堅決反對。

施燕人：我覺得中國共產黨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產物，它也和任何其它事物一樣，有興起、發展和衰亡的過程。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它取得政權之後，就開始走下坡。現在它走向衰亡最重要的標誌就是「三信危機」。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在它取得政權後，很快就走向衰亡呢？關鍵就是它維護了一套違反客觀規律、違背人民意願的政經體制。

從政治上說，它是「一黨專政」。社會由各階層組成，人的思想多種多樣，這就決定了政治必然是「多元」的。但是中國共產黨始終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去一統十億人的思想，現在還要「四個堅

持」，誰要反對它那一套，誰就是「反革命」。三十年的事實證明錯了的東西，它仍要堅持，這哪裡有一點人民性呢？

經濟要發展，也得按客觀規律。但它却奉行的是一套以長官意志為中心的所謂中央計劃經濟。大家不會忘記勞民傷財的「大躍進」及「土法煉鋼」所帶給人民的災難。現在陳雲的「鳥籠」經濟，人為地把經濟發展限制在一個範圍裡，也是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

中國共產黨能否解決中國現存的重大問題，關鍵在其是否能按客觀規律辦事，克服其體制上的弊病。就目前的跡象看來，它靠自己本身的力量來解決它自身的體制問題，是不可能的。因為它要改革其體制上的根本弊病，就等於否定它自己，它就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世界上還沒有任何第二個政黨犯了如此重大的錯誤，還有臉賴在政壇上。我們知道，柬埔寨共產黨因殺人而臭名昭著。柬埔寨共產黨犯的嚴重錯誤，是在中國共產黨指使下犯的，它能承認錯誤，宣佈解散，這一點就比中國共產黨高明。在自知之明方面，中國共產黨連東共都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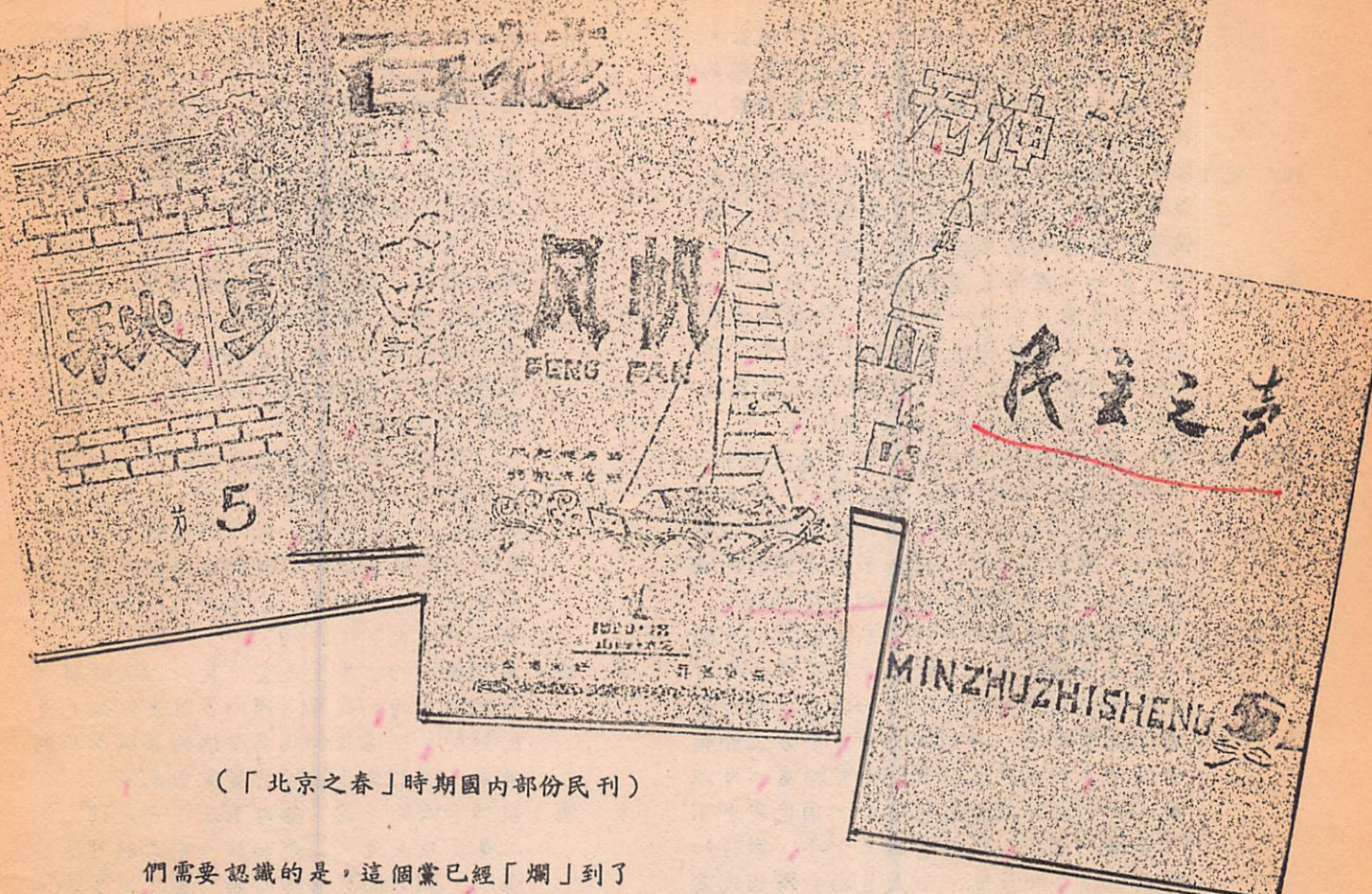
中國共產黨一貫標榜它是代表無產階級、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但事實上它並沒有把人民放在應有的位置上。在他們的法律上，反對毛澤東、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就是三反份子就是反革命，從來沒有提反人民是反革命。他們提「四個堅持」，並指出「四個堅持」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可從來不提堅持人民的選擇。

另外，對於實現「四個現代化」及中國的前途，我覺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本身就沒有信心。最有力的證明就是中國共產黨政治局成員多數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國外留學，並千方百計謀取居留權。

我不認為鄧小平目前的政策完全正確，退一萬步來說，即便是他的政策正確，鄧小平一去，又有什麼力量能保證其政策的持續性呢？

保證正確政策持續性的根本是民主政體。所以，我主張根本變革制度。

汪岷：中國共產黨自己對自己缺乏信心，人民對它缺乏信心，這些都是事實。現在我



(「北京之春」時期國內部份民刊)

們需要認識的是，這個黨已經「爛」到了什麼程度，是不是可能很快有另一個政治集團可以取代它。腐爛有一個過程，不一定很快就會垮台，它仍有四千萬黨員，還有軍隊，中國人思想保守，中國歷史上走下坡路的朝代往往維持很久。

朱明：中共從文革開始就明顯地走下坡路，「四人幫」時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鄧小平雖然扭轉了一些局面，但很快新問題又出現了，我看他是沒有起死回生之術。在共產黨政權下成長的年青一代，從他們一懂事就處在「失學」、「失業」以及「上山下鄉」的威脅之中，共產黨沒有帶給他們任何利益。共產黨在文革中就誤了我們整整十年，二億青年的十年，加起來是多少年！我認為這一代人是會向它討債的。

施燕人：對於中共還能維持多久，我看還取決於它自己。它的是否成功取決於是按人民利益進行改呢？還是按他們一黨利益改。我希望共產黨能站在人民方面，給人民更多的自由、民主和人權，也是讓共產黨能維持長一點。但據我推測，共產黨的改革是難以成功的，例如，現在許多產值仍是虛報

用假宣傳蠱惑不明真相的人。他們不肯作根本改革，而是拆東牆補西牆，用補洞的辦法，結果漏洞百出，補不勝補。

吳力明：中國面臨的問題不但是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更重要的是首先必須實現政治民主化。沒有政治民主化，廣大老百姓沒有發言權，就不可能群策群力，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很難的。即使將來有一天，中國實現了「四個現代化」，如果不是民主政治，而是極權獨裁，那這個「現代化」裝備的極權政權，不但不能給人民帶來任何福祉，而且會給世界帶來災難。當年希特勒政權以及眼前的蘇聯擴張就是明證。

在經濟政策上，鄧小平比毛澤東是實際了一點。但我們必須看到，它的這種「讓步」，是他們的政權受到威脅時，迫不得已做出的。

我認為中共的改革在政治上不可能真正實行，但在經濟上則可能取得一定的成績。這就是為什麼還有許多人對鄧小平存在幻想的道理。所以中國局勢可能會有一

段相對穩定時期，中共也不會很快滅亡。這就決定我們民主運動是長期的、艱難的。但是，從歷史的長程看，它終究會被人民民主的洪流所淹沒。

汪 岷：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看法，看來大家的認識基本一致。我們是否可以開始討論一下國民黨在現在及將來在中國政壇上的作用。

李 毅：國民黨的存在為共產黨提供了一面鏡子，雖然國民黨目前是一黨獨大，但國民黨在台灣三十年的政績把共產黨比下去了，從此打破了共產黨的神話。沒有國民黨存在做對比，共產黨就更為所欲爲了。

柯 楓：有人說中國民族性落後，不可能講民主。台灣跟大陸都是中國人的社會，三十年前的落後狀況也差不多。爲什麼台灣可以搞得更好一點兒呢？所以問題不是中國的民族性落後，而是中國大陸的制度有問題。

吳力明：台灣國民黨政權的存在，本身就說明中國目前是一種「二元」狀態，只不過是雙方沒有聯合起來。不管現在和將來，國民黨對共產黨都是一種制衡力量。雙方互相和平競爭、拮制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可以說，如果沒有共產黨的壓力，國民黨也不可能厲精圖治、臥薪嘗膽三十年，取得如此的成績。相反地，今天若無台灣國民黨的對比作用，共產黨一定更加肆無忌憚欺壓老百姓，根本不會有什麼「改革」。所以國民黨的長期存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

李大宏：我覺得我們對台灣的態度要慎重。我們的任務是爭取民主、人權，不要對什麼都表態，或提出一攬子計劃。

朱 明：國民黨的存在取決於它自身。有力量就不至於被共產黨吃掉，將來在民主聯合政體中必有一席。

劉海健：國民黨是中共之外中國最強大的一個政治實體。國共兩黨都搞獨裁，但我希望國共將能和談，我一貫認爲「兩個魔鬼加起來比一個魔鬼好。」兩個魔鬼可以互相拮制。

柯 楓：我認爲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應該研究台灣問題，俗話說「旁觀者清」，發言權也是一種民主權利。台灣的重要性，我認爲：第一、台灣三十年來在經濟上取得了比大陸更高的成績，擁有實力；第二、在海外華僑中，大多數傾向於國民黨。這並不是意味着國民黨做得有多好，而是共產黨做得

太差了，尤其是三十多年來，海外華僑在國內的親屬多半被整鬥過，結下了仇根。如果國共二擇其一的話，恐怕多數華僑選擇國民黨。但是，假如有一股新興的、比國民黨更加朝氣蓬勃的力量出現，恐怕會有多人選擇新興力量。

國共目前不可能合作，關鍵在於雙方都企圖用一個主義、一個黨來統一中國，這是任何一方都不能接受的。我認爲只有用一個法律才能統一中國。這個法律本身就要保障不同的主義可以並存，不同的政黨可以並存。

在這方面，我們民運可以做的工作，首先是通過多方面警告中共，企圖用武力解決台灣回歸問題，結果只能給全中國人民帶來災難。其次，我們建議國共雙方要有雅量、互相包容，企圖用自己的主義去統一對方是不民主的。

李 毅：我們廣大的留學生是堅決反對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我想，國內多數老百姓也是反對的。根據我和北美華僑的接觸所得的印象，他們更是擔心共產黨動武。

朱 明：談到台灣的前途，無非有三：一是獨立，二是反攻大陸，三是和談。前二種可能性極小，剩下的只有第三種可能了。可是，奇怪的是國民黨提出三不主義：「不接觸」、「不妥協」、「不談判」，一下子把剩下的唯一的一條路堵死了。連毛澤東都知道辦事說話要留有餘地，爲什麼國民黨比毛澤東蠢？

易 平：我想，國民黨以前談判時吃過虧，提「和談」而色變，共產黨的和談花招尤如賭博，這次它一下子下了一個大注，看國民黨敢不敢揭寶。國民黨一時被這個大注唬住了，生怕一揭寶全盤輸光。其實，照我看，現在心虛的是共產黨。在和談的賭博中，誰的資本大，當然是國民黨，它三十年來經濟上比大陸成功，就是最大的籌碼。可惜國民黨不會使用這個籌碼。

劉海健：我和我的很多同學都談論過這個問題。我們從大陸來的人就是不明白爲什麼國民黨害怕和共產黨談判。我們分析，目前整個國民黨的心態是守，不是攻。它已經喪失了二〇年代北伐中原的決心，只想偏安於一隅。這就是我們對它不抱大希望的主要原因。

施燕人：其實，目前是國民黨二次北伐的最好時機

民主傳

MIN ZHU ZHUAN

1979

民主

(「北京之春」時期國內部份民刊)



。我說的北伐，不是武裝反攻，而是和平北伐，說穿了，就是北伐性和談。當前，大陸三信危機已達頂點，也就是說，共產黨的威信已到有史以來的最低點。不趁此機會進行政治攻勢，還待何時？難道還要等着共產黨把經濟搞得更好一點，得到喘息的機會嗎？事物衰落到最低點後，就會有回昇的可能。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國共過去格鬥時，共產黨的勝利並非自己的英明，而是國民黨政權的腐敗。那時人民不知道共產黨葫蘆裡賣的什麼藥，是一個謎一般的「未知數」，而國民黨是一個向眾人表明的腐敗的「已知數」。人民選擇謎一般的「未知數」去替代不好的「已知數」，是很自然的事。共產黨就利用此點搞和談，這就是它過去和談成功的基礎。現在，三十多年過去了，共產黨已不是當年的共產黨，國民黨也不是當年的國民黨。共產黨從「未知數」變成了錯誤一大籬的「已知數」，人們都識破了廬山

真面目；另一方面，國民黨當年腐敗的「已知數」，經過了臥薪嘗膽的努力修復，現已變成了一個比共產黨印象好一些的「已知數」。一句話，今非昔比，共產黨和談成功的基礎已經崩潰。和談有利的風向已轉到台灣方面，它可以用現在的「已知數」，輕而易舉地粉碎共產黨當前聲名狼藉的「已知數」。我來自廣東某縣，我敢說，如果讓我家鄉的人民公平投票選擇國民黨或共產黨，國民黨得勝的機會大於共產黨。所以，如果我是國民黨的決策人，將會趁共產黨鼓吹「和談」之際，將計就計，揮談判之師而北上，不愁不會節節勝利。

我講這一席話，是想揭穿共產黨目前搞和談的「心虛」，同時指出國民黨的「保守」。正因為國民黨的保守心態，我們對它不抱希望。還要指出一點，我接觸過不少台灣留學生和從台灣移民來的學者，他們大多數人都認為國民黨應當與共產黨談，「三不主義」式的做繭自縛政策，並未得到開明人士的支持。但是，他們在台灣都不敢議論「和談」之事，以免通匪之嫌。可見，台灣也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

李毅：其實「和談」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專利。我們受共產教育的人就不怕和談。記得中國之春剛發起時，就提出過準備隨時與中共代表談判。現在談判，坐在被告席上的，不是中國之春，而是共產黨，共產黨才是真正的怕「和談」。

我不相信中共在台灣宣傳馬列會招攬到信徒；但若反過來，國民黨在大陸宣傳三民主義，可能會有不少聽眾。

汪岷：剛才大家都談了對國共兩黨的看法，暢所欲言，如果我們這些話能在大陸講，也能在台灣講，該有多好，可惜目前還做不到這一點。中國之春接到很多讀者來信，有些讀者指出，目前打破國共僵局的，只有靠「第三勢力」。現在談談「第三勢力」的問題。第三勢力這一提法很敏感。從理論上講，應是國共兩黨之外的另一個政治實體。現在還沒有形成這一個政治實體，將來是否會形成一個，或者多個，還很難說。但總的趨勢是有可能形成的。依我之見，提「多元化政體」比較合適。

易平：第三勢力的提法是針對共產黨（第一勢力）和國民黨（第二勢力）而言。沒有第二

勢力存在也就談不上第三勢力。第三勢力的提法，溯源於卅年代，五十年代又有人提，可是一直沒有搞成。

第三勢力應泛指為介於國共兩黨之間的力量。實際上，它是客觀存在的，只是缺乏組織而已，還有一個問題是，即使組織起來，此種勢力能不能發展壯大？

李大宏：我認為有一個概念要澄清：中國之春是一個民主運動，不要把自己的力量估計過高。中國之春也只是民主運動中的一員，不要自己標榜代表第三勢力。

吳力明：中國之春應該推動新的政治實體形成，不要包辦。大家都提到單純依靠國共兩黨難以解決中國現存的問題，這就需要人民的參與，需要新的政治實體的出現和參與。新的政治實體可能不是一個，而是二個或三個，或者更多。這些可統稱為第三勢力。

施燕人：剛才易平同志的意見值得重視。我體會他的發言有兩層意見：第一，第三勢力是客觀存在的，只不過沒有組織成形。我接觸過不少海外華人教授，他們對國共兩黨都有看法，又都關心中國的前途，實際上他們都屬於第三勢力的範疇。至於大陸內，對共產黨不滿而又對國民黨不抱希望的人，可以說是佔大多數，他們都想伺機起來，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這就是第三勢力發展的基礎。第二，易平同志問，第三勢力過去搞不起來，現在為什麼有希望搞起來？這個問題提得好。我思考過這個問題，我不妨打個比方。大陸解放前，國民黨政治腐敗，尤如大樹主幹已枯死一樣，那時，共產黨的力量是蒸蒸日上的，它這棵小苗把精英份子，也就是土壤中的大部份營養都汲取了，終於長成了大樹。即使在五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初期，共產黨還是吸引了不少不明真象的海外知識份子（如保釣運動的參與者）。但是，現在共產黨的真面目大家都認清了，它這棵長成的大樹已在枯萎，它枯死一個枝葉，就會變成肥料。此時，另一個幼苗——第三勢力，就有可能吸收營養而成長起來。

李毅：我覺得「第三勢力」雖然存在，但要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似乎非常困難。國共以外的範圍太大，涵蓋各階層各種人士，根本利益很難統一。但形成幾個主要的

力量，比較有代表性的則完全可能。現存的跟國共合作的「花瓶黨」，由於它們的力量太小，太分散，均名存實亡，根本起不到制衡和監督作用。我們的責任是盡可能推動國共以外的政治勢力聯合起來，只有聯合才有力量。

從理論上說，我們研究過「group（群）」概念的人知道，二元比一元好，三元又比二元好，但又不是愈多愈好。將來最理想的聯合政體應是以三個獨立的政治實體為主的「多元化政體」。

劉海健：對「第三勢力」應持非常慎重的態度。如果我們認為「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是要走向組黨的道路，我們要問，現在是不是時候？

我認為民運在78、79、80年是高潮，但現在是低潮。鄧小平當前的改革具有很大的蠱惑性，老百姓對他多少寄以希望。另外，中國老百姓具有傳統的保守性，習慣於接受極權統治。特別是經過十年文革浩劫之後，人民要求安定的心理，他們不希望中國出現再一次動亂。所以我覺得目前提出組黨還不是時候。但做一些好事，如為留學生伸張正義等，則在中國的民主運動中，具有載入史冊的意義。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已經取得了遠遠超過我們預料的效果，目前的任務是穩住，而不是大踏步前進。

李大宏：中國的民主運動只是為民主吶喊，目前主要是一個人權運動，不需要對其它政治事件表態，不要涉及所謂「第三勢力」的問題。我不是反對有一個「第三勢力」能夠取代國共兩黨或參與國共的政治合作，我的意思是這個時候還相當遙遠，現在提出搞組織不切實際。

施燕人：自從「中國之春」民主運動開展以來，我聽到周圍的朋友（多數為台灣同學）經常議論中國之春。多數人認為中國之春不能僅僅停留在宣傳階段上，必須向組織方向發展。綜合起來有下列三種提法：一、有些人明確提出要組黨。這部份人指出，由國共兩黨操縱的中國政治僵局必須打破。二、也有一些人提出中國之春只是個民主講壇，許多話在國內不能講，現在在「中國之春」雜誌上可以發表就行了。三、還有一部份人的意見介於前二者之間，建議



(青年詩人芒克 1979 年 10 月在北京民主牆前演說)

成立一個不十分嚴密的民主「聯盟」或叫「同盟」的組織。

根據目前形勢，我傾向於第三者。成大事，就不能光發議論。中國之春必須要有一個在「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宗旨下，聯合起來的組織。但這個組織又不是像共產黨那樣不允許反對意見存在，為了團結大多數人，這個組織必須具有很大的包容量。例如，有人提出「中國之春」必須投靠國民黨，我個人是堅決不能同意的，但是我們允許他個人保留他自己的意見。由於這個組織是聯盟性的組織，我覺得「中國之春」總部應該是協調性的機構，而不是一個指令性機構。

朱明：我認為一定要有一個有明確政治目標的組織。其理由很明顯，共產黨獨裁政權之所以無視人民的民主權利，根本原因就是人民沒有力量。共產黨現在一直呼籲跟國民黨談判合作，而從來不屑一顧於民運志士。國民黨手中有幾十萬軍隊，叫了幾十年「反攻大陸，鏟除共產暴政」，共產黨却要跟這些「蔣匪幫」「合作」。魏京生手無寸鐵，只喊了幾天民主，却判了十五年徒刑，聽起來似乎不可思議。但稍加思索，則奧秘一目了然。跟當權者打交道一定

要有實力。沒有實力，它是吃定了你。所以凡是希望想從共產黨手中獲得民主的人，必須組織起來形成力量，迫使它讓步。

另外，我認為成立組織的時機已經成熟。從海內外對「中國之春」的反響，就可以知道廣大人民對於民主人權的強烈要求，這就是說思想準備已經基本成熟。事實也證明，自「中國之春」之後，各種小的民主團體相繼出現，「中國之春」不組織，別人照樣組織。「中國之春」不但要形成自己的組織，將來還要推動所有民主力量大聯合。

柯楓：我認為兩種力量都不可忽視。一種是可見的，即一個有形的組織的力量。另一種是不可見的，即思想宣傳的力量。我們要把民主思想通過各種渠道送進中國大陸，讓民主的思想在國內生根、開花、結果。時候一到，這種思想宣傳的效果就會顯現出來。「武昌起義」就是很好的例證。

汪岷：關於形成組織的問題，歸根結蒂還是對形勢的看法。我覺得大家的分歧不是很大，組織比個人有力量，要搞政治就避免不了組織，這些觀點都是一致的。

李毅：我們是否可以在組織法中規定，在領導成員中有大陸背景的應該保證一定份量，因

為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中國大陸。對於這一點，我相信海外廣大僑胞及台灣、港澳同胞也是可以理解的，並跟我們聯合作戰。

易平：我認為我們的近期目標可以說是「要民主、爭人權」。遠期目標則是「廢除一黨專制，實行多元政體」。為要達到這個遠大目標，我們必須組織各種力量，現階段特別要注意加強跟僑界的聯絡，爭取得到廣大海外華人的理解和支持。

關於民主的手段，我認為只要目的正確、高尚，手段和方法應是多種多樣，既有原則性，又要有靈活性，不要自縛手脚。不要怕外界輿論，當年毛澤東去重慶跟國民黨談判，不但對青天白日旗鞠躬，還叫蔣委員長萬歲，但這却不妨礙他日後「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施燕人：中國之春在外界的形象很重要，必須謹慎小心。我個人反對與國民黨打任何交道。

李毅：對於海外華僑在民主革命運動中的意義，孫中山先生認識得最深。現在時代雖然不同了，但今天的民運與當年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仍有許多相似之處。我們面對的中國都是一個封建性的專制政權，而海外則相對民主得多。海外，特別當今北美，既有民主自由的環境，又有廣大愛國華僑作我們的後盾，所以今天民主運動的旗幟，首先在北美樹起來。

香港是海外通向中國大陸的橋頭堡，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流經由那裡出入大陸。這不僅是我們把民主信息帶進大陸去的重要渠道，更是國內民主志士跟海外聯絡的咽喉。特別是香港人民面對「九七問題」，我們必須抓緊時機向香港人民指出，如果想過民主自由的生活，如果不希望中國大陸三十年的悲劇在香港重演，就必須在民主的大旗下聯合起來，跟極權統治者作針鋒相對的鬥爭，徹底改變中國的政體。否則，一經中共極權的魔掌控制，香港人民再來逃亡就不是那麼容易了，中南半島難民的悲劇不得不引起每一個自由人民的深思。事實上，香港人民完全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只要全體香港人民團結起來，聯合海內外一切民主力量，堅決拒絕一統於中共的極權之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中共是沒有辦法的。我們

相信，中國人民包括中共黨內的民主開明人士在內，一定有力量制止中共用武力解決香港、台灣問題。

過去，中共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取得了政權，今天我們民主力量必須以「海外包圍大陸」，再通過大陸內部的民主力量取得突破，這叫做「外界施肥，內部開花」，最後在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我們每一位民主戰士都應該看到這種總的戰略趨勢，以提高我們的信心。

汪岷：今天的座談就到這裡，大家發表許多很有價值的意見，對於我們進一步認清形勢和任務，都是非常有利的。但由於時間倉促，很多問題沒有談深談透。我們將會把座談紀要整理發表，希望每一位關心民運的同志能跟我們一道，共同探索中國民主運動的前途。



(「北京之春」時期國內部份民刊)

二次留學 有感

劉振

莘莘學子遊學海外，非自今日始。我想留學生嚴復可能是最早的留學生吧？據說由於他的卓越學識，使他的日本同學伊藤博文很是敬畏，自嘆不如，深恐嚴復返回中國之後振興中華，成為日本大敵，日本自非中華競爭的對手。然而歷史無情，嚴復這樣的英才，在回到封建專制的腐敗透頂的中國之後，得不到重用。相反，日本却是用伊藤博文為首相，一切仿學德國的先進體制，形成後來中國人叫的「德日派」留學生掌權核心。日本國力大振，打敗俄國，闖進中國，大肆攻掠。

中國也想學先進，歷代派出的留學生確是不少。「八國聯軍」打進來之後，「庚子賠款」的經費，一部份是用在派遣留學生的留學，造就了各種人才，英、美、德、日、法、加拿大、比、荷、澳洲、奧地利，乃至蘇聯都有我們的留學生。我記得在中國最困難的抗日時期，西南聯大等校還有理工科學生派往美國學習。中國大陸解放以後，也派出過大批學生去蘇聯，向「老大哥」討教，一切以蘇聯的學術派別為準。如有誰懷疑蘇聯的學術就是觸犯了當局的清規戒律。輕者按右派處理，重者則坐牢。

中國的留學學者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寫「自傳」，交代自己過去的留學史，接着就是檢討自己、改造自己：什麼「留聲機」啦，「嘴尖皮厚腹中空」啦，「著作是天下之書一家抄」啦，「權威」是反動的，「教授」是資產階級

的，是「學閥」，比「軍閥」還反動。

在中國近代史上，留學生的悲劇演出不知多少次，留日的是「日本漢奸」，「美蔣特務」是留美的，留德的是「德國法西斯希特勒的得意門生」，乃至留蘇的當然是「蘇修特務」了。

中國人喜歡講「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了今日是「四個堅持」不得動搖。西學嘛，不是不要！陳毅元帥（他是黨內「老右派」了）說過：「寧要核子，不要褲子」！中國解放以後，非正常死亡的人以百萬計算！而中國留學生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原子彈、氫彈是造出來了，會播放「東方紅」的人造衛星也上了天，發射導彈的核潛艇也有了。這真是一種奇怪的生活方式：孩子老婆沒飯吃，家長却豪賭之餘，還要大放其焰火，給鄰居看看，以揚其威！

今天蒙中國「鄧大人」之恩，把我們這些莘莘學子又放出來留學了。把我們這些年已近半百的「老學生」放出來，遊學外國「訪問」、「考察」、「進修」、「交流計劃」、「自費進修」等等。可是中國呢！還是老樣子！學成回國以後，夾緊尾巴，最好在政治學習會上先批判外國的腐朽制度。

看看我的同學吧，二十年前留蘇的大致來說分三種人：一種做了官，開會划圈批字，罵人訓人；另一種人做點本行，但遇事能推就推；第三種老牌運動員，包袱重，日子不好過。今日在美國，有許多中國留學生要求政治避難。海外有些中國人不明白，外國人更是不明白。我想還是一句簡單的話：我們名義上是「學者」，實際上「裡外不是人」。在美居留期已到，還賴在別人家裡不走！像個什麼人啊？但是誰又願意如此做呢？回去嘛！是自己人「白眼」的對象，自己的上司領導，大致是中、小學程度，再加上「四個堅持」望而生畏。

還有自己過去的一本「檔案」，歷次運動的「交代」已有幾大箱子，如今是更加複雜了。這次回去以後還得把這次「訪美」交待出來，也真難！過去的罪名是已經「平反」了，還有人不服氣！說是「鄧大人」搞的「一風吹」不算數，他下台了等著看吧！」「民主，自由，法治，人權，這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是無產階級一家專政。」

越寫心裡越悲傷。五十年代，我和許多在海外的留學生一樣，在國外留學完畢後能拋棄一切，心甘情願地返回祖國去，為國家和民族服務。但回國後二十多年反反復復的慘痛經驗，倒使得我這個第二次留學生進退兩難，心情極為痛苦。唯期老天爺給我指出一條明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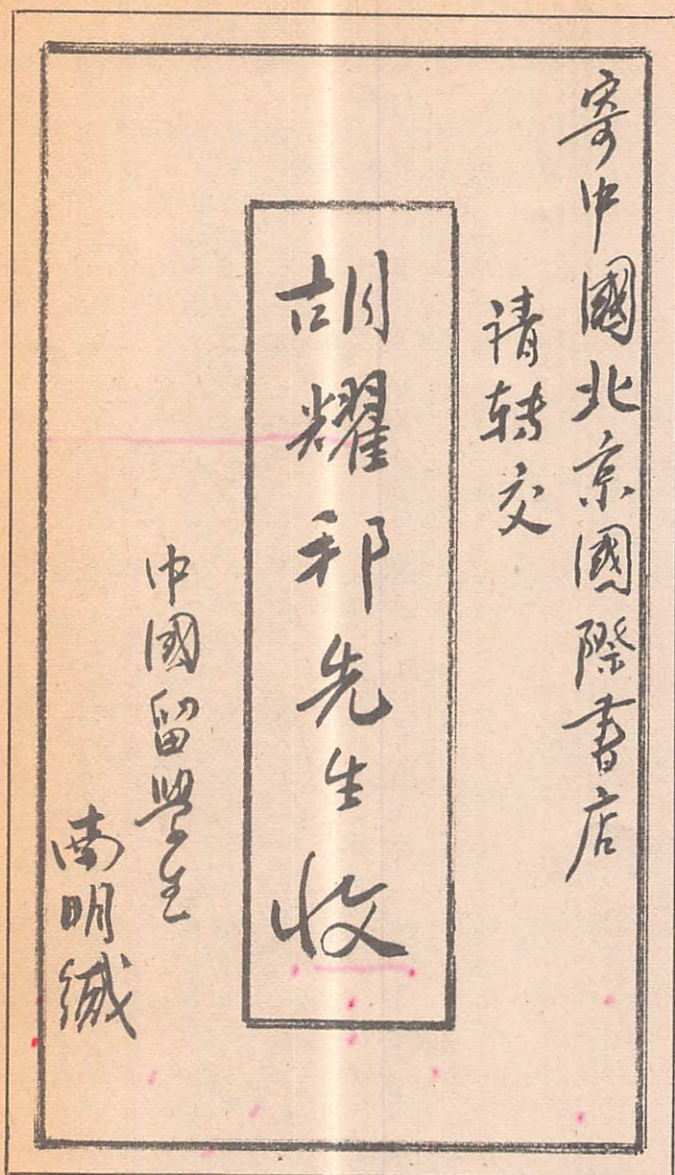
八二、十二、四

一、關於堅持馬克思主義問題

中國共產黨歷來的信條是「馬克斯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的基本原則是不隨時空而轉移變化的。馬克思主義中似乎有一塊不可逾越的禁區，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一百多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中國近百年來，特別是這三十幾年來的歷史，都出現了也必將會出現馬克思主義所無法闡明和包括的問題。有時歷史的進程根本與馬克思和列寧的學說和預言大相逕庭，中國就更是馬克思、列寧本人未經拓荒的處女地。他們生活的社會環境和歷史背景與中國迥然不同。在中國革命的歷程中，便數度出現過外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教條的粗暴的干預，如果說以發展的實踐的眼光看待馬克思主義，那我們就不但應以新的原則和內容去充實和補充馬克思主義，也應給以馬克思主義以新的形式，也應揚棄馬克思主義中已為歷史實踐證明是錯誤的理論。真理總是相對的，沒有萬古不變的信條。一百年前馬克思創立馬克思主義以來，人類社會發生了多麼巨大的本質的變化，中國歷史也開創了新紀元，馬克思本人敢於破舊立新，吸收人類全部文化成果，而創立了在人類歷史上起巨大作用的馬克思主義。為什麼今天處於廿世紀八〇年代的中國共產黨人却固步自封，不願面對千百萬人民所從事的馬克思本人無法想像的偉大實踐和業績？以近百年來人類創造的歷史上無可比擬的文化成果，去創立一個新的、符合現時存在的學說？實踐已經證明：非馬克思主義，甚至反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其中往往有符合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有符合歷史發展方向、有符合社會需要的，有站得住腳的客觀真理，曾經被批判而今天在國內實行的馬寅初先生的「人口論」學說，就是明證。當然，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創立的黨。「堅持馬克思主義」這個口號作為中國共產黨對自己的要求，是必然的。作為「國法」，我認為就不妥。我希望國內真正出現一個「百家爭鳴」的局面。「百家爭鳴」是一個正確的方針，是有利國家和中華民族的發展進步的，是有利於理論和學術的發展的。

二、關於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中國是一個以封建經濟為主體，帶有一些資本主義色彩的國家。其後



胡耀邦先生：

我是中國自費留美學生，去年八月起在北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化學系就讀，現在我想就「四個堅持」口號和中國統一問題談談我的看法。雖然我不知道這封信是否可以到你手中，也不知道你將怎樣看待這封信，我仍然認為將一個中國青年知識份子的心聲一吐為快。

「四個堅持」的口號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它是否適合現時中國的國情，是否反映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願望，是否符合中華民族的固有特徵，是否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方向。我就這問題本身作一些粗淺的分析：

，所進行的生產關係的變革，使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據說是馬克思主義中的新事物。其實，是植根於蘇聯的模式而來的。三十多年來，特別是五十年代後期以來，我們面臨着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的困擾。中國共產黨內的一些領導人，曾提出過：「發展資本主義」。那麼中國是不是需要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不是一條使中國走上富強的道路？今後中國的發展方向是什麼？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完全排斥資本主義？還是改弦更轍，歡迎資本主義到中國來？還是搞一個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我以為「資本主義復辟」這個概念是不確的，中國社會發展歷史從未經過資本主義階段，何來「復辟」？而世界上資本主義國家，我們却在諸多方面有求於他們。在世界歷史上，資本主義是遠較封建主義進步的社會形態，它創造的生產力千百倍於封建社會。如果說共產主義又是一個較資本主義進步的社會形態，當今世界的劃分對比，還不能說共產主義取得了優勢。而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科技文化、人民生活水準所達到的程度，更是我國所無法相比較的。這三十多年來，日本在戰後的廢墟上建立了一個經濟大國。台灣地區更在這十幾年裡取得了一個敢於向我們誇耀的經濟建設成果，而我可愛的中國大陸却依然不得不自承「窮國」的耻辱。我以為這三十幾年我國的生產力沒有達到它應有的發展水平，讓已為歷史證明的錯誤路線和政策誤了國家，害了人民。五十年代末期的大躍進、人民公路和總路線，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所謂的「反對修正主義」和「防止資產主義復辟」運動，就是明證。今天所推行的新政，在形式上是過去「資本主義復辟」政策的翻版，在實質上就是與共產主義相抵觸的東西，只是「猶抱琵琶半遮面」。有人說我國堅持的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實行「按勞分配，各盡所能」的分配原則，那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實行了呢？又在多大程度上偏離了呢？如果說最近這幾年推行的政策已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這種改革其實不是什麼新東西，而是向資本主義的讓步。資本主義在中國得到了某種程度的發展，表現了它固有的生命力和歷史必然性。而我們的對外開放政策，主要是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放。我們必須和資本主義合作，我們必須向資本主義學習，已是明顯而仍然不為一些人所承認的事實。我以為，這個政策是符合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符合歷史發展方向的。而共產主義社會只有在社會生產力極大發展、社會財富極大豐富的基礎上才能實現。我們却企圖在封建主義的

地基上去建設共產主義，而不經過可以大大解放生產力的資本主義社會，今後將何去何從呢？

三、關於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幾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已從幾十人的共產主義小組，經過幾十年之後，取得了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統治權，而成爲今天在中國大陸上獨一無二的執政黨，四九年以後，我們滿耳聽的，滿口講的是中國共產黨如何地偉大、光榮和正確，它的領袖是如何地英明和一貫正確，這在文化大革命中更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形成了「黨天下」甚至「一人號令天下」的局面，現在我們聽到了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批評，也聽到了中國共產黨對它的領袖的批評。我們看到：剝去耀眼的光環，那些曾經焰蓋日月的大人物，不過是歷史畫卷角落中幾點筆墨而已，政黨和它的領袖是歷史長河中的幾點浪花。我們要提出：中國共產黨在國家生活中究竟應有怎樣的地位？它和中國人民的關係應擺在什麼的位置？究竟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位和利益高，還是國家和民族的地位和利益高？中國共產黨是國家和人民的主人，還是公僕？中國共產黨和它的黨員應以什麼樣的面貌在國家生活中和人民群眾面前出現？是「老子黨」，還是勤勤懇懇、恭恭敬敬的「勤務員」？這些問題，不僅是「黨風」問題，也是黨在歷史上和社會生活中作用和地位問題。它應是一個向國家和人民負責，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去工作的政黨，而不是一個凌駕於國家和人民的頭上，爭一個小社會群體私利的政黨。我們曾經看到：無數中國共產黨人爲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和利益，我們也痛心地看着，今天在全國各地出現了多少「城堡」和「宮殿」，那些「新貴」們在裡面過着連西方資產階級也嘆爲觀止的驕奢淫逸的生活，曾經被稱爲「母親」的中國人民，用生命和血汗支持過中國共產黨，他們在這幾十年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備受了痛苦和災難，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活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有飢餓和內心掙扎的痛苦經歷，不論是偏遠鄉村的一個農民，還是身屬京華的達官之子。就我個人而言，當我走過曾是革命根據地的蘇北平原農村中四壁空空的農家，當我和農民一起喝着摻着菜的稀飯時，真是痛心疾首，黯然淚下。我古老而可愛的中國，爲什麼你還有那麼多人過着衣食不周的生活！而相比較於被稱爲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地區，現在連偏遠的鄉村都用上了

電，差不多家家都通了電話，那裡的人們生活水準早已達到溫飽，很多農家都擁有我們國內少許家庭才擁有的電器設備和交通工具，我們不禁要問，屬於領導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如何向中國人民交待？如何向歷史交待？

四、關於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問題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人民的主體是農民。無論是新民主主義時期，還是社會主義時期，革命的主要對象都不是資產階級，建國初期的人民民主專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却逐漸演變成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作為這把刀下的犧牲者。從國民黨殘餘到封建地主，乃至五十年代後期幾十萬「被坑的儒生」；終於到「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和他們的「社會基礎」，現在，你批判了毛澤東「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宣佈黨內不存在「走資派」，宣佈中國知識份子大體上是工人階級的一部份，那麼，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是什麼呢？是爲了對付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嗎？還是對付國內不同政見者如魏京生、王希哲等？如果都不是，爲何還要「堅持」呢？

五、關於中國統一問題

現在，葉劍英提出了國共和談九點方案，中國的統一又成了舉世矚目的問題。這一次，國共雙方都改變了以往的口號。我們要問，中國共產黨作為在中國大陸執政的大黨，所提出的和談統一中國的口號，究竟是圖窮匕首現的陰謀，還是出於國家和中華民族的百年大計。誠心企求中國的統一富強之道？在我接觸的台灣留學生中，他們雖然一般並不對我們抱有敵意，但他們明確表示不願意接受中國大陸的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這就是因爲中國共產黨沒有使中國大陸人民富起來。而台灣人民却享受着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富足生活。統一的方向，是三民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我以為「實踐是衡量真理的標準」，這就是中國應走什麼道路的準則和統一的方法。我希望中國共產黨向全世界宣布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絕不訴諸武力，我以為統一的關鍵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的誠意。當然，我也不希望在台灣的國民黨堅持反共，國共兩黨應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摒棄兩黨的成見和私利，這樣將有利於中國的統一早日實現。

這信將請北京國際書店轉寄，同時也寄到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

此致

敬禮

中國留學生 南 明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贈中國之春戰友們：

滿園蒼茫色，

奇花撲鼻香；

莫戀蝶蜂逐，

還望把根生。

一老民運戰士

1983、5、27於國內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局限性

評胡耀邦的報告

沙林

當今中國人民最關心的是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今年三月十三日，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在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紀念大會上，為中國的未來指出了方向，那就是他在該紀念大會上所作的「報告」：「馬克思主義偉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們前進」。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將繼續以「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姿態「帶領」着全中國人民沿着「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前進。

我們覺得中國過去沿着「馬克思主義」（此處指廣義的「馬克思主義」包括列寧主義、史大林主義在內，亦即通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走了幾十年，並沒有走出一條光明大道來，反而弄得人民的中國苦不堪言，災難重重。如果道路不改，繼續走下去，當然還是死路一條。因此，我們不能同意中國共產黨及其代表人胡耀邦的意見。人民的中國是屬於十億中國人民的，不是共產黨的私產。一切國事，必須取決於民意，否則「人民民主」便失去了它應有的意義。為此，我們不能不對該文提出理論批評。

馬克思主義只是一種理論和學說，而不是「真理」，更非「偉大真理」

做為一個偉大的書生，馬克思是可敬的；做為一種理論和學說，馬克思主義也有它一定的價值和知識地位。但硬要說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偉大真理」，並強調「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要向馬克思請教」，便是言過其辭，也是非科學的，甚至是宗教上的唯心主義和神祕主義的表現。

馬克思說過：「我是人，人所固有的我無不具有。」這說明馬克思只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神。人最多只能提出一個學說，或一種理論，但却不能創造出「真理」。「真理」與「啓示」是屬於神學（theology）領域內的東西。即使是「科學底共產主義」，涉及到「真理」問題時，也只是輕描淡寫地指出，人間並沒有「絕對真理」，也沒有什麼「偉大真理」，最多，也不過只有「相對真理」而已。科學中只講學說和理論，在知識態度上，抱持「相對性」，自古至今，沒有一個科學家，敢說他找到了「真理」，並抓住了「真理」。哲學中講思想和學說，是意識形態性的，雖然各個哲學家多堅持自己找到或抓住一部份「真理」，但實際上，都是趨於「相互主觀」（Intersubjectivity）。只有宗教中大談「真理」，佛教說「真理」在佛陀手中

；天主教說「真理」在天主的手中；伊斯蘭教說「真理」在穆罕默德手中，到底是在誰手中，到底有幾個「真理」，是神學家研究的事，這與馬克思主義無關。

說馬克思主義是「偉大真理」，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當成「啓示」，甚至當成「神祕咒語」，也就是把馬克思當成「神」。一九七八年思想解放運動時，國內報紙天天宣傳「除了科學外，什麼都不要相信」，「大規模的宣傳證明不了真理」。鄧小平也說過：我們「絲毫不存什麼『先哲』一類形式的甚至神祕的念頭在裡面。」怎麼事隔五年的今天，新的造神運動又起來了呢？而且造的是一尊更大的、更有權威的「神」——馬克思。這不表示思想已經解放，恰恰相反，思想仍然沒有解放，只是以前思想桎梏在一尊小神面前，現在思想桎梏在玉皇大帝面前，思想桎梏是一樣的，只是大神小神之別而已。因此，實際上，整個黨仍在一個形而上的意識形態中打滾，絲毫沒有脫離宗教層次的神祕主義和蒙昧主義的巢臼。

其次，我們要指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另有指義，並不等於就是科學。恩格斯稱他和馬克斯的理論是「科學的共產主義」。此處這個「科學的」，是以十九世紀的科學基礎和條件為標準。一百多年來，科學基礎和條件幾乎整個翻了個身，不知多少新的定律和理論被發現，舊的定律和理論被否定，這是任何一個現代知識份子不能不承認的嚴酷事實。奇怪的是，我們黨的領導人說，這個十九世紀中葉出現的「馬克思主義」是「偉大真理」，要永遠向它「請教」；黨的理論學家們如于光遠等，居然說「馬克思主義永遠是時代的結晶」（見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四日人民日報），並提出「作為世紀中葉的思想理論，怎麼可能「永遠」是時代的結晶？任何一個科學底理論都有「時間」和「空間」限制。用「永遠」這二個字本身就是非科學的、反科學的。用「永遠」二個字去形容馬克思主義，也只能使馬克思主義形而上化，而不再成為「科學的共產主義」。我們還要指出馬克思主義在十九世紀中葉是「科學的」，因為它吸收了當時的科學知識，但它沒有吸收二十世紀的科學知識（因為它的哲學基礎與二十世紀的科學知識正相矛盾），因此到了二十世紀，已經不能再說是「科學的共產主義」了。此處要指出一點，便是：二十世紀科學的特徵之一是不講基本因（Science is not Concerned with ultimate causes）。二十世紀的理論科學權威海森堡（Heisenberg）的「不確定原理」，就是告訴世人何以在科學中基本因無法求得。但馬克思主義却是講基本因的，那就是歷史唯物主義肯定

經濟條件和物質力量是社會變動的決定因素，亦即「下層建築」決定「上層建築」。馬克思主義講目的論（teleology）、必然論（necessitarianism）和決定論（determinism），而科學只講「相對」與「可能」，在出發點上如此地不同，如何能在二十世紀的今天還稱馬克思的理論體系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



法國巴黎公社革命

當年恩格斯提出他和馬克斯的理論是「科學的共產主義」，主要在區別他們的理論與「空想的社會主義」有所不同。換句話說，在馬、恩眼裡，他們自己的理論是立足於「經驗」之上，不是形而上的，是唯物的。這是馬、恩所要強調的重點，而不是在於強調自己的理論是「科學」。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不是在發展馬克思主義，而是閹割和異化馬克思主義

對二十世紀的知識進展（尤其是自然科學）不顧，已經令人感到黨的領導人與黨的理論工作者並沒努力把馬克思主義與二十世紀的科學理論結合起來，更嚴重的問題是黨的領導人對馬克思主義知識的不够以及任意曲解和誤用，這不僅造成馬克思主義不必要的難堪的歷史命運，而且有損於馬克思主義的原有價值。因此，就不是在發展馬克思主義，而是在閹割和異化馬克思主義。

現在先讓我們摘錄出胡耀邦在馬克斯逝世百年紀念大會上的報告中的幾段重要文字，來看看中共領導是怎樣「理解」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

「馬克思是十九世紀的德國人，但他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他所處的時代和地區的界限。」

「我們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中國的無產階級，中國各族人民，正是在馬克思學說的指引下，才使我們這個落後的東方大國走上革命和解放的正確道路。」

「現在，我們大家都更加深切地感到，沒有馬克思的學說，就沒有我們的今天。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要向馬克思請教……。」

「他……揭示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科學地說明了階級鬥爭在人類社會歷史中的作用和它產生、發展、消滅的條件。」

「他第一次發現了資本剝削勞動的祕密，即剩餘價值規律，進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發生、發展到最後必然被共產主義所取代的歷史趨勢。」

「列寧和俄國布爾什維克幹成了十月革命，是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後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個最重大的發展。」

「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十月革命後馬克思主義發展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十年『文化大革命』曾經使我們黨陷入嚴重的困境。但是，困難沒有使中國人民對馬克思主義失望，反而使我們進一步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我們的撥亂反正，就是要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就是要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世界上有些人至今還在胡說什麼我們拋棄了毛澤東思想，這只能表明他們對毛澤東思想一無所知，也就是對馬克思主義一無所知。」

「馬克思確實是工人階級知識份子的最高典範，是一位代表人類智慧和良心的最完全的知識份子。」

以上是胡耀邦的「報告」中有關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部份中最重要的幾段文字。至於「報告」中的其餘部份，例如人民日報三月十四日第二版中欄以後的各章節，都是以「報告」中的第一部份綱領性的文字為基礎，所作關於黨的現階段政策的說明。關於這一部份，我們就不願浪費篇幅加以引述了，因為：假如胡耀邦「報告」中的綱領性部份是不妥的、虛假的，甚至是錯誤的，則我們根據邏輯推斷便知其餘部份在結論上也不可能是妥當的、真實的，甚至是正確的。

現在，我們從知識和理性立場，向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學」(Marxology)的學者們指出下面這句話：由中國黨的總書記的「報告」，看這個「偉大的」黨如何閹割馬克思主義和歪曲

馬克思主義的命運。同時，也要經過知識和歷史的分析，來看看中國共產黨人到底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不是工人階級知識份子

馬克思(Karl Marx)確是十九世紀的德國人，距今逝世已經一百周年。做為一個知識份子，他是永遠受人尊敬的，這不但可從他一生中沒有一天停止過為追求人類的徹底解放，而進行不斷地思考和鬥爭，最後因勞累而死在自己書房的座椅上的偉大無私的精神可以得證，同時也可由他在一八六五年應自己的女兒的要求，所填寫的簡單自白而證明，馬克思是一位代表人類智慧和良心的知識份子。他的自白如此寫道：他喜歡「純樸」、「剛強」、「單一」、「鬥爭」和「紅色」；他厭惡「逢迎」。這和中國知識份子所一向自勉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極其相似的。因此，胡耀邦對馬克思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的評價是中肯的，但並不全對。熟讀馬克思傳記的人，不論那一本傳記，只要作者是忠於馬克思的歷史，沒有指稱馬克思是「工人階級知識份子」。最重要的一本馬克思傳記是梅林(F. Mehring)寫的「卡爾·馬克思」，也未曾指出馬克思是「工人階級知識份子」。「工人階級知識份子」只能指「工人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只有那個工人哲學家狄慈根可配稱為「工人階級知識份子」。恰恰相反，馬克思出身律師家庭，自己受過高等教育，根本就不是「工人階級」，充其量，只能說他是為工人階級講話的知識份子，但絕非「工人階級知識份子」。因此，胡耀邦對馬克思的知識份子特徵只說對了一半，其餘一半是胡總書記加給馬克思的「美譽」，這項「美譽」在整個馬克思的傳記歷史上，則是一種「謬譽」。

其實，真正對馬克思有研究的學者，都知道馬克思並沒有意思用他的思想去「影響」遠遠超出了他所處的「時代」和「地區」，甚至嚴格地說，馬克思晚年公開對那些「馬克思主義者們」說過這麼一句話：「就我所知，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All I know is that I am not 「Marxist」)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有效期僅限於十九世紀中葉的西歐



俄國十月革命

那些把馬克思主義當成「偉大真理」的人，爲什麼不去思考一下馬克思的最後意見？馬克思死前的二年（一八八一）給俄國女革命家查蘇莉奇（Vera Zasasulich）一封信中，對當時俄國革命黨人有興趣於「馬克思主義」的人，如此寫道：「資本主義制度之歷史必然性只限於西歐國家。」這是馬克思的自白，表示他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有效性僅限於十九世紀中葉的西歐。這一句話，就否定了胡耀邦的所有「報告」。換句話說，馬克思不但沒有把自己的理論看做「偉大真理」，而且根本就不承認他的理論有超越「時間」和「空間」的可能。另外，一八七四年馬克思寫了一封信覆俄國社會學家米海洛夫斯基（N. K. Mihailovskii）的批評。

在這封信中，馬克思向米海洛夫斯基鄭重表示，他沒有意思使他的「唯物史觀」成爲「普遍的歷史哲學」。這又再次說明，馬克思本人是誠實的，他只想用他的理論去說明他活着的時候所看到的十九世紀西歐的資本主義社會，超出這個十九世紀的「時間」和西歐的「空間」，他的理論便不適用，這是馬克思自己的最後意見。因此，凡是把馬克思的理論作任意外延，讓它超出十九世紀的「時間」和「西歐」這個「空間」，都是不忠實於馬克思的思想。換句話說，「任意外延」，絕不能解釋爲「繼承發展」，恰如「反馬克思主義」不能解釋爲「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道理。如果把馬克思的最後意見當作是衡量馬克思理論的標準的話，正好說明馬克思自己絕沒有把自己的理論當成「普遍真理」的意思。可見一切把馬克思理論看成「普遍真理」或「偉大真理」的人們，都是在無原則的逢

迎下曲解了馬克思的意思，而這曲解包括恩格斯在內。他在馬克思的葬禮上所作的演說，所謂「恰如達爾文發現自然界的進化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社會的進化律」這句話，只是恩格斯的逢迎，但並非馬克斯的本意。任何對本意和逢迎都不加以區分的人們，其對馬克思及其思想和理論的理解也就有限了。

現在，問題出現了，一個理論的創造者都不承認自己的理論是「普遍的歷史哲學」或「偉大真理」，結果信仰他的理論的那些人（不論真信仰還是假信仰）把他（馬克思）的理論運用於二十世紀的亞洲，已經首先犯了「過份普遍化」（Over Simplification）的謬誤。

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政權跟馬克思主義扯不上關係

中國共產黨這群「職業革命家」經過革命而奪取了政權，不過這個革命的手段和建立政權的方式，根本和「馬克思主義」扯不上正統關係，而且馬克思從未講過，在生產力落後地區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力和它的生產關係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時，馬克思才認爲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這是歷史唯物主義最重要的地方，而且只有這種社會革命的發生才屬馬克思主義式的。凡是在生產力落後，不靠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不可避免地發生的社會革命，不論是暴力式的或非暴力式的，都不是馬克思主義式的，因爲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絕對禁止在物質條件不成熟下（即生產力落後）由一群人去玩弄暴動，不論這暴動或說是武裝鬥爭成與不成，馬克思都不能替其負責，因爲這違反他的歷史唯物論公式。爲此，我們要用真正的歷史唯物主義來檢視胡耀邦的第二段話了：其一，「馬克思主義」不可用於超出「十九世紀」的「西歐」的時間和空間條件；其二，不可用於生產力落後的亞洲及其中國。既然馬克思的理論被馬克思本人如此嚴格地限制着，而且馬克思本人否定其歷史公式可以用於亞洲，請問如何能說「在馬克思學說的指引下，才使我們這個落後的東方大個走上了革命和解放的正確道路」？整個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中找不到馬克思如何「指引」中國革命，真不知胡總書記從那找到的！只有從列寧（V. I. Lenin）、史大林（J. Stalin）的著作中可以找到「指引」中國革命的詞句，但列寧的理論——列寧主義（Leninism），和史大林的理論——史大

林主義，又稱「馬列主義」(Stalinism or Marxism—Leninism)，是列寧的和史大林的，並不是馬克思的。列寧主義是「恐怖主義」(Terrorism)，是「鞭撻式的社會主義」(Barbarian Socialism)，這不僅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K. Kautsky)和盧森堡(R. Luxemburg)對列寧主義的深刻評語，而今日全世界的馬克思學家們在著作中都共同承認的。用列寧主義指引中國革命，却說是用馬克思主義指引中國革命，一方面說明胡耀邦不知區別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共產黨人最多只是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者，本身實際上是「馬列主義」者。以馬列主義來冒充馬克思主義，在政治上和知識上，都屬欺詐行爲。

理解馬克思自己的意見，是區分中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根本沒有必然邏輯關係的關鍵。馬克思的社會革命，依他的理論只能在歐美高度工業化的國家有可能發生，而在亞洲落後地區發生的社會革命，不論是什麼形態，都不是馬克思主義式，也不是靠馬克思的理論所指引的。那種採取俄國十月革命的方式，乃至用列寧主義及史大林主義的「東方革命論」來指導的革命，不論其後果如何，都不能算在馬克思的頭上，他的所有的著作和理論，證明他沒有義務爲中國革命作指引和負責。

新中國是中國人民爲求解放而進行艱苦鬥爭得來的

什麼叫做「沒有馬克思的學說，就沒有我們的今天」？這種同義反覆的話，中國共產黨不知說了多少遍。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時，黨的領導人指稱：沒有蘇聯老大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無私支持和援助，就沒有今天的新中國。黨的第九次大會後，黨的領導人又指稱：沒有毛澤東主席的領導和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勝利，就沒有新中國。現在，黨的領導人把上面的命題換了個主辭，改爲：沒有馬克思的學說，就沒有我們的今天。好像新中國不是中國人民爲求解放而進行堅苦鬥爭得來的，而是靠俄國、靠馬列主義、靠毛澤東、靠馬克思得來的。

到底「我們的今天」是怎麼來的？這一定要弄個水落石出。如果「我們的今天」指的是一個集合名詞上的概念，那就是指一九四九年出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新中國而言。爲了推翻封建的舊中國社會，中國共產黨確曾在這場艱苦的歷史鬥爭中盡了大力量，但別忘記，要堅信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馬克思主義有一可取之處，就是否

定「英雄史觀」。歷史唯物主義從生產方式是各種社會形態存在和發展的基礎這個基本原理出發，肯定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而非那些傑出的偉大人物。(「關於英雄史觀和唯物史觀的區別」Maurice Cornforth 著「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w York 1954, 有清楚的論述。)歷史唯物主義並不完全否定個人的作用，只是偉大人物對歷史的發展，只能起推進或延緩的作用，只能決定歷史事變的局部外貌，真正決定歷史命運的，還是人民群眾的力量。一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黨的領導人，居然用「英雄史觀」來解釋新中國的出現，他的馬克思主義知識水平實在是有大問題。如果「我們的今天」指的是一個具體的實際社會狀態——新中國的現實：貧窮、落後、社會法西斯專政、黨官僚特權階級的集體壟斷與共同佔有，勞動人民的再度被剝削，總而言之，如果指的是一個新階級和新型剝削制度的社會主義的話，也不是馬克思的學說可以負責的，因爲馬克思本人就反對剝削、反對異化、反對特權階級、反對黨官僚的專政，而今天的新中國現實，完全與馬克思所要確立的「理想形態」(Ideal type)正好相反。馬克思主義即使本身有許多錯誤(關於馬克思主義本身的錯誤和批評，容許我們下一次再細論，這不是三言兩語可以結束的)，但馬克思反對一切「異化」(Entfremdung, Alienation)的形式和作爲，這點是他的理論中最有意義的地方。他要求要有一個「人樣的社會」出現，但「我們的今天」正好是一個「非人的社會」(Unhuman Society)。可見不論怎麼說，胡耀邦的這句「沒有馬克思的學說，就沒有我們的今天」都是不通的。因此，不論中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實在沒有向馬克思請教的必要。



如果一定要請教馬克思，只能向他請教什麼才是「人樣的社會」，關於這個問題，他能給予正確的答案，而這個答案充斥在他所有的古典著作裡，從「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資本論」，那就是「揚棄人的非人化和實現人的解放」(to eliminate the dehumanization of man and to realize the emancipation of man)。從異化中去解放人，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高道德精神。捨此此外，向他請教別的枝節問題，尤其是中國問題，如果不是得到錯誤的答案，就是得到空白答案。因為，馬克思從來沒有說過，他的理論可以用來解決中國問題。

中國革命不是馬克思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可以解釋的

胡耀邦的「報告」，談到歷史唯物主義部份，只有這麼一段話是中肯的，但也是不完全的，那就是：馬克思「揭示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之所以不完全，在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必須是屬於一個既定的「生產方式」之中，這個矛盾才能造成歷史發展的動力。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為了說明一定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造成一定的「生產方式」，他提出一般人所稱之為「馬克思歷史公式」：原始共產公社、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共五種（如果加上最後共產主義的，就是六種）。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最有問題的就是他這個唯物史觀的歷史公式。它本身既是錢型，又是圈型，既是階段論，又是類型論，公式本身之不清晰與缺乏普遍化的論證標準，使得不知有多少「馬克思主義」者為解釋歷史而爭論不休。尤其是近代中國，自從孫中山完成中國現代第一個民主革命，建立第一個民主共和政權後，整個中國已從舊社會或稱傳統封建社會中轉變為以現代民主為基礎的新社會。孫中山的革命不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可以解釋的。至於這個現代中國最後之所以改朝換代，政權由國民黨手中轉入共產黨手中，主要是雙方經過激烈的武裝鬥爭，國民黨不支倒下所致，也不是什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中國的社會性質，經過中國社會史論戰在理論上不能求得解決，經過國共雙方的長期武力爭鬥，也求不到解決，更不是對亞洲中國十分陌生的馬克思能提供答案加以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關鍵是由貧窮落後如何進入工業和現代化問題；是如何由亞洲傳統式的政治專制進

入現代式的西方民主化問題，充其量只能說近代中國問題關鍵在如何發展生產力問題，而不是生產力高度發達所造成的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問題。說的更清楚點，近代中國社會問題不在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而在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如何加強「配合」問題。可惜這一點，在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中找不到答案。如何由「落後」進入「現代」，不是馬克思的研究主題，馬克思的研究主題是近代「先進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矛盾」問題。中國問題屬前者，西歐社會屬後者，馬克思只論後者，而不管前者。我們今天的問題是如何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而不是去解決歐美先進國家社會中的矛盾問題，對象不分、手段不同，用馬克思主義之矢硬射中國問題之的，這是目的與方法的矛盾，根本不是在解決問題，而是在製造問題。因此，我們實在看不出來胡耀邦特別提出馬克思「揭示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對解決中國問題有何意義。

馬克思歷史哲學在學術上最有價值的地方，是他提出「社會結構論」，這是他被稱為現代結構主義(Modern Structuralism)先驅的原因。但他對於這個「社會結構」中的「矛盾」問題所提出的處理手段——所謂「階級鬥爭」一事，却是他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的最大敗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問題唯一扯得上關係的就是「階級鬥爭」這四個字，但新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後，用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論試圖去消滅階級，其結果如何呢？三十多年來，新中國的一切人為動亂和社會浩劫，就是因黨的領導人迷信了「階級鬥爭」這四個字。因為中國的黨是「迷信」馬克思主義，而不是「信仰」馬克思主義，因此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必然會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全中國的十億人民，中共全體黨員幹部，包括活着的當今黨政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及死去的周恩來、林彪、陶鑄等（除了毛澤東），還有現在還關在秦城監獄的「四人幫」等，甚至於「中國之春」的名譽編輯和現在在海外為中國之春民主運動而獻身的許多同志，試問那一個沒有受到「階級鬥爭」的苦痛和摧殘？最令人不能理解的，甚至連馬克思也不能理解的，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這幾個字。舉凡黨內因政治自私主義而進行的各式權力鬥爭，被冠以「階級鬥爭」的名義，「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都是在階級鬥爭的概念下引申出來的名詞。人民反對黨的專政，人民爭取民主，人民要求改革，黨同樣以階級鬥爭之名，開動國家的專政機器，對革命的人民進

行反革命的鎮壓。總之，中國這三十多年來，不論黨內黨外，不分東西南北，造成千萬人頭落地，億萬人民遭殃的空前慘局，都是這個「光榮、偉大、正確的黨」迷信「階級鬥爭」所造成的。這樣嚴重的血的歷史教訓，難道還不能讓今天的黨和黨的領導人徹底覺悟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論大大的有問題嗎？從胡耀邦的「報告」，我們看不出現在的黨將停止或減少階級鬥爭論的使用，因為胡耀邦肯定馬克思「科學地」說明了「階級鬥爭」在「人類社會歷史」中的「作用」。

馬克思發現「剝削」旨在揚棄「剝削」；發現「剩餘價值律」旨在揚棄「剩餘價值」，而不是在強調剝削和持續剩餘價值。

關於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胡耀邦只提到馬克思「他第一次發現了資本剝削勞動的秘密，即剩餘價值規律，進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發生、發展到最後必然被共產主義所取代的歷史趨勢。」不錯，馬克思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發現了資本剝削勞動的秘密，即「剩餘價值律」的發現。但馬克思如何發現資本剝削勞動的「秘密」，發現這個「秘密」的目的何在，胡耀邦却隻字不提。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重點不在提出「資本」剝削「勞動」，不在提出「剩餘價值律」，而在揭穿資本剝削勞動的根本原因、過程和那個秘密，從而在理念上提出一個正常而合理的社會，是不允許有任何方式的剝削行為存在的。換句話說，這才是他的政治經濟學真義。

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剝削勞動一事最深入的著作是他的「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Economic -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和一八五七年的「政治經濟學手稿」（The Grundrisse）。在這兩個手稿中，馬克思都提「異化勞動」（alienated labour）和「人的自我異化」（Self-alienation of Man）。經由理論和經驗的分析，馬克思提出一個本體論上的意見：人作為自然的一部份，必須為維持自己的生活，滿足自己的需求而生產。如果不是這樣，而是在為滿足與他自己相對立的那個控制整個生產過程（從工資到產品）的第三者（自己的異己物）而生產，便是異化勞動，便是非人。

如何解釋異化勞動和由此而來的人的自我異化？馬克思的答案是：廢除私有財產和實行共產主義。在馬克思眼裡廢除私有財產和實行共產主義是不可分的，甚至是合二而一的事情。他這麼說過：「私有財產的完全廢除即所有異化的完全廢止。」

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人的自我異化的完全揚棄，也是人的本質通過人和為了人的真正佔有。亦即它是人作為社會存在物，做為真正的人的回歸。」（以上俱見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作者引用參考 T. B. Botto more 編註的「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Mcgraw - Hall Book Co. New York. 1963.）

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以澈底解除人的各種異化，最後求得人類的完全而真正的解放，其理念，無論如何，都是值得稱頌的。如果中國共產黨人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應對馬克思提出實行共產主義以消除剝削、廢除人的異化的理論作真誠的思考和檢討。一面思考馬克思的終極目的，不是單純實行共產主義問題，而是藉實行共產主義以消除人的異化，使「非人」成為「人」。同時，也要一面檢討自己實行的是不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如果是，為什麼到現在為止，人的異化不但未能消除，反而愈來愈嚴重，到處是異化，包括政治上的、經濟上的、社會上的、心理上的……。是不是馬克思的理論經不起實踐？還是馬克思主意只是意識形態？還是共產主義只是一個「理想類型」或「烏托邦」？還是中國共產黨人自己在製造異化的共產主義？還是共產主義本身也發生了異化？這都需要給予深入的檢討和分析。如果不是，那整個黨大規模地紀念馬克思逝世百年，並標榜沿着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前進，就有「弦外之音」了。

工業技術和能源效用日漸耗老革命營工

製造的剩餘價值大部分工投能源所
替代^時剝削和剩餘價值的理論和

方法都毫無革新，以這
實際情況，馬克思一百餘年的
理論也應灌輸心中。





新的好 還是老的好？

瓊 旺



「改革」是近年來許多中國人的熱門話題。中國大陸在中國共產黨三十多年的統治下，人民生活未見改善；十年文革，更是災難空前，幾乎弄到了亡國亡黨的邊緣。在這種狀況下，就連中共黨內最頑固的保守派也意識到，如果再不「改革」，人民就要造反了。

鄧小平就是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現，在人民的擁護下，取得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實際領導權。但當他掌權以後，很快就拋出了「四個堅持」的原則，對曾經熱烈擁護過他的「民運」份子，進行了殘酷鎮壓。他的獨裁專制，無視人權法制，與為害中國幾十年的毛澤東相比，毫不遜色。最近成立的「國家安全部」更進一步證明：鄧小平猶嫌毛澤東鎮壓人民不力，有進一步加強之必要。毛澤東死後，人們曾寄希望於鄧小平，但這種希望很快就被他自己的暴行粉碎了，中國繼續籠罩在恐怖的極權專政的魔影之下。關心國事的中國人，又進入了另一個探索階段。

在探索的過程中，人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新的並不比老的好，鄧小平就是明證。基於這個事實，許多人對中國的前途抱着悲觀的看法，國共兩黨既無可能解決中國存在的問題，如殺出一個第三者來，則可能比前者更壞。真是「改革」無望，「民運」無望，中國的前途無望，到底新的好還是老的好，不得不引起人們的深思與爭議。

中國人的傳統保守觀念

社會的進步在於不斷更新。由於特定的歷史條件，中國人的保守勢力及一般老百姓的保守心理往往顯得比其他國家更為突出，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改革特別艱難的主要原因之一。

早在兩千多年以前，中國人就奉行「天不變，道亦不變」之說。皇帝則為「真命天子」，誰敢造反，天地不容。陳勝、吳廣起義是在逼到死地才不得不舉旗造反的，其實老百姓對秦暴政早已恨之入骨，只是未到死地，還沒有人敢造反。起義軍初期還得假冒秦公子扶蘇及楚將項燕之名號召人民，則更清楚反映當時老百姓的心理：「正名」的領袖比庶民更有號召力，覆舊比革新更容易接受。

社會改革除暴力形式外，另一種改革則是在最高統治者的允許下，用行政的辦法改良陳腐法規。而這種「變法」改良，在中國似乎更難。早期的改革家商鞅，其結果是被保守派「五馬分屍」。就算是深得宋神宗支持的「王安石變法」，在保守派的壓力下，新政無法推行，持有變法行政大權的王安石，也不得不兩次被迫辭職。

美國今天的進步是不斷改革的結果

清朝末期，腐朽愚昧的封建帝國已經無法抵禦先進的資本主義的各種進攻，中國已經瀕於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境地。頑固的封建保守勢力仍死抱祖宗的陳規，拒不接受「變法」，他們認為封建專制仍是中國的根本，絲毫不可改易，洋務自強便可解決一切問題。梁啟超當時就尖銳地批評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其於西國所以富強之原，茫乎未有聞焉，以為吾中國之政教、文物、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以不及者惟槍耳、砲耳、船耳、鐵路耳、機器耳，吾但學此洋務之能事畢矣。」「戊戌變法」的結果，證明中國封建保守派的頑固性，超出了革新者及人民的預料。不但維新只有「百日」之壽，而變法的領導人物只走漏了康、梁，「六君子」被殺，連光緒皇帝本人也逃不出保守派的魔掌。從另一方面說，如果腐朽的滿清政府，不是「守法不變」，而是接受「變法」，中國的結果就很可能走上日本的維新道路，中國的近代史就將不是今天這樣了。可惜的是保守派的頑固性決定了他們「寧死不變」，最後的結局只有被革命的洪流所淹沒。

非常不幸，中國的民主革命並沒有徹底完成，共產黨的極權統治只不過是中國封建勢力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改頭換面的產物。文革中，中國的封建法西斯主義曾經發展到了高峰。「四人幫」時代，中國則大有重蹈慈禧太后覆轍。中國大陸今天的落後與當年愚昧的封建中國並無本質上的差別。今天，鄧小平之流高唱「三十年的偉大成就」，高舉「四個堅持」的旗幟，與當年的「五千年文明」和「守法不變」則有異曲同工之妙。

向前看才能步步前進，向後看則會固步自封，這該是一般人的基本常識。就如一個賽跑運動員，他不是向前衝鋒，而是時時回顧起跑點，即使別人都跑在他前面了，這時他還沾沾自喜地說：「我比起跑點已經前進許多了！」這種運動員在其它國家一定會被認為精神不正常而攆出運動場。但在中國人們大抵會原諒他，因為他的領導不是每天都在告訴他：「我們比解放前……」有這樣的領導，出這樣的運動員，又有什麼奇怪呢？十分遺憾，連這樣起碼的常識，人們都常常忘記。不過對「英明」的中共領導人來說，實在不算太高明。

說古論今，中國的保守勢力確實具有其深遠的歷史根源，而今天中國極權統治的主要支柱就是既得利益的保守勢力和多數老百姓的傳統性的保守觀念。

人們常常稱今天的美國是自由民主的天堂。但不要忘记：從1607年的第一批英國移民建立詹姆士鎮算起，至今還不到四百年。從獨立戰爭時代的250萬人，發展到今天二億多人的世界超級強國，只有200年的時間。

我們同時還應該記得：就在這塊當前人們公認為文明的土地上：半個世紀以前，還籠罩在尖銳的階級壓迫和種族歧視之下。在工人居住的貧民窟裡，嬰孩被老鼠咬死的故事，聽了令人毛骨悚然，震驚世界。黑奴的解放始於林肯，而徹底得到平等人權，還是在1960年代中期以後。100年前的華工在美國不但得不到法律保障，而且在精神心理上均遭白人的仇恨。不但受到資本家的壓榨，做最苦的工作，拿最低的待遇，而且隨時還遭到愛爾蘭工人及黑人的責罵，毆打和暗殺。就是在三十多年前，像錢學森這樣卓有成就的華人科學家，在這塊土地上還遭到種族歧視，以至使他憤然返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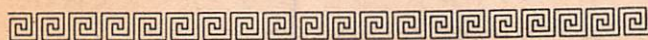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切現在都變了，而且變得那麼快。善於思考問題的人們，立刻就會聯想到：是什麼力量，促使美國社會如此飛速進步呢？

固然「獨立宣言」為美國奠定了永久的民主基石，憲法為人民的權利提供了最大保障。然而，「宣言」中偉大理想的實現，憲法的不斷完善及真正執行，如果沒有長期艱鉅的努力，就只會是一紙空文。而美國人民的進取心和不斷革新的精神，則是美國社會進步的內在動力。

美國憲法原文七條，然後隨着環境的變遷，跟着時代的演進，亦由國會歷次修訂的修憲，使美國憲法日臻完善，蔚成大觀。而其內涵之繁複，也為世界之鮮見。

美國憲法產生於1787年，至今國會提出的修憲案已近四千件，而在國會通過提請各州表決者也有28件。美國人總是抱着緊跟時代的精神，使憲法不斷修改完善。例如，當多數人認識到種族不平等是不符合「獨立宣言」的民主人權精神，而且是社會動亂的根源之一時，在1865年就通過第十三條修憲案，禁止奴隸及強迫勞役制的存在。1868年又通過第十四條修憲案確保黑奴之公民權，美國社會因之產生巨大的進步。又如1920年通過的第十九條修憲案，乃予婦女以平等的選舉權，一下子使婦女的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美國人對總統的態度，也充份體現了他們傳統的「吐故納新」精神。首先，他們在憲法中規定，



總統最多能任兩屆。在美國歷史上的四十位總統中，只有十二位通過選舉連任。可見美國人是希望經常更換領導人的。這個辦法不僅可以防止總統個人獨裁，更多的希望仍是通過這種辦法來不斷更新政治空氣，使這個國家永遠保持朝氣。這跟中國的「幹部終身制」及九斤老太們「一代不如一代」的觀念，恰成尖銳的對比。

「新」、「老」並不是判斷好、壞的根據

絕對地說「新的比老的好」或者說「新的比老的更壞」都是毫無根據的。由「新」「老」來辨別好壞，是非常荒唐的說法，不但理論上站不住腳，事實上也是十分有害的。

我們知道，世界上並無聖人。凡人，即有人性。所謂人性就不但包括了人的社會屬性，同時也包括了人的生物屬性。生物性驅使人「自行其是」去滿足其慾望，社會性則要求人類「自我約束」。人類的正常活動，不外是在社會的各種約束之下，盡可能去滿足各自的慾望。當一個人的社會約束不足限制其慾望時，人類「自行其是」的生物性就會猛烈

膨脹起來，犯錯誤及犯罪除過失犯外，多數就是這種趨勢的結果。

中國文化大革命最有價值的教訓，莫過於人民在付出了無數血的代價之後，終於認識到：一個沒有約束的當權者，當他頭腦發瘋的時候，會給人民帶來多麼嚴重的災難。人們永遠不會忘記的另一個教訓是希特勒。當德國人對希特勒的個人迷信到達頂峰的時候，就是這頭野獸脫繮的開始。這些極權獨裁者給人類帶來的災禍，確實應該讓人類永遠記住：獨裁是災難的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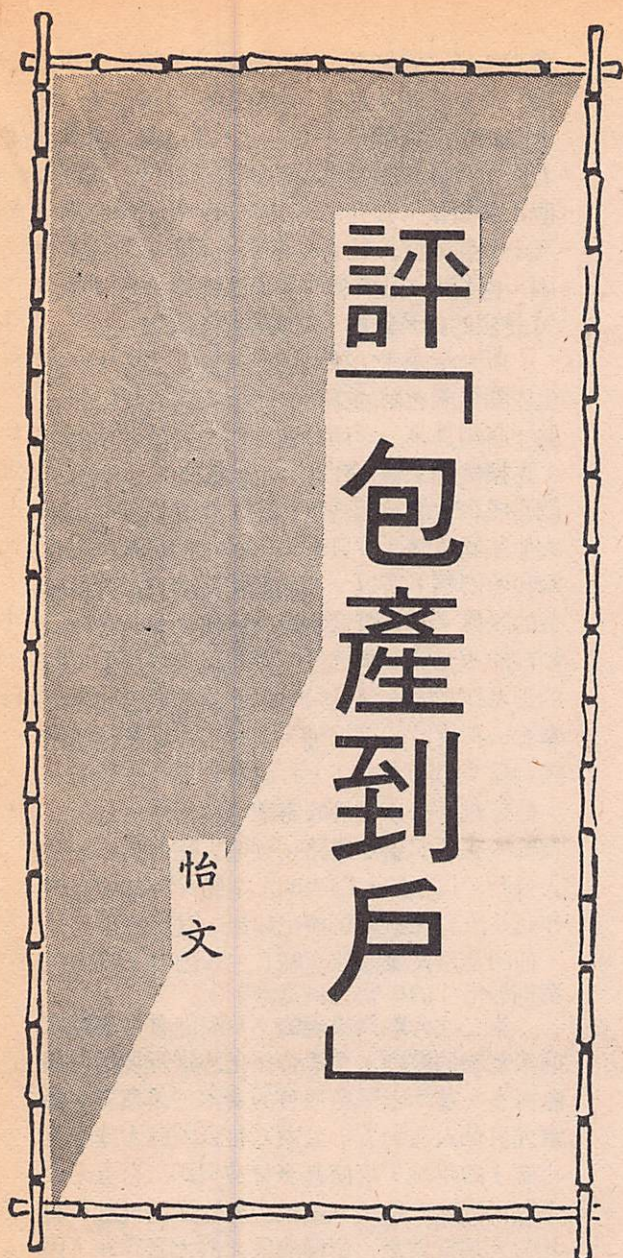
由此可見，「新」、「老」並不是好壞的根據。在當今世界，誰代表了人民的意願，「以民為主」，誰就是好的當政者；而「以君為主」，或是變相的「君主」——極權獨裁，就必然走向人民的對立面，這種孤家寡人就是「壞」。

新獨裁者取代老獨裁者，換湯不換藥，本是一丘之貉，無好壞可言。

新民主戰士取代老獨裁者，盡管從個人而言，新手未必完美，但其奉行的民主路線，就給人民帶來了光明的希望。

吃盡封建獨裁極權專政苦頭的中國人民，對辨別當政者的好壞，難道還有什麼疑義嗎？





中國大陸農村人民公社，曾被捧為毛澤東的天才創造，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可是，它經不起實踐的檢驗。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通過總結經驗，拔掉大寨紅旗。另在農村試點，準備改變公社體制。一九七九年底決定國民經濟「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新八字方針，農業體制改革成為主要內容，從推行生產責任制逐步明確為「包產到戶」。一九八〇年四月九日人民日報著文「聯繫產量責任制好處多」，大力鼓吹生產到田、包工到組、責任到人，自己辯解說，這一不算「單幹」、二不算「倒退」、三不算「階級分化」。同年九月廿七日，以中央名義批轉各省市第一書記座談會「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紀

要，將「包產到戶」體制鑼鼓敲定。一九八一年八月發出「關於徵求人民公社存廢問題的意見」通知，研究它的善後處理。

今年初的中發一號文件，即「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除了再肯定「包產到戶」（稱為聯產承包，是農業生產責任制的主要形式），更作出一些具體政策，進一步貫徹自由化，全文半句不提毛澤東、人民公社及其優越性，以及所謂的巨大歷史意義。相反地，文件一起首就開門見山，說這個「包產到戶」體制「打破了我國農業生產長期停滯不前的局面」，不言而喻，這當然是指人民公社給中國大陸農民長期帶來嚴重的政治、經濟惡果。

大陸農村人民公社不得人心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在大陸樹起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使得國民經濟陷於全面崩潰。總路線、大躍進早已破產，人民公社是徒有虛名的最後一個。

那時，他發動城鄉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村剛搭起生產合作社的架子尚不穩固，就大唱「不斷革命」，要十五年超英趕美，說「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強迫廣大農民參加。可是，這個違背自願原則、缺乏必要的精神條件和物質基礎、脫離生產力發展狀況和水平、盲目冒進的公社是沒有生命力的，其後果只能是對農業的重大破壞。

人民公社是毛澤東左傾教條主義、主觀唯心主義和官僚專制的產物，從一開始產生就是禍國殃民，不得人心。一九五九年八月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提了勸告，但忠言逆耳，對毛來說反我即反黨，他被打成反革命份子，換來撤職坐牢，牽連成千上萬。這位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國防部長，一夜之間成了反革命。他的正直敢言，不計個人利害得失，至今仍受到人民的尊敬。

人民公社暴露了問題，本來是應該反左和必須退却的。但因彭德懷事件發生，毛當即文過飾非，在大陸開展大反右傾，來勒緊農民的脖子，豈能不糟？這樣一來，億萬農民，只有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束縛下，人身依附，失去自由，強迫勞動。

大家不會忘記，那時河南、安徽、山東等許多省，飢民遍地，餓殍無數。人們為了充飢果腹，挖吃山野的植物當代食品，多少城鄉人民因缺乏營養，患上肝炎和水腫病；物資商品奇缺，購物大排長龍，黑市交換，大走後門；惡性通貨膨脹，國家出售貴幾倍的高價商品「回籠鈔票」，連主要生活必需品的糧、油、

糖、肉、棉製品也在高價之列，真是回想當年，談虎色變。毛澤東迫於形勢，終於提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退回原來的生產合作社規模為主，即以生產隊為核算和分配基本單位。自己在職務上退出了領導第一綫。當年，就是這個「包產到戶」，即「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的產生，使瀕於破產的農村經濟「起死回生」。現在，還是靠這盞「包產到戶」的神燈，才使大陸億萬被困的農民，第二次從毛澤東思想的迷宮中引導出來。不過，這個東西不是馬克思主義國有化或社會主義集體化的理論，也不是根據生產力發展達到高水平的資本主義大農業，而是求助於一向被視為落後生產方式的個體小農經濟。

事實足夠清楚，中共過去長期企圖掩蓋客觀歷史事實是徒勞的，大陸一九五八年出現的情況，既不是原來宣傳的三年嚴重自然災害，也不是後來說的，中蘇交惡撤走專家、撕廢合同，根本原因是十足地道的人禍，是毛澤東的三面紅旗，「左」傾路線對國計民生的重大破壞。

蘇聯、東歐農業政策的教訓

事實上，中國大陸的農業，包括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集團中的落後面，都應該由自己反省。

建國以來，中共農業政策按照蘇聯的樣版辦事，但蘇聯的經驗却不是成功的道路。而毛澤東的性格居功、誇大、多疑、粗暴，和許多共產黨的領袖的「共性」一樣，夜郎自大，獨樹一幟，對蘇聯的做法更從「左」的方面在中國貫徹，寧「左」勿右、「左」比右好、越「左」越好。按蘇聯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時間表，集體化始於一九二八年，也就是十月革命後十一年開始的，而中共通過「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把準備過程提前蘇聯三倍時間。斯大林一九三〇年在「勝利衝昏頭腦——論集體農莊的幾個問題」分析了當時試驗的三種形式：共耕社、勞動組合（集體農莊）、農業公社，指出前者落後於現實，後者脫離實際，肯定集體農莊是該階段的基本形式。遺憾的是毛澤東走得比斯大林更遠，他違反農民自願原則，離開生產力發展水平，缺乏必要的物質基礎，在一九五六年剛命名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只不過短短一年時間，完全談不上鞏固，一九五八年就一步登天，將大陸全體農民驅趕進人民公社中去。那個時候，大陸在毛

澤東的高壓強制下，賦諸歌頌公社好，大放各種「農業高產衛星」，各省競相謊報成績，糧食達到畝產幾萬斤，一時說大話有獎，說真話有罪，當時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就叫「三餐大飯不要錢」，公社包下了生老病死，有的出現八十多包的驚人紀錄，似乎一下子可以繞過貧困，直接進入「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天堂。可是假的就是假的，這個辦得到嗎？

斯大林時代，蘇聯農業集體化過程，對於生產關係所有制的變革，是遵循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具備一定的物質基礎。因而在步驟上，先機械化，後合作化。而實際上，當時蘇聯剛建成較大的農業拖拉機廠，並未具備必要的大生產物質條件，只有半機械化的農具、馬拉犁和收割機，所以，蘇聯農業長期處於比較落後的狀態。毛澤東領導農業合作化是當作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來搞的，同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作指導，將黨內不同意見的同志作為反革命，把當時的副總理、農村工作部長鄧子恢諷刺為「小腳女人」，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超越中國所容許的客觀條件，走先合作化後機械化的「新」道路，強迫大陸億萬農民加入公社。以後的實踐表明，中國大陸的超級合作化並未有使農業機械化起來，甚至二十年後，他的繼承人華國鋒高喊「三年內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也只是泡影。

第二次大戰後出現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吸取蘇聯的教訓，農業合作化的進程要緩慢穩健得多，基本上保留原有的資本主義農業，國家允許個人有到五十公頃（每公頃為大陸十五市畝）的耕地，東德甚至曾放寬到二百五十公頃以下的私人農場。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有相當大塊自留地，個體農民允許大量存在。因此，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農業經濟狀況和產量



曾經風靡一時的三面紅旗

要比蘇聯好，而蘇聯的情況又比中國大陸好。前者，平均每人每年糧食消費量一千公斤左右，而我國不過五百市斤以下水平，不到蘇聯、東歐的 $\frac{1}{2}$ ，食品結構差很大，上述國家的肉、奶、蛋比例很高。當然，不是他們的農業問題已經解決，和西方對等的國家比較，仍有相當距離，只是他們能正視現實，改變農業政策措施，用極大的力量投資去發展農業。並不像毛澤東那樣將減產吹噓為大豐收，却繼續收緊人民公社這個無產階級專政機器的鍊條，要是誰有意見，就請你「免開尊口」。

也許人們覺得：如果毛澤東能吸取蘇聯、東歐農業的教訓，聽聽鄧子恢、彭德懷如實反映的情況，中國大陸農業決不會走這樣大的彎路。但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集權制度下，這種錯誤如果不是毛澤東本人所犯，同樣也可能出現在黨內另一個領導人身上。

「新型社會主義農業」的實質

一九八三年中發一號文件，把「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包產到戶」），稱為「新型社會主義農業」或「新型的家庭經濟」，請問：果真如此？

文件說：「聯產承包制採取了統一經營與分散經營相結合的原則，使集體化優越性與個人積極性同時得到發揮，……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的新發展」（註：下同）過去搞合作化，成立人民公社，把這些原則理論說過多少遍，強調正確處理國家、集體與個人的關係。的確，要是把這樣的體制安排在國家統一計劃和公社的集中管理下，堅持統得太多、管得太死的政策，叫它為「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也未嘗不可。不過，在今天，這種統管太緊的「社會主義」應是越少越好，長此下去農民非窒息不可！

文件說：它「促進農業化從自給半自給經濟向着較大規模的商品生產轉化，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轉化」。這樣一來，終究打破馬克思、恩格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下存在商品市場經濟的斷言，承認它們存在的合法性和發展的必要了。這個曾在馬克斯巨著「資本論」第一章起首，稱商品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細胞的理論並不是邪門歪道，相反，是需要鼓勵發展的有用之物。認識上是大大提高了。其次，這裏所指的自給半自給經濟、傳統農業當然不可能是別的，只能是手工勞動和簡單機具耕作。把這樣十分落後農業加上「新型社會主義農業」的美名，決不會平添多少光彩。

文件說：「以按勞分配為主，同時有一定比例的股金分紅，就都屬於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經濟」。過去，毛澤東在人民公社搞的按勞分配有名無實，結果「幹多幹少一樣，幹好幹壞一樣」，「多勞少得，少勞多得，不勞即獲」，獎懶罰勤，所在皆是。毛遵照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提出的理論（在他的骨子裏，按勞分配只是資產階級法權，本質上是不平等的，搞不好就會資本主義復辟。「四人幫」罵之為「工分掛帥」、「物質刺激」）提出，必須在各個領域實行全面專政。現在，毛的這種理論被批判了，承包資金、材料和工具當作股金分紅，是完全合理的。過去採用吃「大鍋飯」的平均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原則並沒有實行。

文件還訂出一些具體政策，甚至可以僱工，購買主要生產資料（如大中型拖拉機、汽車等），經商、運輸、投資……這些幾乎都是一貫當作剝削剩餘價值，生產無政府狀態，自由競爭，階級分化等資本主義東西來批判的，這樣的政策可以叫「新型社會主義農業」嗎？這個名詞下面我們還要討論。

歷史上，社會主義有各種流派。馬克思生前有卡貝、巴貝夫、歐文、伯恩斯坦、考茨基；列寧、斯大林時期，第三國際和黨內有許多派別；當代有尼赫魯、鐵托、多列士、陶里亞蒂、格拉瓦、波爾布特。要知道，這個社會主義性質的實質，是不可能用文章理論、法令、決議來決定的。如果這樣的話，毛澤東的指示夠多的，社會主義早已在大陸實現了。

「包產到戶」是否「新型社會主義農業」，在邏輯上過多的進行名實之爭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在取消了公社的「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之後實行「包產到戶」，只能是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個體農民經濟，這樣的個體農業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當普遍，有些的比重還很大。目前在中國大陸，對這個體制最有發言權的應該算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國家農委主任萬里，他去年十一月五日在農業書記會議上講話：「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核心是一個「包」字，它把勞動者同生產成果緊密地聯繫起來，把責、權、利結合起來。……由於聯產承包，農民在集體經濟中的地位變了，由單純的勞動者變為既是生產者又是經營者，變為真正的主人翁」。又說：「農民最高興的兩件事：一個是實惠；一個是自主，過去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搞瞎指揮、大運動，生產上不去；現在農民有了自主權，可以獨立組織生產，安排

活計」(註2)。可以說,「包產到戶」的農民「地位變了」,有了獨立自主權,就意味已從人民公社的束縛下獲得某些「解放」了。至少,由農民家庭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生產方式來說,是個自由生產、自負盈虧、獨立的個體小生產者。

農業體制改革的模式

農業問題是一個世界性的令人困擾的問題。現在大量材料表明:西方農業優於東方;在社會主義國家之中,國營不如集體,集體不如單幹,中國的情況尤其如此。

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真正解決農業問題的,也只有美國、加拿大、澳洲、丹麥等一些國家,而農業發展的速度則法國佔首位,從一九五〇年,農業增產接近翻了兩番,成為世界主要農業產品輸出國之一,農業人口四百五十萬,佔總人口8%,農業勞動力二百萬,每人平均耕地一百二十四畝。法國農業就是以家庭式經營為主的中小型農場,二十到五十公頃的佔27.5%;二十公頃以下的佔61.8%,由於機械化程度高,農民還有時間兼營其他職業,其不變資本的比重高於工業,勞動生產率也高於其他部門,所以海外有些學者建議中共採用法國農業模式。

雖然,美國和其他幾個資本主義發達的農業國家,也和法國的情況相似,但中共是不可能採納的。因為:(1)大陸包產到戶或公社生產隊耕地的規模,機械化程度都比之相差太遠;(2)法國真正做到大力支農:巨額投資、價格補貼、災時補助、低息農貸(每年達二百至二百五十億法郎,利息在工商業貸款一半以下);(3)法國農業經濟是西方類型,以市場為機制調節生產和流通的;(4)中共老一套觀念(社會主義的無比優越性)不能公開化地學資本主義農業制度,儘管每年派出上萬留學生,引進大量外國技術設備。

亞洲的日本、南韓、台灣,農業都取得相當成就,能夠揚長避短。如台灣面積少,山地高原佔 $\frac{2}{3}$,人口密度是世界最高的,每平方公里五百〇四人,為大陸密度一百〇二人的四倍,但農業投資大、機械化程度高、扶助政策多、經濟作物發展好。同樣,由於政治原因不能仿效,何況許多條件因素也不一樣,而且它的土地政策是與「耕者有其田」相連的。

基於上述情況,中共只能在東歐選擇農業模式(因為中蘇關係尚未解凍,蘇聯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農業狀況不佳,農業部長被走馬燈式

地撤換,每年仍不得不拋售大量黃金進口糧食和肉類,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買主。)

東歐國家中匈牙利的農業發展最有成效,已由過去的農產品進口國變為大量出口,更因此消滅了長期外貿逆差。農民和工人的收入接近,食物消費相當豐富。根據一九七八年的統計,匈牙利、美國、中國每年平均消費量,分別是肉類(一四二公斤、一一七公斤、七點五公斤)糧食(一千二百六十七公斤、一千二百二十二公斤、二百四十八公斤)。匈牙利農業的成就深得到克里姆林宮的贊許。地處平原的匈牙利,可耕面積較大,有它的有利自然條件,但人口密度一一五人,比大陸略高,其主要農業政策如下:

——國家對農業大量投資,技術援助,大量機械、化肥、農藥、補助和低息農貸,個人貸款可達二萬五千福林(十福林兌人民幣一元)。

——一九六八年公佈「計算法」,規定要集體農業必須根據實際情況訂出計劃,但國家不干涉它的內容。

——改變農業生產結構,使畜牧業增長快於種植業,故肉、蛋發展特快。

——農產品價格政策:自由價格、保證價格、最高價格、固定價格。

——重視自留地的作用,明確它不僅是集體經濟的補充,而且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放寬飼養牲畜,經營種植的限制,現在社員收入百分之八十來自家庭副業。

——重視和保障個體農民,對他們實行退休制。

——征收農業土地稅,促進農地有效利用;征收所得稅,促進農業企業有效經營管理。

——發揮個體農民的作用,匈牙利現有個體農戶八萬,佔總耕地百分之十七,但產值佔全國百分之三十六,一半的肉、果、蛋、雞、奶;出口商品鵝、兔、櫻桃、蜂蜜的絕大部分。近年,國家從國營、集體農業撥出六千公頃出租,十四萬七千公頃坡地交給個體農戶經營。

——農工聯合企業經營好,農副產品、食品加工業工藝達到國際水平。

南斯拉夫基本上以個體農業為主,佔百分之八十四,國營佔百分之十六,由於南共主要理論家卡德爾認為集體化是對農民的剝奪,今後的道路是小農轉為農工,將土地出賣或租給國營農場,逐步消滅個體經濟。憲法規定,個體農戶可擁有耕地十畝,或坡地十五畝,個體



(圖片說明) 機械化問題急待解決

經濟生產佔農業總產值百分之七十六。現在中共放手大搞「包產到戶」的家庭經濟，調動小私有者的生產積極性，以提高農產量，在這個意義上是學習南斯拉夫的。羅馬尼亞農業以合作化為主，佔百分之七十四，國營百分之二十，個體戶百分之六，合作社自留地平均每人二點二畝，還實行利潤分紅。南、羅國家都對農業巨大投資和援助。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減少對農業的干預，放寬自由是非常重要的，更要繼續增加農業投資、獎勵和技術設備支援（無論如何不能剝奪），才使農業從國民經濟的落後部門趕上來。他們都肯定自留地的合法性，發揮它的作用並擴大其面積。這些實例使中共考慮中國農業在人多地少的情況下，將集體耕地分給個體農戶「包產到戶」經營，成為又自主，又實惠的體制。

蘇聯也不得不仿效匈牙利等的政策，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八日公佈「關於增加集體農莊莊員，國營農場成員，工人，職工和其他公民自留地生產的法令」承認過去低估自留地作用的錯誤，干脆將它推廣到其他部門，更放寬經營種植、飼養的各種限制，現在，蘇聯佔耕地百分之三的自留地，其農產值佔全部百分之二十五，提供蛋、肉、奶的大部分商品。

中共政策向自由化跨進

東歐匈、羅的政策，國家的大量援助和減少干預，南斯拉夫允許大量個體農民經濟為主體，獨立自主經營，本身就是最大的自由化。中共最近農業政策進一步改革，各種措施見諸今年中發一號文件之中。

中共農業經濟政策向自由化轉變，那是因為農民的不滿，農業的前景不妙，形勢迫着非改不可。

新的農村經濟政策能擺脫困境嗎？

陳雲說：「一要吃飯，二要建設」，話比較實際，在現有條件下，自由化是能讓農民鬆一口氣，調動一些積極性的。但是這主要仍是解決吃飯問題，不能奢望太高。

按照一號文件略評，其實每個問題都是可以具體討論：

——「決不放鬆糧食生產，積極發展多種經營的正確方針」，代替毛澤東過去「以糧為綱，五業並舉」，這裏，如果不准個體農民合法存在，給予自主權，可以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則和過去沒有區別。

——批判「左」傾的「一講合作社就只能合併全部生產資料，不允許保留一定範圍的家庭經營」。說明過去全部生產資料，機具等都被統死，現在稍放寬了。但是，由於實行聯產承包制，允許個體農民家庭經濟的存在，這方面已沒有問題。

——「放手發展合作商業」，可以克服官辦商業的，不合理佈局網點，劃地為牢，造成運輸調撥的積壓浪費；或收購壓級壓價，損害

農民；或工作效率低，堵塞各種流通渠道。沒有這一條允許個體農民經商，組織自由市場，遠途販運，物資交流，生產再多再好也起不了繁榮經濟的作用。

——「林木誰種誰有；個人造林有繼承權」。本來，勞動成果歸誰所有是不成問題的。過去，美其名曰公有制、國有化，長期伐多栽少，今後好多代都不會忘記林場、樂園變荒山的日子。

——「培養農村建設人才……普及初等義務教育，掃除青壯年文盲」，請注意，這樣的要求是不高的，但比過去毛澤東的三年解決掃盲，縣社辦大學的高調實際得多。根本上，要改變一貫只向農民要糧食、原料、資金，不替農民辦事的剝削農民做法；改變農村學校民辦，學生多勞動、少讀書的愚民政策。

——「必須廣開資金來源……基礎設施，如倉庫、公路、小水電等，可鼓勵農民個人或合股集資興辦」。毛澤東要解放全人類，替人民辦什麼呢？再不要向農民伸手了。

——「邊遠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生產水平仍然很低，群眾還有很多困難」；「森林過伐、耕地減少、人口膨脹，是我國農村三大隱患」；「要嚴格制止殘害女嬰、甚至殘害女嬰母親的行爲」。到底孰執致之？不論在東西方國家，稍有民主、自由、法制的社會，這是不存在的。

——「以按勞分配爲主，同時有一定比例的股金分紅」。過去施行勞動日，只按勞動時間，而不聯繫勞動成果，並不能真正實現按勞分配，依勞動的數量、質量和產量計酬。現在「包產到戶」，根據合同獎多罰少，獎勤罰懶，才能體現按勞分配。這裏已經實質上爲「按勞分配」恢復名譽，不像毛澤東時代經常把它作爲資產階級法權來批判。其次，實行股金分紅，對承包農戶出資金、機械、農具付息分紅，對鼓勵農民投資，機械設備更新是有好處的。

——「實行政社分設」。去年十二月的人大五屆五次會議通過新憲法，第八條保留人民公社，可經營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業，但還沒有大膽明確「聯產承包制」這個「包產到戶」的施行。第105條設立區、鄉政府。文件迴避了評述公社這一人所共知的毛病。

——社隊「企業可以試行經理（廠長）承包責任制」。改變過去一貫黨政不分、政企不分、政經不分弊病。現在，有些國營工商企業已在試行以董事長領導下經理（廠長）負責制

了，不提黨委領導，它仍然實際存在，但如果不搞以黨代政，經常干擾，對削弱官僚主義，提高行政效率，改善經濟生產是要好得多，經理（廠長）有職有權，只要把企業搞好，不應怕人說是紅色資本家，何況失職要承擔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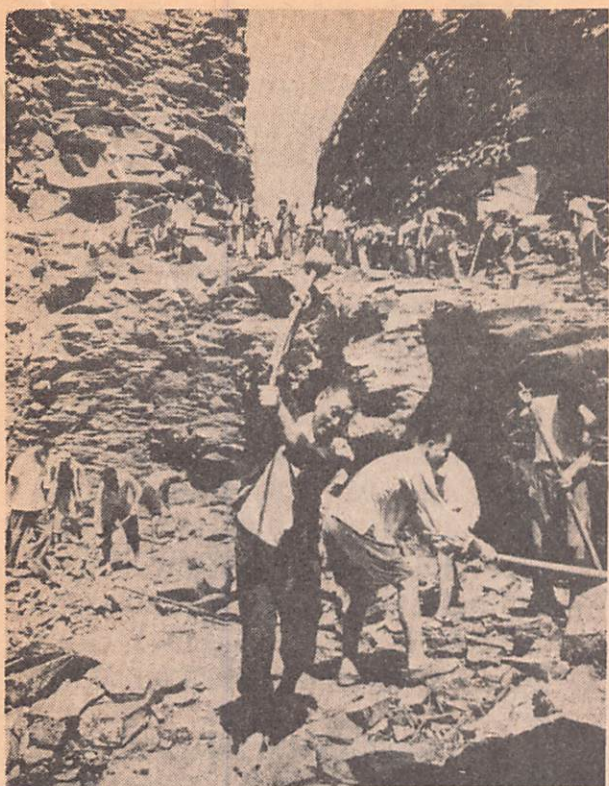
——「不能允許剝削制度存在……對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有利的……所謂的零工、季節工、專業工、技術工……都應當允許」。馬克思主義分析僱傭勞動剝削剩餘價值，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的基礎，這個允許僱工的決定是重大的修正。問題倒是，如果只讓「包產到戶」僅是長期維持自給狀態，個體小生產必然是有限的。如果要發展較大規模的商品經濟，那是非要僱工不可。

——「農民個人或聯產購置農副產品加工機具，小型拖拉機和小型機動船……應當允許；大中型拖拉機和汽車，在現階段原則上也不必禁止私人購置」。中國大陸農民沒有生產自由，生產資料所有制被剝奪，是個很大問題。馬克思主義認爲工人、農民被剝奪生產資料，被迫出賣勞動力和強迫勞動，是資本主義社會最基本特徵，這個可以購買生產資料的決定，可以說是糾正毛澤東社會主義的錯誤，但同時却又是對馬克思理論重大的修正。既然現在鼓吹「發財致富」，要大發展，靠手工體力勞動是辦不到的，拖拉機在東西方社會，個體農民早就有了，汽車更成爲工人的消費資料。誰也不能指望沒有機械、汽車的聯產承包制現有力量一直爬到農業現代化，進入共產主義大生產水平。「現階段原則上不禁止」，這樣吞吞吐吐，使農民擔心過去政策多變的重現。

(1)關於「翻兩番」的問題

中共提本世紀末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指標每年遞增7.2%，是相當高的，但沒有單指農業，統計局數字說，農業總產值從一九五二年四八四億元人民幣增加到一九七九年的一五八四億元，即廿七年增加三點三倍，平均年增速度4.5%（註3），註明是「作了核實修訂」。這個數字的確是十分高的，如果按照這個速度，一號文件中「打破了我國農業生產長期停滯不前的局面」就不公正了，這個速度應該說人民公社有功無罪，何須改變體制政策。現實上改變公社體制，說明統計數字是值得研究的。

匈牙利農業在社會主義國家首屈一指，一九六〇～一九八〇年總產值才翻一番，每年遞增3.3%；法國農業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速度佔第一位，近年速度且超過工業，一九五〇



農民在「自力更生」

～一九八〇年的卅年間，其總產值才接近兩番，倘照統計局的數字，中共在大陸的農業經濟發展，早已比東西方的匈、法更快。其目前制定農業未來發展計劃的藍圖比現在還要躍進。

匈、法兩國農業迅速發展有它現實的條件，是和中共不能比擬，這與他們國家大量投資、低息貸款、保護價格、工業機械化和技術設備水平分不開的。匈牙利近年農業投資佔財政支出總額 17—19%，中國大陸一九八一年只佔 6.76%，為預算各項撥款之末，僅七十六億元人民幣，依大陸農業人口平均每人不到十元。法國農貸利息在工商業放款一半以下，機械化水平很高，平均每個農民耕地一二四畝，養活 26.5 人，農業勞動生產率已高過工業部門。目前蘇聯、東歐各國農業投資，機械、化學、動力的水平也比較高。如果中央所採的措施和條件跟不上，農業總產值或主要產品糧、棉、油、肉等翻兩番的目標是不能實現的。（附統計表）

(2) 幹部特權和剝削農民

特權來自社會制度。大陸千萬個社隊小王國裏，幹部是反對「包產到戶」，藉口會引起社會主義倒退，資本主義復關，說這要黨員何用？實際上不願放棄特權，繼續佔有農民的奉

獻，對「發財致富」眼紅。中共推行包產到戶，公社套在農民身上的枷鎖仍然存在，不過稍微減輕束縛而已。搞得不好，區、鄉政府又多了兩個婆婆，農民這個小媳婦更難當。文件第二條「使農村的剩餘勞動力離土不離鄉」，意圖在農村經濟發展後，也要農民不離鄉土，這種人身依附和超經濟強制就可能存在，農民自由受到限制，積極性有限，產量也是有限的。現在，各地生產搞得多，收入多的農民，不是到處發生幹部要撕廢協議合同嗎？因為他們的手裏仍掌握管、卡、壓的權力。

中共對農民取多予少，搞共、平、調，到處伸手的情況仍非常嚴重，每年拿去大量的糧食、原料、勞力和資金，去年的支農援款也只有七十七億人民幣，對大陸八億多農民是微不足道的，重點還在水利、水電、國營農場、主要商品基地和出口基地。而信用社吸收農民、社隊的存款三一九億，貸款只是九十六億，這樣就有二二三億元轉到國家手上去使用，還是長期以來「以農養工，以輕養重」的籌集建設資金的方針政策。就拿這筆貸款，用之於農也是很微薄的。匈牙利的個體農貸二萬五千福林，折合二千五百人民幣。中國的貸款平均每人只有十二元，為他們的二〇八分之一。農民的各種繳公義務負擔極重。湖南省湘陰縣灣河公社愛民大隊第十一生產隊，努力增產一萬一千斤稻谷，實際上全部上繳了，調工攤派佔該隊總工分 22%，各種義務工包括幹部誤工補貼、文教福利、農田基本建設等種類名目繁多，其中公社無償攤派十八項，調工二五，八六二個（註 4）。廣東省增城縣新塘公社群星大隊社員負擔項目除幹部補貼、社辦企業、公路交通、水利基建、民辦教育、合作醫療，還包括民兵訓練、軍屬補助、計劃生育的結紮補助等，每人全年 29.5 元（註 5）。如按統計局數字一九七九年社員農民從集體取得收入全年 102 元算，上述負擔接近收入的 1/3。此外，中共規定的價格政策不合理，城鄉工農產品剪刀差相當大，通過各種不等價交換來剝削農民。

(3) 小塊土地經營如何實現農業現代化

新的農業經濟政策，重視個體經濟和自留地的作用，要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大陸全部耕地不足十五億畝，八億二千萬農業人口平均每人約 1.8 畝，且西北稍多，東南地區更在一畝以下，自留地每戶也只有 1~2 分田，不及蘇聯、東歐國家的十分之一，真是無米之炊，巧婦難為。

農業現代化是個可變的概念，先進的技術，機械化、化肥化、水利化、電器化、自動化、良種化等，才能使農業品種和產量有新的突破。由於世界各個發達國家對農業投資狂增，農業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固定資產設備比重已逐步超過其他部門。大陸農業機械不足，其精密度和技術水平很低，基本上落後半個世紀，追趕先進相當吃力。「包產到戶」在小塊土地有限度的增產，有它的侷限性、暫時性、過渡性，從長遠看來，與農業現代化的大生產是不相適應的。

過去，毛澤東說：「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話不錯，可惜是一句空話。大陸農村人民公社搞了二十多年，機械化不起來，還是靠手工體力勞動，終年勞碌，吃不飽、穿不暖。萬里在去年底農業書記會議上不得不承認：「全國有一億五千萬以上的農民連溫飽問題都沒有解決，最困難的有十大片，共二百三十一縣」（註6）。其他縣農民生活狀況怎樣呢？他沒有說，但從上述國家的消費水平比較，統計數字還是看出來的。

(4)民主制度與政策的連續性問題

政策是否正確，有了決議，用文字寫出來還不等於現實。

「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中共領導換了好幾批人，鄧小平也上台三次，差一點遭害，三中全會以來，他的改革也不是很順利的。現在林彪、「四人幫」餘黨大量存在，盤踞各部

門要職，「左」毒還沒有肅清，他們蠢蠢欲動，分別從「左」或右的方面干擾，準備待機反攻。以黨內派別出現的官僚特權集團也抓住既得利益不放。在軍內尤為嚴重，高級軍官抵制專業化、知識化、年輕化的幹部政策，嚮往封建世襲，不願放棄權力，毛澤東教導「有槍即有權」的觀念很深。

大陸農業政策多變，朝令夕改，人民公社的體制，越亂越變，越變越糟。農民受自然條件限制，生產週期長，有的害處並不是馬上發現（人民公社之害明顯，當年很快看到，但人民對毛澤東的封建專政無可奈何）！一旦覺察早已泛濫成災。有的好處也不是短期生效，文件顯然是擔心百姓小民害怕以往政策「言而無信」，提出「對過去的有關法令、法規，要一一進行清理，宜留則留，宜廢則廢。所有立法都要以適當形式佈告周知，以便做到有法可依，違法必究」。話儘管那麼說，但上台一風來，下台一風吹，往往好的難得實現，壞的總改不掉。

政策的連續性是從社會民主制度產生，並由它加以保證的。沒有社會民主制度，通過一定的立法程序選免修改，各級大小當官的「有權即有理」，人民只有被管的義務，不能直接選出代表當家，長期以來，一些本來可以避免的損失就不能幸免了。

此外，大陸農業，還有僱工、人口、培養科技人才、利用市場和價值範疇，農業布局和城市關係等，這裏從略。



結 束 語：

最後順帶說明一下：

中共在解放以來，農業建設撥款很低，近年還有下降的趨勢。(1)鄧小平口頭上也是支農，實際上却是坑農，在行動上也沒有為鞏固工農聯盟的經濟基礎着眼，難怪人代會上農民代表說，經濟上、文化上沒有解放。(2)調整

國民經濟的新八字方針，仍沒有以農、輕、重為序安排，或繼續在重、輕、農的比例上舉棋不定。(3)注意到這極其少量的農業撥款，往往為地方政府擴充「地盤」，大搞其他計劃外基建，尅扣挪用，十分普遍嚴重，使實際使用數字大打折扣，農村中的文教衛生事業也是如此。

中共大陸財政支農撥款統計

單位：人民幣億元

年 度	財政總支出數	其中支農撥款數	佔財政支出比率 %
1979	1,273.9	90.1	7.07
1980	1,212.7	82.1	6.71
1981	1,089.7	73.7	6.76
1982	1,136.9	76.5	6.72
1983	1,262.0	77.5	6.14

註1：中共中央1983年中發一號文件，「當前農業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四月十日。

註2、6：萬里：「進一步發展已經開創的農業新局面」。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註3：「1981年中國經濟年鑑」。VI - 5頁。

註4：「中國農民報」，一九八一年七月廿三日。

註5：「農業經濟問題」月刊，一九八一年第七期。

農民家庭副業，
既利個人家庭，
又利國家經濟。



更正：

第四期第十頁右邊
第四行「總統」改
成「副總統」。

第二次上山下鄉

蜀中



(一) 新的「中產階級」及其代言人

近年來，中共爲了挽救文革十年造成的經濟政治危機，不得不實行戰略退却，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對內搞活經濟，對外經濟開放，以「現代化」的口號來爭取外援，同時以「四個堅持」的大棒來壓制一切持不同政見者，加強專政功能，扼止「搞活」和「開放」所產生的副作用。

但是中國共產黨所採取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政策，却產生了當局意想不到的結果。農村實行生產責任制，幾年內改變了不少地方的低產面貌，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現了人人爭富，家家致富的新局面。經濟體制改革的推行，打破了原來國家壟斷的僵死狀態，造成了國營經濟、集

體經濟、個體經濟、中外台資經濟等多種經濟成份並存的局面。國民經濟狀況的好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社會上造成了一部份先富起來的人（包括農村的「專業戶」、城市的「個體戶」、專業技術人員，各行各業的精英份子等），形成一個類似西方社會「中產階級」的特殊階層。當今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正朝著一個多樣性的方向演化。

依照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原理，社會經濟結構的多樣性，必然會導致政治制度的多元化。各種不同的經濟成份和社會階層，尤其是新近出現的「中產階級」，爲了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必然會尋求政治上的代理人，力求參與政治制訂過程，以保證對他們有利的現行政策的穩定性。廣大人民，尤其是農民經濟狀況的好轉，增強了他們經濟上的獨立性，擴大了自由選擇的領域，提出了對精神文明產品（文化、科學、技術）的新

需求。這些都為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奠定了經濟上的基礎。

那麼，誰能夠成為中國新經濟成份和新中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呢？就目前狀況來看，不外共產黨內的改革派，各民主黨派，及一部份有遠見、有抱負的中青年知識份子。切不可小看民主黨派的作用。在共產黨不得不推行重視知識份子政策的今天，以知識份子為骨幹的各民主黨派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有一半是民主黨派的成員。民盟成員中有一萬多名中學教員，其中一半以上是具有豐富教學實踐經驗的老教師。民進的會員多數是師範院校和幼教工作者。農工民主黨有許多優秀的醫學專家，九三學社成員以著名科學家為主體，民革則以會計、經濟管理、外語人才見長，民建和工商聯成員有着豐富的經營管理經驗和生產技術才能。總之，民主黨派手中掌握着為實現四化所急需的智力方面的優勢。連一位中共領導人亦承認：民主黨派的成員比較有知識，有比較廣泛的社會聯繫，還有為國家出力的強烈願望。發揮民主黨派的智力優勢，派科學家、教師、經濟技術人員等赴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講學，交流經驗，培訓專業人才，進行技術諮詢，是開創民主黨派工作新局面的一條好途徑，大有可為，前程遠大（見「人民日報」1983年3月29日三版）。這就是所謂「智力支邊」活動，目前已初見成效。另外，一些居住內地，大城市的知識份子亦自願報名到農村、邊疆地區去發揮作用，尋找「英雄用武之地」。最近幾年的大專畢業生也不乏報名到農村、邊疆地區工作者。這一趨勢，不妨稱之為「二次上山下鄉」或「知識份子與工農結合的新潮流」。

（二）廣濶天地，大有作為


這一次的上山下鄉，知識份子再也不是「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而是農民舉雙手歡迎的知識傳播者。這種智力支邊、科技支農的效果，決不僅限於經濟方面，其長遠意義是無可限量的。在傳播科學技術知識的同時，這批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識份子也會自然地在廣大鄉村和邊疆播下民主、法制、自由、人權觀念的種籽，必然會贏得中共歷來控制較弱的這些地區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也會逐步造就一批來自工農、代表工農的新一代知識份子，亦有可能產生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政治活動家，以取代那些不學無術、好吃懶作的中共基層幹部。知識

份子一旦與工農群眾相結合，便會形成強大的民主力量，產生新的利益集團或壓力集團，同中共當權派（保守派）相抗衡。而中共改革派可能屈服於人民的壓力，採取進一步的改革措施。當然亦不排除中共改革派與保守派發生公開衝突的可能性。由於全國民心所向，改革的潮流不可抗拒，現代化的進程必然是民主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

在智力方面具有優勢的民主黨派和一些知識份子適應時代的要求、人民的願望，果敢地作出決定，採取行動，以智力支邊支農，在目前來講也有着重大的意義。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好的建立「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的機會，它以事實證明了，誰是真正以實際行動為國家分憂、為人民服務。過去被中共踏在腳下的民主黨派、知識份子在國家人民需要的時刻，毅然犧牲個人利益，勇於到條件較差的農村邊疆地區去工作，其風格遠遠高過那些貪污腐化、追求特權、一心留戀大城市、甚至濫用職權把親屬調入城市的中共幹部。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人民自有明鑒，也會作出正確的選擇，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最終會贏得人民的信賴，成為人民的公僕。



從目前形勢來看，中共現行政策的連續性已初步獲得組織上的保證：中共改革派在黨政領導機構內已取得優勢，各民主黨派在人大、政協獲得更多的席位，有了更大的發言權及諮詢作用。現有的這一點成果是經歷了多年的奮鬥才得來的，總算比過去有所進步。前面的路程還長，還需要一切有志有識之士付出艱巨的勞動。真正深入到工農大眾之中，在農村、邊疆做一番傳播知識，啓迪民智的扎實工作。隨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全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新的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集團的出現，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大有希望的。民主之花一旦扎根於祖國遼闊的大地上，必能根深葉茂，茁壯成長。如果套用毛澤東的一句話，我們可以說，農村是「廣濶天地，大有作為」。



專政之下， 豈有民主？

大陸留學生 陳偉

我是一名中國大陸留學生，從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在海外推展以來，最令我心中激動的是，我已找到了一個有民主氣氛講話機會。

爭民主法治，爭自由人權，反封建專制，反官僚特權，這對我國當權派來說，當然是感到深惡痛絕的；但是對於我們十億老百姓來說，實在是勢在必行。今天，全國人民都深切感到，我國各級領導班子，雖然口口聲聲地強調民主與法治的重要，實際上他們缺乏民主法治的觀念，仍憑着「領導意志」在辦事，當權者的政策變成了國家的法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在這種「無法可依，有法不依」的情況下，不知製造了和正在製造着多少冤、假、錯案。

其實，民主就是一種生活方式，及是近代歷史上作為專制的對立面而產生和發展的。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就是在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它與自由、平等、人權密切的結合，成為現代文明社會的基礎，也是一切文明國家所採行的政治制度。

看看我們國家，却實行着一種叫做「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什麼叫做「人民民主專政」呢？簡單的說，是「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照列寧對專政的解釋是：「專政這個科學概念的意思，無非是無所限制，絕不受任何法律、任何條規所約束，而直接憑藉於強力的政權」。這就是說

專政就是暴力、就是鎮壓、就是獨裁的意思。至於「人民」的定義，是可以隨着階級關係的變化而改變，也可以隨着獨裁者個人的意志而轉移。只要誰違反當權者的利益，誰就被視為敵人而予以鎮壓。

對這種假「人民民主專政」之名，行「個人獨裁」之實；假「無產階級專政」之名，行「法西斯統治」之實；假「人民」「革命」「國家」名義，對人民群眾實行壓迫和剝削，人民雪亮的眼睛是看得很清楚的。早在一九五七年鳴放期間，人民大學的林希翎，就指出我們國家存在的「三害」，即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及主觀主義。其根本原因，在於上層建築某些政治制度不好。她說：「以黨代政問題存在，共產黨是執政黨，實權都在共產黨手裡。法律是形式主義，我們沒有法治，法院判刑是審判員說了算。……你對領導有意見，就是反領導，反領導就是反組織，反組織就是反黨，反黨則反人民，反人民則反革命」。在那時期，在「看！這是什麼言論」的「反面教材」中，署名「天、水、心」的「民主乎？黨主乎？」也說：「1949年至今已八年，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憲法也頒佈了。有腦筋的人想一想，民主生活是否充份？答案是否定的。所謂民主者空有其名。黨獨攬一切、專斷一切，黨即人民全體，黨即國家，黨即法律，所謂民主者，實際上已被黨主所取代」。1967年10月「湖南省會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簡稱「省無聯」）

的紅衛兵組織，在散發「中國向何處去？」的文章中，指出我們的黨已「成了紅色資本家階級」，「他們與人民的關係，已從過去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變成剝削和被剝削、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故「罷官革命，人革命不能解決問題」，「必須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徹底砸爛國家機器」。

到了1974年11月，轟動全國的「李一哲大字報」，更直接指出我國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根本就是封建法西斯專制，我國人民從沒有享受過民主生活。大字報說：「我們的憲法、黨章、中央文件，不是寫上了人民的民主權利嗎？是的，寫了，不但是寫了，而且還規定了『保障人民民主』、『不准打擊報復』，嚴禁『逼、供、信』。可是事實上都是實行法西斯專政。」

對於「社會主義制度」，大字報批評：「新的資產階級佔有方式的本質，就是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條件下，化公為私。……某些領導者將黨和人民給予的必要照顧膨脹起來，變為政治和經濟的特權，並無限地蔭及到家族、親友，乃至實行特權的交換，通過『走後門』之類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上、經濟上實際特權地位」。儘管王希哲自稱為「改良主義者」，並以馬列主義的信徒自居，由於向當權者提出了民主要求，還是慘遭逮捕和鎮壓。

記得列寧在談到革命問題時曾說過：「革命是在統治者無法統治下去，而被統治者不願再受統治的時候才爆發的」。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下鬧出來的。因為人民要過自由民主的生活，要做國家真正的主人。

鄧小平同志上台以後，人民是不是有了民主呢？答案是否定的。鄧青天在利用人民的輿論，打倒汪東興，孤立華國鋒，實現奪權目的後，就覺得魏京生這些人和一些民刊言論，已直接對他的統治構成威脅，便轉過頭來誣指民刊是「細菌」，是「傳染病」，民主牆民刊被說成是無政府主義的產物。在「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罪」，「破壞安定團結罪」，「反黨反社會主義罪」的新刑律下，黨和國家領導人竟以中央的名義進行赤裸裸的無憲法主義，對民運份子進行了殘酷的鎮壓。

打倒四人幫以後，我們國家雖然也搞了「刑法」、「刑事訴訟法」，但這些在建國三十年之後才搞出來的刑律，也被官僚特權階級徹底的破壞了，這些騎在人民頭上的官老爺，大幹危害人民利益的勾當，比起四人幫橫行時代更為突出。在「刑不上大夫」這種封建法制特徵下，使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成為一句空言。

三十多年來，全國幾千萬過着無法無天政治生活的幹部，已養成了不知法、不守法的習性，弄得我國社會仍然處於落後狀態。近年來，新當權派為了克服這一危機，才強調必須把經濟搞上去，說什麼實行四個現代化。但是四個現代化已實施了幾年，事實證明，使經濟調整一敗塗地的是官僚主義，使社會產生不安定的因素也是官僚主義，官僚機構與經濟調整、民主改革發生矛盾，就是產生目前現狀的根本原因。

民主與法治在現代國家和人民的政治生活中，佔着相當重要的地位。我們國家因為一向缺乏健全的民主與法治，所以落得今天的政治腐敗。四人幫幾個小丑，竟能橫行霸道十多年。大批群眾和幹部，在他們誣陷下含冤九泉。現在當權者，對民主與法治的重要性，雖有了一些認識，但是他們所搞的仍然不脫離四項基本原則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更成了當權派鎮壓人民爭取民主的利器。若再聯繫統治階級的封建法西斯本質，我就難以對他們寄以任何期望了。



征 稿 啓 事

本刊決定自第四期開始，逐步轉成綜合性月刊。熱誠希望各界朋友、讀者、作者給我們來稿，特別是與民主運動有密切關係的文章，將優先採用。

本刊歡迎來自大陸、台灣、香港、海外各地的稿件。

本刊歡迎多姿多采的形式，不拘時評政論，專訪特稿文藝創作等等。

本刊樂意接納各種不同觀點，並相信真理愈辯愈明。

本刊稿酬為每千字十元美金，較優秀的作品另計。

來稿最好用原稿紙，並留底稿，稿件原則上不退。稿件請註明姓名、地址、以便郵寄稿費。

本刊編輯部

韓愈不是中國人？

——評「台灣民族」的迷惘

阿修伯

洪哲勝先生在紐約「台灣與世界」第一、二期（八三年六月、七月）上的大文「台語發展史巡禮」分析探討了台灣話的起源和發展演變，十分生動有趣。說來說去，台灣話的主要來源還是中國漢民族的語言，洪先生信手拈來就有「詩經」「晉書」「隋書」「左傳」「史記」唐詩等等典故。正如洪先生所言：「多數語言學家都同意台語保存最多的漢語上古音」「台語在這方面是古漢語的正宗繼承者」，洪先生並譴責「住在中原的漢人在外族長期統治下已經遺失了這些寶貴的成份。」「數典忘祖！」他並說：「像韓愈那時的人如果今日來美國，一定樂於參加台灣同鄉會……而不願去台灣同鄉聯誼會或松社講『國語』。」說是非常有意思。不過，如果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昌黎先生真的去參加「台灣同鄉會」，希望他不要像曾燕山先生一樣被打得頭破血流才好。

今年五月三十一日，美國人口統計局發表居美各族裔人口。華裔人口本來是超過九十萬，但因有一萬六千多華裔「改宗」成爲「台裔」「否莫山」(Formosan)而使得華裔人口不足九十萬。許多台獨組織和「台灣同鄉會」爲此歡喜雀躍，慶賀「台灣民族」之誕生。「台灣公論報」六月四日頭版大字標出「台灣人與中國人劃清界綫」！並呼籲其他二十多萬沒有認清「民族大義」的居美台灣人，趕緊下定決心脫離華裔，歸宗「台裔」。洪哲勝先生本人也是贊成「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民族不是中華民族」的。

人人都知道漢民族是「中國人」及「中華民族」構成的絕大多數主要成份。照洪先生在「台語發展史巡禮」一文中的論證，很明顯的台灣人才是正宗的漢人，台灣人保留的漢文化的語言最多，台灣人絕對沒有數典忘祖，反而是大陸中原的所謂漢人所謂中國人才是數典忘祖。但是，正宗漢民族的台灣人却又不是中國人，「台灣民族」却又不是「中華民族」不是華裔了，怎不令人興起「台灣民族」的迷惑呢？參加了「台灣同鄉會」講着正宗古漢語（台語）的韓愈先生也免不了會被弄得一頭霧水，搞不清楚他自己到底是不是中國人是不是華裔了。

台獨人士不滿國共的政治，因此而有獨立建國的崇高理想，無疑是十分令人敬佩的。但是，要獨立建國又須要有自身獨特民族文化做基礎，台獨人士我來我去，這民族文化的基础却始終難於「脫出」中國漢民族漢文化的籠罩，他們又不肯面對現實，反而絞盡腦汁費盡心機要來創造「台灣民族」「台灣文化」，拼命掙扎却又總是逃不出漢民族漢文化的「陰影」，就如同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祖的手掌一樣，愈多掙扎愈造成迷惑、混亂、矛盾甚至造成笑話。爲什麼不直接了當、坦白乾脆、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地承認漢民族漢文化，並以之爲基礎，再吸收、融合其他民族文化來建立光輝燦爛的台灣國呢？世界上同民族同文化的不同國家真是太多了呀。

洪先生談到「唐山人」這個字眼說：「這些人不管是做生意的、做官的、還是來投機冒險的，都想在台灣撈一把，然後帶着滿裝着金銀的口袋回歸「唐山」，光宗耀祖，恩澤子孫。這些人在血緣上雖然同是漢人，但是他們的意識和台灣人完全不同。台灣人爲了加以區分，就把他們叫做「唐山人」。」

三百多年來中國大陸人移民台灣，和其他許多華僑移居海外一樣，起初都沒有定居的意思。往往都是單身漢，冒險渡海闖天下，等到事業有成、安

家立業，也就不想再回中土，就在台灣定居下來。這時，有新從大陸過來的人，往往就被先來的同胞呼為「唐山人」。這個字眼並沒有任何的惡意，反而是十分的親切，但是照洪先生的「政治化」的誇張解釋，「唐山人」居然是和台灣人大不相同的「醜惡的中國人」。至於三十多年前，由於「新唐山人」的惡劣表現而發生二二八事件，台灣人乾脆罵「唐山人」為「阿山仔」「豬仔」了。更有偏激之人稱中國大陸為「豬欄」了。人與豬自然要劃清界綫，宜乎「台灣民族」之成立，台灣人之不是中國「豬」了。本是同根生的同胞，如此隔閡，如此棄嫌，如此仇恨，能不令韓愈先生為之扼腕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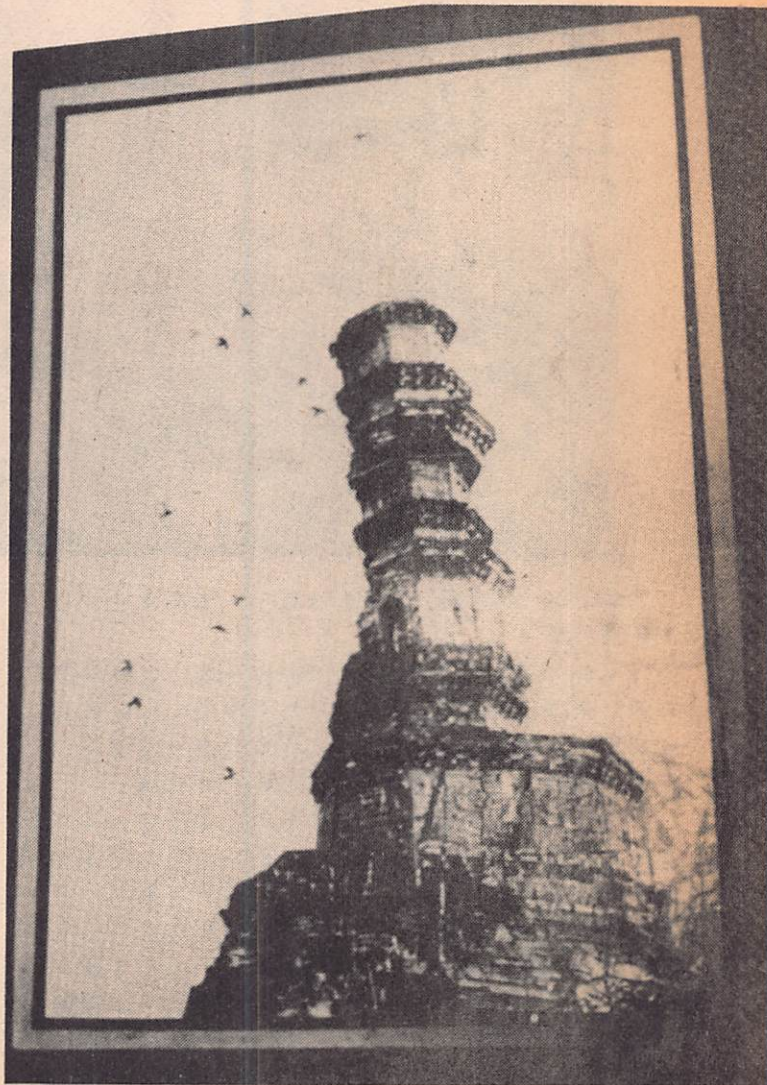
台南連橫先生在他所著「台灣語典」中說：「好客之風，台灣為盛。蓋我先人皆來自中土，闢田廬，長子孫，以建立基業。故中土人之來者多禮待之。台人謂漳泉曰唐山，稱初至者曰唐山客。」這種說法實在比洪先生政治掛帥的說法要平實、中肯得多。連橫先生考據古山東人烹魚之辭「泔」，台南婦女皆知之。四川人稱「阿姐」經福建而傳台灣，是則今日台灣人與「新唐山人」仍然有着骨肉相連的親密關係，實不應故意加以分化挑撥也。中國人本來就不團結，現在又出現「台灣民族」的分裂運動。萬一由此而產生連鎖反應，什麼「廣東民族」「福建民族」「上海民族」……紛紛出現，「中華民族」將於旦夕之間崩潰！

連橫先生是一位深明民族大義的人，他如果在美國參加族裔普查，絕不會否認他是華裔。他說：「台灣語中有所謂食教話者，別成一種。」「其最壞者則稱英國為祖家，謂英國之貨為祖家貨。竟自忘其為何國人，哀哉！」看看今天，身十字架、口呼耶穌基督，要在台灣建立「上帝國」，認洋人為「祖家」的台灣基督教老會的種種「食教」作風，仍不免使人嘆一聲：「哀哉！」也。連氏又說：「顏之推氏有言：今時子弟但能操鮮卑語，彈琵琶，以事貴人，無憂富貴。！何其言之愧而戚耶。今時子弟能操東語唱和歌，而不能富貴，幸而得事貴人，不過屬吏下士，一朝得志，趾高氣揚，則不屑操台語，苦自忘其為台人矣。」今日吾台同胞中天天「操東語唱和歌」而趾高氣揚，不屑操台語者固仍大有其人在也。尤可怪者，正就是此輩人士特別熱衷於宣揚「台灣人非中國人」「台灣民族非中華民族」，觀其生活行事種種做為似乎應該是「台灣人是日本人」「台灣民族是大和民族」才對了。真正具有「台灣民族」自尊自信的革命志士們，你們怎麼能容忍這種現象存在啊？

第二期「台灣與世界」有陶冰先生「大家來寫

台灣話文吧！」一文。陶先生提倡台灣語文，主張「儘量採用跟普通話共同的字眼」。這是要與華人華文合，而不是要與華人華文分。其實中國的國語（普通話）和國文不應該排斥各種漢語或其他少數民族語方言。方言中，有古雅的有活潑生動、多彩多姿、寓意深刻的話語，正可以豐富我們的國語國文。方言與國語是親密的、融和的；不應該由提倡國語而排斥或消滅方言。同理，也不應該打着方言的旗號而分裂民族，造成中國人之間的對立仇恨。

連橫先生在「台灣語典」中主張：「余意短篇尺簡，可用方言；而灌輸學術發表思想，當用簡潔淺白之華文。以求盡人能知，而後可收其效。」這更是認為台人者華人也，台文者華文也。特錄之如上，以供洪哲勝先生陶冰先生以及許許多多關心台灣語台灣文之「台灣民族」同志們之參考。





香港的局勢搞到今天這個樣子，實在是出乎各方面的預料。

中共領導人一廂情願的「收回主權，保持繁榮，港人治港」想法遭受了前所未有挫敗。香港對這種閉門造車想法的反應是：(1)股市披靡；(2)資金、人才大量外流；(3)港元劇跌；(4)房地產狂瀉。

人才和資金是維持香港繁榮的兩項原動力。而這兩項原動力又必須在自由的社會和安定的政局中才能得到發展。質諸三十多年來中共的歷史，什麼令人不寒而慄的記錄都有，可就壓根沒沾上自由安定的邊。香港人可說是世界上最機靈，也最了解共產黨的人民。「久住莫坑邊，那能不懂臭？」因此，任何形式上的保證和國家民族的大義都不能取信於驚弓之鳥的香港人。只要主權一被收回，看他們雞飛狗走吧！

回到香港問題的本身，就會發現另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麼香港的主權問題早不提，晚不提，却在離一九九七還有十多年的情形被大加強調？這就不能不佩服英國人搞外交的手段。

從近代史來看，世界上玩弄外交手段的沒有一個比得上英國人。中國人跟他們比起來還在襁褓階段。從鴉片戰爭開始，經過兩次把美國拖下水的世界大戰，一直到去年福島戰爭擊敗阿根廷為止，英國人幾乎就沒有輸過。其老謀深算的頭腦和折衝緩阻的毅力，中共比不上。

在所有殖民國家中，除英國外，其他如德、法等都被其殖民地人民所憎恨。譬如法國，非要打輸一場奠邊府之役才讓越南獨立。越南獨立後因缺少眼光遠大的長程計劃而致紛擾不堪，一直禍及於今。英國就不同了，由於其統治手段的高明，一般人

民並不憎恨它。它讓一個個殖民地相繼和平獨立，但又不脫離掌握。組成了大英聯邦，遙尊英女皇為元首。而其聯邦的組織和能力，德、法、義、美，誰能望其項背？

假使今天西班牙膽敢強行收回直布羅陀，英國鐵定會出兵，像打阿根廷一樣把西班牙打得落花流水。同樣的，如果今天英國自信有能力能在戰場上擊敗中共，你放心，它絕不會談什麼九七大限問題。但如今中共不是阿根廷，動武解決不了問題。與其到時坐等香港被收回，不如現在就把問題擺到談判桌上，再從各方面施加壓力，這樣或有一絲勝算。他們深切的了解到，香港對中共遠比對英國更為重要。中共三分之一的外匯以及四化所需的資金、人才和技術在在都要香港供應。你不是那麼需要香港嗎？好吧！就請您現在表個態。如果表態是讓我在九七年後繼續統治下去，最好，一切照常。如果是說要收回主權，可以，那就看我讓香港人表演「出埃及記」吧，不要到一九九七，只要一九八五，香港就成了死港。想要坐享其成的在一九九七接受我經營了一百多年的繁華香港，別作這個夢了！而中共領導人竟然表了態，真使人搖頭嘆息。

寫到這裡，不得不令人緬懷周恩來。中共能有今天的國際地位，他厥功至偉。他辦起外交來的高明手腕和翩翩風度，為人折服。他到底是見過洋世界的知識份子。只可惜他選擇錯了一個政權，一生又受制於一個專橫、殘暴的獨夫，不能有所發揮。但他在外交上所表現出來的作為，今天的中共領導人應當學習。

周恩來在香港問題上，始終用一句話來打太極。那就是：「這是歷史留下來的問題，會在適當時機加以解決。」這「句話」真是可圈可點而又不失其真。他了解中共是什麼，也了解香港人的心態。知道只有這句話才能穩住香港的局勢，繼續坐收香港的利益。（歷史問題加上適當時機，給人一種遙不可測的印象。）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那像今天的領導人，自以為香港人個個都人心思漢，胸懷祖國。結果事與願違，搞到了現在大亂。

去年香港記者隨同英首相上北京採訪。曾就香港前途就教於趙紫陽。他老兄搖頭擺尾地強調：「主權一定要收回。」其無知、蠻橫的態度，給香港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香港股市立刻大瀉，報章稱：「皇恩大瀉」（粵語瀉與赦同音）

老實說，在對香港的問題上，中共最好是不表態。一定要表，也只能表周恩來的態。「適當時機加以解決」這中間有多大的轉圜餘地？中共要怎麼做，在何時做都悉聽尊便。甚至可以在條約屆滿前

一天，或任何一天，像阿根廷對福克蘭一樣來個突然佔領。那樣不但資金跑不掉，人才技術也走不了。一頭「大肥羊」就乖乖的落了口。但那班領導人不做此圖，竟在條約到期前十幾年迫不及待的表了態。讓香港這隻肥羊一天天瘦下去，幾乎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周恩來於地下有知，相信也會再氣死一遍。

香港的非官守議員李鵬飛率團訪問北京，歸來後發表了意見書。是香港諸多北上訪問團中唯一敢說真話，克盡道德勇氣的一個。其中心要旨是：「中共保證不可信，港人治港不可行。」這意見書馬上得到了全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熱烈響應。這下子打開了中共領導人的「眼界」：原來香港人竟是這般難纏。好吧，不信我們的「人治」，「法律」你們總該服了吧。乃藉新任政委安子介之口拋出了「港法治港」的口號。沒想到這口號更加深了香港的危機因為香港人早把中共的「法律」視為笑話了。

誠如賓州大學張旭成教授對胡耀邦的批語：「他需要多到外面吸收知識，增長見聞。這樣國際知識才不致顯得貧乏。（註）」胡耀邦尚且如此，其他趙紫陽等人也就不用了。

香港是頭沒有自主能力的肥羊。英國是狐狸。中共則是野豬；這場馬戲怎樣演下去？且拭目以待。

註：賓州州立大學張旭成教授於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九至六月八日之間訪問中國大陸。並於五月二十四日與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一席談。歸來後在各大報章發表談話。



中共

秘密審判

何時了？

未完

據報載，在大陸失蹤一年多的香港籍工程師劉山青被中共廣州中級人民法院秘密判處十年徒刑。劉山青被控的四項罪名是：

(1)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控訴詞中指稱，劉山青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積極策動人之一。「共盟」是大陸境內一群民主運動和地下刊物份子的組織。

(2)為「敵人」刺探情報：控訴詞中指稱，劉山青曾向王希哲和何求的家屬刺探兩人在獄中的情況，相信是為香港的「托派」服務。

(3)以「反革命」為目的，散發「反革命」標語、傳單、刊物，宣傳煽動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

(4)陰謀「顛覆政府，分裂國家」：控訴詞中指稱，劉曾探望王希哲和何求的家屬，並且餽贈現款，企圖搞串連活動。

劉山青的四項罪名均不值得一駁，也不值識者一笑。因為劉山青的第一項及第三項罪名都與「反革命」有關。「反革命」罪名是中共控訴人民的一項「百搭」罪名，中共法院可以用來加在任何一個人的頭上。魏京生也好，王希哲也好，他們都有「反革命」的罪名。因之，中共的「反革命」罪名亦即是「莫須有」的罪名。

第二項罪名是為敵人刺探情報，但控訴詞中指稱劉向王希哲和何求的家屬刺探兩人在獄中的情況。刺探王何二人在獄中的情況是否等於刺探情報？按常識判斷，刺探獄中的生活情況並不等於刺探情報。除非中共法院另有解釋，劉山青為敵人刺探情報的罪名不能成立。控訴詞中又指稱，相信是為托派服務。「相信」只是主觀上的判斷，沒有事實根據，不能將「相信」的事情作成罪名，所以中共法官用「相信」的事情作為判刑的根據，是違背法理的。由此可見中共司法人員的法律知識是如何的淺陋！

第四項罪名是，陰謀「顛覆政府，分裂國家。」控訴詞中指稱，劉曾探望王何二人的家屬。探望王何二人的家屬只是出於關懷，何能構成罪行？而中共法院竟將探望家屬列為罪名，豈非笑談！控訴詞中又有：「並且餽贈現款、企圖搞串連活動」。搞串連活動可能會構成罪行，但「企圖」搞串連活動就不一定會構成罪行。因為「企圖」也是屬於主觀上的判斷。如無事實根據，「企圖搞串連活動」就不能構成罪名。

退一步來說，就算是劉山青確曾犯了罪行，中共法院仍應循正常的法律程序，對劉山青作出公開的起訴及審判。然而中共就是一個明知故犯，不知悔改的秘密審判主義者。笑罵由你笑罵，好官我自為之。一個偌大的具有三十多年歷史的政權就是這麼鬼鬼祟祟地對一個如劉山青之類的小民百姓也要搞秘密審判之勾當，其中道理，實在令人費解。

也許中共有其難言之隱及不可告人之苦衷。假如中共法院對劉山青作出公開審判，或因證據不足，於法無據，判處劉山青重刑，可能會損害中共政權的形象。但是中共領袖要知道，最損害中共政權形象的莫過於「秘密審判」了。

「秘密審判」這玩意快要在這世界上絕跡了，只有極少數極端落後而野蠻的政權還在搞「秘密審判」，中共難道就永遠是一個落後而野蠻的政權嗎？

中共領袖一再宣稱要實行什麼主義，實現什麼理想，搞什麼現代化，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到什麼程度。但是連法治過程中最起碼的過程——公開審判都辦不到，光喊些漂亮的口號又能派什麼用場呢！

中共政權成立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已獲得世界上百多個國家的承認，不能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胡作妄為了。

因之，中共要想治國與愛民，必須首先要廢除「秘密審判」這玩意。秘密審判何時了？中共領導人能够答覆這個問題嗎？



對「聯邦制」的異議

編輯先生：

你們好！看完了你們第三期的社論「大家來描繪祖國的未來」，着實令人振奮。雖然離實現理想尚有一段距離，但所表現出來的胸襟和眼光，令人折服。所提出的五項政治和五項經濟主張相信都是經過了深思熟慮後為將來中國所設計的新藍圖。雖然所提出的各項主張在一些先進的西方國家已經實施多年，但對在遭受一黨獨裁下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而言，仍不啻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里程碑。

在所有的主張中，我除了對「聯邦制」有異議外，其他都舉雙手贊成。在聯邦制和共和制的比較下，聯邦制是較落後的一種政體。美國、澳洲等地實施聯邦制有其歷史的淵源。但也常因州政府不貫徹中央命令而造成爭端。政府機構更是有不少疊床架屋的現象，徒然浪費人力、物力、財力。至於此州人民不了解他州的法律而發生事故，更是家常便飯。在西方，因為地域觀念不強，國家因聯邦制而發生分裂的幾乎沒有（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差點獨立成功）。但在中國就不同了，地域觀念特強。你是山東幫，我是湖南派，一言不合，各自獨立吧。至於西藏、新疆等文化風俗不同之省，更是非獨立不可。澳洲有識之士早在十幾年前就要求改行共和政體，但因各州政府竭力反對而未能成功，誰也不願意交出已到手的權力呀。至於維多利亞州的湯姆開車到昆士蘭州，因不熟當地的交通規則而撞車身亡，則並不在這般政客的考慮之中。聯邦制已證實為較落後的政體，我們犯不著再開歷史的倒車。

如果說行聯邦制是為了讓西藏、新疆等不同風俗習慣的地區有較大的自治權力，我們大可以把它們劃為特別行政區，用不着把其他的省份也邦國化。如果說行聯邦制是怕中央權力過份集中會造成獨裁的危險，那麼關鍵的是要建立真正民權的政府。

「中國之春」所揭示的理想和信念，無疑的將會成為埋在海峽兩岸自由民主的種子。當春雷動、兩水降之時，它會萌芽並茁壯成長的。但光是出版一份刊物搞幾個運動是不能救中國的。認為這份刊物或這些運動會深入中國人民之中，從而發生影響力，激勵人民起而推翻現行獨裁政權的想法，更是不切實際。我自己從不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句話。人民是可以欺騙，也可以鎮壓的。群眾的力量固然偉大，但要懂得如何團結、如何駕馭才行。君不見世上幾乎所有共黨國家的人民都痛恨共黨，但有哪一國的人民是起來推翻共黨而成功了的？一個都沒有（智利是美國插手才推翻阿倫第政權）。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是玩弄欺騙、恐嚇和壓迫人民的老手。要人民自動自發地起來推翻現政權，真是談何容易？至於把希望寄託在兩黨的領導人或接班人，期望他們能自動自發地把中國帶上自由民主之路，那更是癡人說夢。須知哪一個領導人不是踏著人民的鮮血往上爬的？好不容易才有今天的地位，怎會輕言改變？就算他想改變，他那些既得利益的「戰友」們和整個制度也不容他這樣做。到頭來，還是被逼著走專制獨裁的老路。今天，以為光靠辦刊物、開座談會就能救中國是自我陶醉而無濟於事的想法。如果這樣能夠救中國，幾十年來海內外出版了那麼多政治刊物，搞了那麼多的運動，給了他們那麼多忠告，開了那麼多「中國往何處去」、「中國應走的道路」等的學者座談會，我們早就該成功了，又何必等到今天？我很怕「中國之春」最後又陷入這條老路，則一切無足觀矣！

不多寫，候回音。 敬祝

編安

曉生 謹上

83.6.13



麼本質上的差異。國家和人民的命運，不還是操在他們的手裡嗎？

這種由政黨集團來統治國家的制度，在西方已經根深蒂固了，美國自開國以來，即是採用政黨政治已積累了兩百多年的實踐經驗。其他歐洲國家，已都以此為政治體制，在原則上承認政黨是代替人民行使治權的工具，人民有權選舉執政黨，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翁，因此標榜「自由」、「民主」，作為爭取群眾擁護的鈞餌。冷晴旁觀者發現，口號歸口號，現實並沒有接近理想，既然無法改變統治者的權勢慾望，問題就在如何建立制衡方式了。

西方國家自從由政黨集團代替了帝制特權集團執政後，是經過相當長時期的流血、暴動和違法犯紀的鬥爭，與不斷的改革和調整。幾百年以後的今天，才算是具備了政黨政治的基礎，得來不易，並非一蹴即成的。即令如此，無論有多少政黨標新立異，譁眾取寵，來爭奪政權，最後脫離不開兩黨制和多黨制。但是小型政黨，不過湊湊熱鬧，陪襯陪襯，沒有什麼作用。無論是兩黨制或多黨制，治國的基本原則是一致的。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所有政黨都奉行資本主義的制度，雖然有了戰術和戰略上的差異，但要達成的最終目的是一致的。以美英兩國而論，民主黨和共和黨，保守黨和勞工黨，並沒有理論和思想問題的分歧，只有為了達到同樣目的的手段和方法的爭吵。從形式上看來，是兩個政黨，各有黨綱黨政，為理想而奮鬥，實質上只是一個政黨系統的兩個派系，所以政客們為了政治利益，可以隨時脫離一黨而參加另一黨。原是民主黨黨員的里根，脫黨後，成為共和黨的黨首，作為共和黨的總統，一點也不覺得出賣，或喪失了政治原則，也沒有有人責怪他叛黨，或受什麼黨紀制裁。原因很簡單，他並沒有離經叛道，只是從一個派別與另一批政客作伙伴而已。不存在所謂「思想」問題。因此，現在西方國家所標榜的兩黨制，甚至多黨制，實質上是一黨制下兩個或更多派、系，互相爭取人民的擁護，掌握政權。

在不动搖治國的根本原則，和奉行同一主義的前提下，由二個派系或各為兩個政黨，互相為了要贏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而競爭，用政績來說服群眾，用治國才略來獲取信任，至少對民意表示尊重，而且彼此有督促和監視的作

工業革命至今一兩百年社會發展的經驗，完全是空白，加之受教條式思想的束縛，仍把資本主義社會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時代的體驗來批判，忘記了資本主義並非一批頑固和守舊的護道士，為了資本家的生存利益，大致已將階級對立的問題解決了，所以生產力獲得解放，而造成如今國強民富的局面，主義已經一再修正過了，同時他們還吸收不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種在一個主義之下，能容許不同派系或政黨分享統治權利，確實是人類社會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如果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深信他們掌握了人類進化最正確的道路，那麼虛心學習資本主義社會的長處，像科技和生產管理等方面一樣，應該以實事求是的精神，研究這種比較先進的兩黨制，使它更能發揮民主效果，避免他們的一些失誤。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採用兩黨制，是完全合理而且可行的，像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一樣，基本的制度不變，兩黨或兩個派系都奉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策，服膺馬列史毛思想，都是共產主義信徒，所不同的是達成理想的戰術和戰略，強國富民的方略與施政的方針不同。每個政黨或派系可以宣揚自己的政策，爭取人民的擁護，用競選的方法，掌握政權，組織行政內閣，肩負國家長治久安的職責。如此在野黨或派系可以監督和批評執政黨或派系，人民能直接參與政治，更能發揮積極性。其實如眾週知，社會主義體制內如中國政府，已經是派系林立了，只是都借共產黨之名，爭權奪利，明爭暗鬥。讓這種無可避免的情況，繼續存在，只有造成政局的不穩定和人民對政府信心的危機。有百害而無一利。何不讓這些利益衝突的派系，公開組織起來，遵循法律，互相競爭，讓老百姓決定那一個派系的政綱和政策，對國計民生最為有利，選他們出來執政。在一固定期間，如四年或六年，如果政績輝煌，受人民愛戴，會連選他們繼續執政，否則可以選另一派系作人民公僕。比如不久以前，中國有以華國鋒為首的凡是派，和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如果採用兩黨制，互相公開競爭，相信人民的智慧，重視人民的判斷力，通過競選，合法掌權，可以避免那些不健康的內部鬥爭，權力陰謀。筆者相信，衡諸時代潮流，中國現階段發展的趨向，改革派必獲全勝，現實雖然也是如

也都用行動消滅了。至於能否允許信奉不同主義的政黨存在，或參加競選，筆者認為初期是不允許的，因為在民智尚未完全開發，而且中國仍遭受內奸外特的威脅，實際上仍有唯恐中國不亡的惡勢力情況下，會產生紊亂和破壞作用，但經過一段長時期以後，也許進入廿一世紀，中國已經完成了統一在國泰民安的昇平盛世，則無妨百家爭妍。那時邪說異教，想把中國向後拉的力量已經成不了氣候，自可像目前美國一樣，任它饒舌，樂得個自由開放，兼容並蓄的美譽。

目前的關鍵問題是，執政當局能否有高瞻遠矚，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百年基業，為真正的民主和法治，作出自我犧牲，有上台也有下台的雅量，洗淨帝王思想和一黨專政的意識形態，為共產主義的前途和人類進步事業，拿出勇氣，來突破條條框框，創造出人民民主的新紀元。

事實上，無論是在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或東方的社會或共產主義社會，都無法避免有派系集團的存在。西方國家是經過百年以上長期政治實踐的經驗，證明讓派系集團公開活動，相互競爭，相互監督，對政治局面的穩定，生產力的解放，有絕對的好處。經過體制的建立，多年進行的民主教育和法治訓練，從政的人，已能有與政敵分享統治權的雅量，不再患得患失，搞陰謀詭計的心態了。不幸在東方的政客們，雖然口頭上一切為了人民，為勞苦大眾和工農無產階級的利益而服務，但骨子裡仍在承襲封建傳統。一朝權在手，就有永遠霸佔不放，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落伍思想。

寧可搞派系鬥爭，爭權奪利，不敢公開讓人民作裁判員來決定他們的政績與是否應該繼續掌權的雅量。因此製造出千災百難，政局無法穩定，人治代替了法治，獨裁代替了民主。這樣下去，會永無寧日，國計民生，也難獲得長治久安的穩步發展。中國政府過去三十多年所經歷的苦難，基本問題就是未能將派系之間的矛盾，引導向公開鬥爭的民主途徑。為了祖國的現代化，為了國強民富，更為了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現在是效法西方兩黨制的時機了，希望執政當局，以身作則，為祖國的前途，作出劃時代的改革。

劃時代的改革。

編者按：

「華僑日報」的這篇署名文章寫得很好。雖然於社會主義條件下能否實現多黨制這個論題，似大有商榷的餘地，然而作者敢於提出問題，敢於闖這個理論禁區，敢於投稿到這家被人認為是親共產黨的報社，這份膽色，就遠非那些吹牛拍馬的文人們可比了。

「華僑日報」登這篇文章也登得很好。客觀、公正、不偏不倚，是大眾傳播的立足點，容納不同觀點，講究實事求是，勇於追求真理，只要是不抱不良目的的東西，就是要敢登敢載。這裡是美國，無須顧忌哪一方面的臉色。

基於上述兩點原因，我們向「中國之春」的讀者推薦署名望雲的這篇文章。

談「一黨專治」和「兩黨共治」

望雲

國家治理的權力，自古以來，總是操縱在一個集團手裡，這個集團無論是自命秉天承命的帝王，或封建君主，造反成功的草莽英雄，武功蓋世的軍閥強豪，或者是為民請命的救世主。都是以爭權奪利為目的，主宰民眾為手段。國家只不過是擁有土地和人民，能為集團製造財富與特權的有機體。如何去治理，則全仗執政者與他利益相共的集團份子，能否獲取最高的權勢和優遇。偶然顧及到民生疾苦，為百姓謀些福利，則會受到小民感恩圖報，視為英明聖主了。這種把集團的利益放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上面的心態，至今仍沿襲未衰。雖然集團的組成和性質已全非昔比了。

西方自從文藝復興後，思想獲得解放，「百家爭鳴」思想家輩出，各種思潮充斥，於是產生了一批又一批的政論家和革命志士，把各種治亂平天下的理論，用作爭奪國家治理權的根據，政黨組織遂如雨後春筍，可說是包羅萬象。但這些政黨最終的目的，仍是為了奪取統治權，美其名為實現堅信的崇高的理想，為人民服務。但是骨子裡還是沒有脫離傳統的統治階級的執政目的，仍舊是為了權和勢，有了這兩個法寶，所謂執政黨與帝王相，並沒有什麼用。執政的集團，由於希望能繼續專權，所以也要競競業業，不便胡作非為。為了不致給反對集團以推翻它的政權的口實，在相當程度上是比較奮發的，這種安排可以發揮一些槓桿作用，避免了任何一個集團或政黨長久專權，因而腐化。同時也消除了人治的積習。雖然這種體制，尚有許多問題，比如財團和特殊利益集團，操縱候選人，人民只能從他們所欽定的人中間作出挑選，選出的人，有許多是為那些花了大量金錢，捧他們出來的個人與團體的利益服務。但是無論如何，人民還是有相當的民主權力。通過兩個政黨集團的互相攻擊和暴露，也獲得不少對國家社會和政治的關心。這經過幾百年實踐的體制，是有它的優越性的，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雖然離理想的全民當家作主的理想尚為遙遠，仍是人類社會發展至廿世紀以來，比較合理的安排。

一般人因此而對社會主義體制下的一黨專政，表示失望和反感。事實上很明顯，一黨專政是承襲於封建制度的帝王思想而來的，不幸的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者掌握政權的國家，如蘇聯和中國是直接從封建社會過渡的，沒有經過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道路，所以西方自從此，但影響就完全迥異了。改革派如果通過選舉而執政，則必可毫無顧慮地，大刀闊斧把新政和庚申改革的方案付諸實現，改革派的聲譽，民心的歸向，行政的效率，和人民的福利，必可加倍提高，而國際的聲譽，更是如日東升，海內外人心的匯合，對解決台灣的統一問題，都會因此而獲得極大的鼓舞，可說是百利而無一害。何樂而不為？當然改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但只要能擇善固執，按部就班必可作到的。關鍵是高層領導的人士，有無此認識和決心，思想能否解放，對老百姓能否靠得過，對自己的政綱和政策有否強烈信心。

筆者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採用兩黨制甚或多黨制，比在資本主義社會還會優越的多。因為不受財團和特殊利益集團的操縱，同時，資本主義者，以謀利為理想，先要獨善其身，才能兼善天下，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者，所信奉的哲學，恰是相反，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無產階級為主的全民利益為爭取和服務的目標，果能實行兩黨制，在共同的崇高的理想下，彼此競爭監督，人民真正可以當家作主，真正的民主政治，必可發揚，而且資本主義者所攻擊獨裁專制等的口實，

售地於民

「中國之春」編輯諸君大鑒：

來信及「中國之春」第三期均收到。

關於第三期社論，正面提出政治經濟主張，使人們對於民運之「民主、自由、法制、人權」八字主張之內涵有更明確的了解，很好。下面談兩點意見：

「經濟上的五項主張」之第四：「企業由工人和技術人員組成的職工委員會管理。……問題在於，要把企業的領導權交給懂得企業管理，又代表工人利益的人手中，並使企業的生產適應指導性市場經濟體制。」

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既然在經濟主張的第二條中提出了允許多種經濟體制並存，那麼這裡籠統地提「企業」就不合邏輯。不同體制的企業顯然應由不同的方式管理。例如私營企業管理權就應由業主決定。第二、無論本條文中所謂「企業」是何種所有制，「要把企業的領導權交給既懂得企業管理、又代表工人利益的人手中」這種提法都不妥當。如果是國營企業，其領導者應代表國家利益而工作。至於代表全民利益，則不僅僅是工人利益，更不能僅僅是本企業的工人利益的代表者。如果是私人或集體所有企業，則管理者和領導者應代表業主或業主集團之利益。代表工人利益的應該是工會，以及國家以民主方式制定之勞工法例。

第五條：「農民對土地有擁有權和使用權。」這種提法欠妥。農民不應該無條件享有土地擁有權，即不能有特權。土地應屬於全體公民的天然財富，「擁有」既然意味着可以作為私有財產轉售、饋贈、遺傳給子孫等等。那麼農民作為公民之一部份就不能無償地取得擁有權。所以「還地於民」宜改為「售地於民」。此外，當社會需要農民作其它用途時，國家應有權贖買或以交換方式取得土地。再其次，隨着社會的進步繁榮，土地的價值往往有大幅地增長，這部份增長的價值應為社會公有，不得由農民或地主獨享。請參看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一書中對平均地權的論述，請調查各先進國家之土地政策，不能回到唐太宗時代去。

最後一點抗議：第三期專題報導大連水產學院罷課和新疆上海知識青年反抗農奴式生活方式的兩篇文章中；作者們均使用「鬧事」一詞，而編輯諸君亦不聞不問，登之泰然。「鬧事」是一個貶義詞

來信 摘編



一花獨放不是春

中國之春編輯先生：

我對貴刊為國為民，奔馳吶喊，不懼權威，不避艱險的精神還來不及總結思考，以寫點鼓勵性的東西，先對你們提出二點似批評但也帶建議性的意見，請斟酌參考。

(1)封面由下至上由深色至淺色地襯托一枝含苞待放的花，這個封面設計欠妥，它正犯着中國一句諺語「一花獨放不是春」，而貴刊之名却是「中國之春」。

(2)貴刊第三期以「本刊評論員」署名歡呼國內地下刊物「野草」出版的短評中說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兩句詩是杜甫的，但我翻查了「杜工部詩集」全集都未見此兩句，却在「白居易詩集」中找到。不知你們有無記錯，誤將白居易的詩當杜甫的詩呢？請再查對。

波士頓一讀者

八三年六月三日

，用在這兩篇文章中意味着什麼呢？專制社會給人們留下的奴隸烙印何時才會消失呢？

即頌

編安

徐 中 再 拜
六 月 十 二 日



致海外僑胞

首先讓我們歡呼，一群有熱血的中華兒女續孫中山先生之後，在海外又站起來了！他們為了獄中受迫害的正義同志，為了千千萬萬在共產黨鐵蹄下勞役之同胞，為了改變那個不合理的封建共產主義制度，為了爭取一個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之中國，他們毅然拋棄了自己的美好前途，放棄了學業，隨時隨刻準備着遭受共產黨的迫害。誰說中華沒有優秀兒女？

親愛的海外同胞們，我們真正報國的時候又到了！歷史證明海外的僑胞是最愛祖國的。事實上我在海外亦飄泊了二十多年，也許算是半個僑民吧。我們的身體仍然流着中華民族的熱血。我們忘不了自己的根，我們都希望有一個偉大、富強、安定、統一的祖國作我們的後盾。共產黨從來未曾真正為海外僑胞着想過。遠的請看印尼，近的如越南和金邊。僑胞們的血淚是中國共產黨一手造成之傑作。也許有人會說，共產黨改變過去的錯誤了，對我們華僑好了。我們祖國強大安定了，我們有核子彈了。我們應該清楚，共產黨只是條變色蛇。三十多年的事實證明，他們並不是犯了錯誤，而是謀殺了千百萬海內外中國同胞的罪犯。共產黨是永遠不會改變也不可以信賴的，他們只把中國同胞當作可勞役及榨取的工具。請再不要對他們抱有任何幻想。目前國內經濟的放鬆，並不是他們良心發現而大發慈悲，或者是為了解救中國人民而高叫四個現代化。這只不過是一種手段去拯救他們將要滅亡的黨，藉此再欺騙中國人民。陳雲也曾哀鳴：他們會有亡黨的危險，因他知道他們做的壞事太多了。再看看台灣的國民黨。為了加強統治台灣的同胞，每天只會空喊反攻大陸。如果他們不是貪污腐敗，共產黨根

本就沒有機會可乘。國民黨也不會逃亡到台灣。他們現時還不痛定思痛，全不害羞，一連叫了三十多年反攻，還想去殺自己的同胞，恢復蔣家王朝，真是活見鬼。他們又何曾為我們僑胞作了多少好事呢？他們有時也會收容一些難胞，但骨子裡是為他們宣傳反攻的私利而已。想來實叫人痛心。

親愛的僑胞們！為了使我們的子孫後代能在國內永遠安居樂業，不用再像我們一樣，飄洋過海受苦，為了使祖國的苦難同胞們不用冒死逃亡港澳而葬身魚腹，為了未來的港澳，同胞們不要再像越南的僑胞們一樣隨海飄流，無家可歸，為了制止再發生國共內戰，制止他們再來導演中國人殺中國人的醜劇，讓我們放棄私見，團結起來，保護及支持「中國之春」。以色列、日本及其它國家的僑民，能這麼團結、關心國事，我們是偉大的中華海外僑民，別人做得到的事，我們將會做得更好。讓「中國之春」在我們僑胞的培育之下，成長壯大。讓春風吹遍祖國。

留英學生

萬 鈞

83-5-29 深夜於倫敦



「朝氣」和「衝動」

我也是知識份子，但我從十多年的慘痛教訓之中認識到，青年人確有一股不可忽視的朝氣，然而絕不能單憑青年人的一股朝氣就能完成當今世界民運所賦予的偉大歷史使命。朝氣固是青年人的優點，然它卻又往往會造成「衝動」這一最大弊病。十年前我們不也是曾高喊「舍一身副，敢把皇帝拉下馬」置鐵錘腳鐐不顧猛殺猛衝的「闖將」嗎？我希望中國之春能造就更多為民運獻身的骨幹之士，也可算是時勢造英雄吧，為此，我認為應該循循善誘地把這批有生力量正確的團結在中國之春的周圍。要知想徹底改變中國之現狀，光靠知識份子遠遠不夠的，必需最廣泛地組織和調動各階層的有志之士（包括國際上的一切真正的民運力量）。

祝 康樂

林 國

未脫文革窠臼

這場變革中國的「中國之春」運動，對一個貧弱、落後而歷經動亂的國家而言，應採取「和平過渡」的方式。側重的應是創理論之新和建制度之設，我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富強和統一的中國，以對世界永久和平和人類發展進步作出中華民族應有的貢獻。

看了所寄達的「中春」前三期，無庸諱言，我很擔心她的前景，她依然沒有脫出「文革」辦刊的窠臼，充滿爭辯的火藥味和非理性的誇大狂，對個人的作用，依然帶有「英雄主義」的色彩。「中國之春」是一個中國人民求民主、爭自由的運動，每一個參與者，只是其中一份子，僅應有量的差別而不是質的差別。

祝 工作順利

中 光

我是炎黃子孫

今天偶然間在報紙攤裡看見「中國之春」。以前我曾在其他的刊物上看到有關「中國之春」的報導，但我從沒有想過要去買一本來看，今天我卻很不自覺地買了一本。當我看過第一號第二號公告，「民主政治現代化的第一步」和一些問題以澄清與回答三篇文章後，便有一股衝動要寫一封信，而這股衝動絕不是暫時性的、盲目的，而是我在這條道路上找尋得太久了，到現在我始發現我應當走的方向，和找到了一個可以在這漫長的道路上一起走的伴侶，不錯，我們這一代應當為中國的法治、民主和自由而努力奮鬥，這是每一個中華兒女應擔的責任，我們實在不能再讓這條昏睡的大龍沉睡下去。

或者在某一些問題上，在某一些觀點上，我們會有很大的分歧，但我相信我們的分歧將會由於共同的理想而得到解決。對於同志們的這一份熱情和勇氣，我是極為尊敬的，我希望我能成為這一運動的一份子，盡一份身為中華兒女的責任。

過去，我是在一條迷惘的道路上漫無目的的走着，我沉迷於香港的繁榮，沉迷於這個花花世界裡，但又受着民族自尊心的咒罵。我似乎覺得我應當去做些什麼，但又不能逃離這社會裡各種的誘惑，所以始終生活在矛盾中。但我始終沒有忘記我是中國人，是炎黃的子孫，我關心我的國家，我愛我的

同胞，我知道中國終有一天會再站立在東方，今天我決定要投進這個運動中，我一定要這樣做，我要求同志們幫助我、支持我。我要成長起來，堅強起來，為中國人民真真正正的做一些事。

此致

敬禮

勇兵於香港

1983、4、20

同志！

親愛的同志們：

你們好！這是我來到美國以後第一次使用「同志」這個稱呼，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我是同你們有着類似的背景和經歷，在共同的心路歷程上跋涉過來的人。如今又有幸來到美國學習，能夠享受一點暫時的「言論自由」，把我心中想說的話傾訴給你們。

自從你們的運動公開以來，我一直關心着它的進展，報刊上登載的有關消息，我都認真地讀過，我也曾出席過王炳章同志在某大學的一次講演，在國內的時候，我就是西華民主牆的熱心讀者，對北京之春民主運動寄予深切的同情。雖然當時未能公開表示自己的觀點，但我的心是向着代表中國未來的民主力量的。來美國之後，我抽出時間閱讀了有關西方民主政治的著作，也接觸到關於台灣、香港、新加坡等海外華人社會經濟繁榮的問題，更堅定了我立志改革中國現行經濟政治制度的決心。本來想早點給你們寫信，但由於種種原因耽擱了下來。現乘暑假略有閒暇的時機，把我長久以來悶在肚子裡的話表達出來，也許回國以後，就再也沒有這麼好的機會了。

你們勇於投身改革的志向和勇氣令我欽佩，你們對於民主運動的基本設想我也是贊同的。當然，由於各方面條件的限制，目前不可能提出一個比較周密的、有堅實的理論基礎，經得起實踐檢驗的行動綱領。第一炮打響後，隨着運動的廣泛深入開展，理論建設的任務自然會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只要博採諸家之書，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在鬥爭的實踐中探索和積累經驗，運動的水平就會越來越高，就會像磁石吸鐵一樣，把一切立志改革者吸引到自己周圍，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論壇。

致 同志的敬禮！

蜀中

83、6、27

政躬康泰， 胡先生！



小林

胡先生：

您好，常和幾個留學生談起您，都一致認為您是繼承鄧小平的最佳人選，也是領導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最大希望。我是一個稍微涉獵過幾年黨史的中國人，爲了希望您能更好地爲人民服務，在此想向您提出一點我個人的意見和忠告也是一番爲您的好意，但怕才疏學淺，不當之處，尚望海涵。

首先，您如果想要長久地爲人民服務，必得先鞏固您的權力。而鞏固權力，最重要的就是抓軍權。其餘什麼人民的意願，民心的向背，都可以不理。但軍隊的動態可不能不管。民主在世界上算老幾？您比我清楚。在歷史上，如果人民想要政府垮台，結果垮台的往往是人民。但如果軍隊要政府垮台，則政府非垮不可。四人幫之所以垮台，不在於人民的憎惡，乃在於抓不到軍權。十個大軍區中，只抓

到了一個丁盛，半個陳錫聯，以及一些老弱不堪的城
市民兵。就憑這點雞毛蒜皮的實力，也想在政壇上
混？毛澤東那句「槍桿子裡出政權」，實在是放諸
共產世界而皆準的顛撲不破的真理。您該把這句話
牢牢地記在心底，不可一時或忘。他自己從一九三
五年遵義會議後，什麼都可以放下，唯獨軍權可從
沒離過手。所以在歷次黨內、黨外的「鬥爭」中，
從來只有他替別人挖墳，別人想替他挖？鏟子都沒
有！王明、李立三等人不懂這個「真理」，還妄想
爭權，實在連做他跟班都不配。有明乎此，您現在
就應該對軍隊不但要猛抓，而且還要狠抓。問題是
共產黨的頭領，最講究資格和出身。誰的資格老、
出身好，誰的門就大。故直到如今，掌權的還是
第一代元老。您的資格您自己肚裡明白，您能做到
今天的地位，無庸諱言，是鄧小平一手提拔的。今

天別人衝着鄧小平的面，動不了您。但人總是會死的，他老人家一走，排在您面前比您資格老的，少說也有一排人。到時有多少人服您，那就難說了——尤其是那十大軍區司令員。在此希望您能在鄧小平百年以前，對於某些軍區要員，能撤則撤，能換就換，然後再安插自己的親信進去。否則等到鄧小平歸西以後再由您獨自來做這事，那就難了！到時可能不是您撤他們，而是他們撤您了。另外，還要請您特別提防的，就是前廣州軍區的許世友。他的火爆脾氣盡人皆知。放眼當今，能壓得住他的也就只剩下葉帥和鄧小平兩人，有時他甚至連鄧都不賣帳。最好別和他面對面談話，脾氣一來，他那百步穿揚槍法，連綫都不用吊！

還有華國鋒！你們雖然剝奪他的幾個職位，但他人還在，心不死。您如果以為這樣就了事，那顯然是犯了大錯。他說什麼也曾是手握「六字真言」的前任「天子」，又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的總代表。他現在雖然下了台，但其他文革既得利益者，仍然守着各通關要道，懸棧不去。只要他在，都還有個指望；而他們也都在等著您犯錯誤機會。毛澤東說的：「除了死人和沒生下來的人外，其他活人都會犯錯。」您還活著，也還會犯錯，到時若給他逮著了機會，再度上台，那您就有戲看了！您別看他土頭土腦的樣子，就不予理會，掉以輕心。果真如此，以後可能「土頭土腦的」就是您啦。毛澤東對他的評語是：「忠厚老實，不蠢！」這寥寥幾字，真是可圈可點。看看四人幫吧！當初他們原想借著這個呆頭鵝來過橋，沒想到反被他借著過了橋，着實做了幾年風光主席。甚至連葉帥對他的評價都比您高啊！知往鑑來，為了能讓您永無後顧之憂地為人民服務，趁您手中還有點實權，來一個「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實際行動吧，這也是「堅持」毛澤東思想啊！

此外，還有你們鄧家班的問題。現在幾個掌實權的鄧家班人馬，原共青團班底，都是您親密的朋友。但根據中國共產黨黨史，今天最親密的朋友往往就是明天最惡毒的叛徒。從高崗、劉少奇、林彪，一直到四人幫。也看看外國共產黨如史達林與托洛斯基、狄托與吉拉斯等人的關係發展史吧，你從中也許就更能總結出一條客觀規律來了。別人我不敢說，毛澤東是深知這種「規律」的。所以在他選林彪當接班人的同時，也就未雨綢繆了。您也應該做好幾個繩圈套在這些「親密戰友」的脖子上。等到以後他們本意一露，您就叫他們自己「了斷」。如果您現在行婦人之仁不肯做，等到他們翅膀硬了的時候再做，那時被套上脖子的可能就是您而不是他們了！

前些日子和這裡的幾個留學生談天，他們談到你們去年在十一屆六中全會所發表的那個「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您在慶祝建黨六十周年所發表的談話，個個都十分興奮，認為共產黨終於虛心認錯了，前途還大有可為。可是當我看完這兩個文件後，却大為搖頭。

(1)你們在決議中認定毛澤東也是人，而且也犯下了許多錯誤。從一九五七年反右傾開始，經過大躍進、廬山會議一直到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他撒手人寰為止，都是錯誤。我算了算，在你們掌政的三十二年之中，他老人家犯錯誤時期竟然長達二十年，其他的幾年也是在收拾他留下的「蘇州屎」。怎麼在您的講話中，還是認定他的功績遠大於他的過失呢？更令人奇怪的是你們居然把他的思想和他的本人一分為二。他本人是錯誤的，而他的思想却是正確的。因此還要「堅持」他的思想。說老實話，我真的不知道人跟思想怎麼分得開？如果錯誤的毛澤東創造了正確的毛澤東思想，這跟「指鹿為馬」有什麼兩樣？您總不能說毛澤東思想是鄧小平創造的吧？退一步反過來說，如果正確的毛澤東思想創造了毛澤東這個錯誤的人，它還會不會再創造第二個、第三個毛澤東？這個「思想」還值不值得堅持？人與禽獸最大的區別，就是人有思想。現在把人和他的思想分開，那人成了什麼？寫到這裡我忽然靈機一動，也許您的講話是您的高度幽默吧？您是在拐彎抹角地罵毛澤東是畜牲嗎？不過，我請你幽默也要小心，那幫「凡是派」的老傢伙們也「鬼」得很呢！說不定現在正在整您的「黑材料」留作「秋後算賬」，勿謂言之不預也。

(2)您在講話中洋洋灑灑的批了毛澤東數千言，但在最重要：「文革的成因」上，留學生們和您的看法就大大不同。他們認為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革，不是像您所說的：「他錯誤的認為黨內及各界混進了一大批走資派，而必須發動全面的革命把他們打倒。」而是「赤裸裸為遂其私慾的奪權鬥爭，最後竟然自私到要把權位傳給床頭人。」他們還說這是婦孺皆知的事實。您為什麼不提這一點呢？是不是因為人人皆知，不提也罷？還是因為一個像毛澤東這樣的共產黨創始人到頭來還是脫不了一個「私」字，讓人提起來就寒心？無論如何，還望您能出來說明一下。

(3)您在講話中強調了你們在執政三十二年中，雖然遭遇了不少挫折，以至國家到今天還處在貧窮落後的局面。但在「維護主權，保持民族自尊心，堅持獨立自主」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這句話其他國家可以說，你們決不能說。說出來就讓人笑話了。只要香港和澳門的現況存在一天，您就得把話嚥



回去。今天世界上的殖民地已寥寥可數，而你們竟然有兩個在外人手裡。當葡萄牙在七〇年代中自顧不暇想從澳門撤退的時候，你們竟苦苦地要求他們留下來，真創下了殖民史上的新篇章。今天，沒有人懷疑你們有一個電話就收回港、澳的能力。但你們不會這樣做，只有傻子才殺掉生金蛋的鵝。港、澳帶給了你們巨大的經濟利益。在被封鎖的那幾年，更是對外交通的唯一孔道。不收回來是可以理解的。但你們既然把經濟利益放在政治原則前面，就不應該大談什麼「獨立自主，民族自尊心」等等的體面話。就像一個婦女爲了生活跑去當娼，沒人能說什麼。但如果這個妓女竟然大談貞操、清白，就徒然令人耻笑了！本想勸你們勒緊腰帶，把港、澳立刻收回來算了，以免貽笑世界。但看看你們現在的做法，實在不像。竟然在深圳、汕頭等地搽脂抹粉，號爲「特區」，開始接客了。只是妓女做久了，難免染上花柳。港、澳和其他特區存在久了，資本主義的毒素也遲早會深入你們的骨髓。上行下效，一個沒有原則大開後門的政黨，又怎能寄望於它的黨員和人民保持清白呢？

派到這裡來的留學生，一般來說，思想都還「堅定」。跟我辯論起來也都頭頭是道。滿口的共產主義好，「雖然在實施過程中有了偏差，但救中國唯一的法實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只是他們不能喝酒，一喝了酒就不一樣啦。上星期和一個積極份子上酒館，幾杯老酒下肚，他話全改了。不但把共產主義貶得一文不值，而且還說他身爲一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是够悲哀的了！身爲一個共黨統治

下的知識份子，更是他祖上沒有積德。最後的結論是如果他沒親人在大陸，打死也不回去。我起先以爲他是酒後一時亂性，作不得準。沒想到第二天見了他，他還是那麼認定，並且還說每個人都一樣，只是在幾十年的經驗教訓下，全學了乖而已。我對他的話仍有點懷疑。當天又找了另一位上酒館。沒想到這位仁兄黃湯下肚還不到半小時，就亂了套啦！他不但問候了你們從開黨到現在每一位領導人的祖宗；而且還罵你們「無耻」：當初要打倒「溫情主義」的是你們，如今用「溫情主義」來牽絆住他們的也是你們。「有種就放我的老婆兒女出來探親，看看我還回不回去?!」知識份子最靠不住。在此又得到了明證。幾杯老酒抵消幾十年的「黨恩」「國恩」。有鑑於此，希望您能對已出國及尚未出國的學生下個指示，「在外國什麼都可以做，就是不准喝酒。」

這幾年派往外國的留學生，幾乎全是學理工的；文、法及社會科學的，鳳毛麟角。問起來才知道，你們說除了西方的科技外，其他思想、文化、政治等等一概不要。認爲只要科技就可以救國了。但你們可能不瞭解，西方科技之所以發達，正是源於它有自由的思想及合理的政治制度。這些才是主幹，科技只是這主幹上的枝葉而已。現在你們捨本逐末，行得通嗎？八十多年前李鴻章、張之洞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並不能挽救將亡的滿清；八十年後你們的「共產獨裁爲體，西方科技爲用」難道就能令你們起死回生？另外，可能你們還不清楚，所有學科到了最後都是相通的。醫學、物理、哲學和政治在本質上沒有兩樣。這批留學海外的知識份子並不是木頭人，都會思想的。別忘了，推翻滿清的孫中山原來是學醫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此建議您，當這班回國的知識份子貢獻完他們的科學知識之後，就像以前一樣先來幾個洗腦「運動」，否則提心吊膽，日子難過。

講起知識份子，我不得不佩服你們這幾十年來對待知識份子的政策。不但服了，而且服到五體投地。共產黨和知識份子的關係就像唐僧和孫悟空的關係。而對知識份子的政策就像箍在孫悟空頭上的那個圈子，緊箍咒一唸，沒有辦不到的事。雖然孫悟空是幫唐僧取到西經的最大功臣，但那個圈子是怎麼樣也不能拿下來了，否則猴子踢騰起來，誰管得了？幾十年來對知識份子，要殺要批，悉聽尊便；要收要放，存乎一心。任何運動一來，都拿這隻猴子來耍。無他，知識份子就誠如魯迅所說是些「殺人無力求人懶，千古傷心文化人。」而已。毛澤東說得更明白，這是些「牆上蘆葦」和「山澗竹筍

」罷了。不拿來耍耍，難道去耍統兵帶將的許世友乎？丁玲、冰心等所受的待遇是盡人皆知，可是她們直到今天還不敢說一句你們不愛聽的話。以前的郭沫若、馮友蘭等，更是有事沒事的「歌德」派。至於受折磨而死的老舍、吳晗等，對你們而言，又算什麼呢？又不是您的親戚或「親密戰友」。十年文革太緊了，放白樺、孫靜軒等人出來鬆口氣，現在又覺得氣鬆得太大了，要白樺今天自我批判，他不敢等到明天。三十多年來，這班知識份子吃你們搽搽得像團爛稀泥。而你們耍猴的手法也已臻於化境，不但富有創造性，而且還富有藝術性。當初如果國民黨耍猴的本領也和你們一樣高，今天取到西經也許就不是你們了。在此建議您，對知識份子的政策一定要貫徹，決不可改變。否則這隻猴子一踢騰起來，就是「亡黨亡國」「千萬人頭落地」的日子啦。另外，不知你們是否可以把海外的幾隻猴子如於梨華、趙浩生等弄回去耍耍？一來增加海內外

共聚一堂的風光場面，二來你們耍起這些半洋猴子來也痛快！

最後，我想提醒您，您是實踐派的大將。當初你們能打倒凡是派，就是因為你們提出的口號較為合理，也較為科學。「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真是放諸四海而皆準。您有沒有想到，共產主義在中國實踐了三十多年，結果還是處於貧窮落後的局面——其他共產國家也好不到那去。這就證明了共產主義不是真理。這種主義是否還值得再實踐下去？您該心知肚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現在亡羊補牢，尚未為晚。但只恐我人微言輕，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耳。誠惶誠恐，再三拜上。

敬祝
政躬康泰

小 林謹上
一九八二年二月

《中國之春》訂閱單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NAME
地址： _____
ADDRESS

零售：每本 \$2.00
訂閱：（每六期計算）
普通訂戶：\$12.00
學生訂戶：\$9.00
贊助訂戶：\$30.00 以上
學校機構：\$30.00
海外訂戶另加郵資
航空：\$12.00
平郵：\$4.80

支票請寄： CHINA SPRING

（美國） P. 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 Y. 10185



笑談 幹部年輕化



吳儉祥

「一人獨裁，一黨專政」是中共極權政治的最大特色。最近閉幕的「六屆人大」，選出了新的「國家領導人」。然而在這場「選舉」鬧劇中，絲毫看不出中共幹部制度有任何改革的跡象。整套人馬，完全是鄧小平苦心經營的「黨內權利平衡」。所以「幹部年青化」，只不過是一句騙人的鬼話。

衆所周知，腐敗無能的中共官僚階層，是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最大障礙之一。幹部的「知識化」、「專業化」、「年青化」，本應是幹部制度改革的核心問題。事實證明，鄧小平對幹部「三化」根本沒有誠意，「年青化」是假，「一黨化」、「鄧記化」才是真。

請看此屆「人大」新選出的「國家軍委會」：

- 主席：鄧小平，79歲；
- 副主席：葉劍英，85歲；
- 徐向前，82歲；
- 聶榮臻，83歲；
- 楊尚昆，76歲；

平均年齡，81歲！

中國人自古稱，七十為「古稀」之年，而八十恐怕要叫作「入土」之年了。鄧小平拿出這樣的「老人委員會」來，實在是對「幹部年青化」的極大諷刺！然而其中奧妙，却不言而喻。軍權在獨裁國家中仍權中之權，「政權乃鎮壓之權」，有了軍權才有政權，有了政權就有一切。無怪乎從毛澤東、華國鋒到鄧小平，無不死抓「軍委主席」不放。在這種權力悠關的位置上，只有「死而後已」，豈肯「光榮退休」？

再看新任國家主席：李先念，74歲；副主席，77歲。平均75.5歲。

- 「人大」委員長：彭真，81歲；
- 副委員長：陳必顯，67歲；
- 韋國清，70歲；
- 耿飆，74歲；
- 胡厥文，88歲；
- 許德，93歲；
- 彭冲，68歲；
- 王任重，66歲；
- 史良，83歲；

- 朱學範，78歲；
- 阿沛·阿旺晉美，72歲；
- 嚴濟慈，83歲；
- 廖漢生，72歲；
- 韓先楚，70歲；
- 黃華，70歲；

平均年齡，74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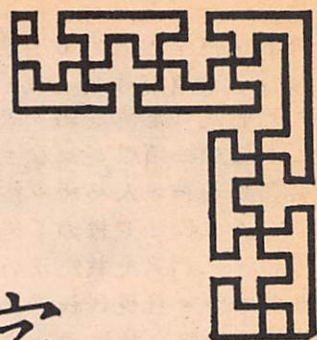
我們知道，美國歷屆總統中，只有雷根是以行將70入選的。國務卿和各部部长，則多在50歲上下。中國人平均壽命不比別國高，而中國領導集團的「高齡」，則在世界史上之鮮見。這並不說明中共領導的高明，相反地，恰好說明這個政權的老化。

中共領導幹部大抵有兩類，一類是抓權的幹部，第二類是做事的幹部。前者大權在握，通常並無正當的「日常工作」，專事策劃整人，如毛澤東、康生、「四人幫」之流。後者只是做事的工具，凡事得請示前者。諸如這類幹部，裝飾幾個年青的，本來問題不大。然而在50左右的幹部中，鄧小平却很難找到他得心應手的工具。中國是一個平均年齡只有26歲的「年青國家」，廣大中、青年與老一輩的所謂「共產黨人」，無論從世界觀或人生觀來看，都存在着相當大的「Generation Gap」。這對於將來中共「接班人」能否永遠執行「四個堅持」的的路線，不能不是一個最大的威脅。

多在80歲以上的非共產黨副委員長，更說明「花瓶黨」後繼無人。「互相監督，長欺共存」的招牌由這些來日無多的老人支撐，很難看出「長期」的可能性。顯然，這批已進入半睡眠狀態的老人，是中共手中僅有的統戰工具，非他莫屬。可憐90多歲了，還有案牘之煩惱，不能安享天年，真是「人盡其材，物盡其用」！

老朽戀權，至死不放。「幹部年青化」，只是成了騙人的鬼話。「改革」談何容易！中國問題，真是「老、大、難」！感慨之餘，得詩一首，敬贈中共「老人委員會」諸君：

十億難尋青絲漢，
六屆盡是白頭翁；
可憐含飴弄孫日，
猶在沙場苦鬥中。



從「獄」字

談到民主和言論自由

· 千山 ·

每當人們看到「獄」字的時候，都會有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在西方，行事犯對獄字頗為顧忌；在中國，却是知識份子對獄字更覺可怖，這是為什麼呢？先從中國文字構成法說起。

中國文字學有六項構成法：象形、會意、指事、形聲、專注、假借。一般來說，文字的構成不會超出這六項的範圍。如屬象形文字的（山），從象形來看便很接近山的形狀。如會意文字的（上）和（下）的構成，點在上為上字，點在下為下字，很易體會；指事文字的構成與會意文字很難區別，只是前者（指事）為間接意會，後者（會意）為直接意會。如東字，是木字加日字。日是太陽，木是樹，太陽掛在樹梢正是太陽出升的方向，為東方。這種指事文字的構成為間接會意。還有形聲、轉注、假借三類，因與本文無關，便不多做解釋。

根據以上文字學構成法，我們再來看監獄的「獄」字之構成。獄字，很易被看出是指事文字構成（獄字也有其它構成法的解釋），本文就以「指事」文字構成為解釋。獄字是由犴、言、犬三部份組合而成。犴字旁，意為犴或犬；犬字邊意為犬，而中間的言字則為言論。言論的左右有兩犬相親，可謂思想、言論被犬之包围，即不可能自由。隨便言論，結果不測而知是關監獄。獄字中間是言字，因

此人們可通過意會間接得出結論，獄主要是為「言論犯」即政治犯而設。而具有政治思想、言論尖銳的人，多數為知識份子，他們在狼犬的監視之中，沒有任何自由，他們只是被運用的工具，從來沒有獨立自我的權力。如果你言論出了既定的範圍，犬對你就絕不會客氣，一位公安部高級官員曾說：偵破刑事犯固然重要，但我們工作的重點是要放在政治犯身上，他們具有煽動性、有組織能力，對社會真正的危險是他們。

中國秦城監獄（專關押政治犯）之傳說已是眾有所聞。西方人士很難理解秦城監獄的可怖程度，也許參加過攻克法國巴士底獄戰鬥的戰士們才會體會得更深。法國的巴士底獄被看成是法國封建專制制度的代表，但它已在一百年前就被法國大革命的洪流沖毀。中國的巴士底獄（即中國的封建體制）何時攻克？待攻克之時，中國的封建體制也就徹底改變了。

民主的基本觀念

在中國，一般人們概念中的民主一詞是在統一前提下的民主，即統一思想、統一行為範圍之內的

民主的基本保障

民主——沒有個人「民主」的權力。遠在奴隸社會時代，有自由民和非自由民之分。非自由民即是奴隸，他們沒有任何自我，只是附屬於奴隸主的財產。他們沒有思想自由。總之他們的一切都不屬於自己。他們必須服從奴隸主所要求他們的一切，包括不合理的和非人格的。按古代羅馬法中說：這就是非自由民的法定權力（羅馬法中非自由民沒有任何自由，他們只是被使用的工具，因此他們的法定權力是零）。在現代社會國家裡，每個人都應享有公民（自由民）的權力。當然各個國家都還有所謂的非自由民——政治犯；但大多數國家都不能以「言論罪」判處於人。各國基本採用借其它理由關押政治犯的手段。但在共產黨國家仍然嚴重存在由於言論和政見不一，直接以此為理由關押政治犯的制度。尤其是階級專政的理論，必然導致一部份階級為非自由民。在現代文明的社會裡，國家仍然存在非自由民，這是一個國家的恥辱。「言論犯」基本屬於非自由民。中國歷代對「言論犯」均非常重視，她的文字獄聞名於世界，無論是獄字的構成，還是「獄」的實際功能都相輔相成。在歷史上，曾有很多文字獄的事件，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秦代的「焚書坑儒」。「一統」或「統一」思想是中國古代統治者政治思想的一大特點，統一意識，壓抑不同派別，是中國古代封建政治的重要標誌。其主要表現，不但掃除異己思想，甚至消滅或摧毀有異己思想的人的肉體。

凡敢於思想、言論的人，多數是知識份子。他們熱愛祖國、忠於人民，當他們看到國家的缺點，公民的責任感使他們傾出肺腑之言。如果任意他宰割和剝奪這些對國家、民族懷有強烈責任感之人士的公民權，試問蒼天，難道還有公正二字嗎？

從兩千年前的屈原到彭德懷的萬言書，中國歷史上不知有多少像他們一樣壯懷激烈的臣民，無一不是為國家、民族命運存亡，冒死進言，但結局却無一不是悲劇。可憐這些憂國憂民的「言論犯」雖在九泉，而不能安息。

統治者並不認為這些「言論犯」是在憂國憂民，而認為他們是在擾亂民心、聚眾鬧事；認為只有他們自己才是救世主。康德對這類人有過述：「他們認為，人民不應有主動思維，只能有被動思維，即在統治者的思想影響下的思維。這樣，國家、世界才不會亂。」（大意——著者譯）。依賴救世主的觀念在中國根深蒂固。

由於統治階級推行這類宣傳，使得人民消除了自我主動的思維意念。這對國家、對社會的發展是個極大的危害，因此，我們首先提倡人的主動思維。

從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已是三十四個春秋。今天的「國家學說」已不承認階級壓迫在中國存在。按鄧小平先生的話說：「即使是有，也只剩下資本家的孫子了。因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平等互助式的關係。既是如此，每個人都應享有公民的權力。非自由民在中國絕對不應存在，否則生產關係的改變，使得國家的性質跟着改變。

從何看一個國家是否是民主的呢？要看國家政權對公民民主權力的保障，在民主國家中，人人是國家的主人，有法定權力議論國家事務，並少數服從多數決議。這是民主的國家、民主的政體。怎樣保障民主——國民對國家的基本權力呢？國家對言論自由、自願投票選舉給予法律實施的保護，是民主的最基本的保障。言論自由是自由民——公民的基本權力，如果一個國家連這個基本的人民的權力都不能保障，便根本上不存在民主的意義。縱觀中國歷史，沒有一個朝代言論自由，因為統治者均把人民看成是奴隸——會說話（指在不出一定範圍的言論）的工具。

人民要對國家行使主人的權力，首先要贏得言論自由（這種言論自由是沒有任何前提下的）的權力。如果國家不能給以人民自由言論的權力和法律上的保障，這個國家的人民便不是國家的主人，而只是政權的奴隸——工具。

人民給政府領導者的權力，不是為使人民淪為政權的奴隸，而是期望着得到更多的民主。失去主人翁般的民衆的政權不能持續長久，只有讓民衆自由議論國事，給予民衆越來越多的民主權力，國家才會生氣勃勃，若不抓住這個關鍵的基本點，千瘡百孔的中國，是難以根治的。

一九八三、六、廿五

第一稿於波特蘭



一個「內定右派」的控訴

謝志揚

(一)

我在1957年之前，是北京市石油工業部北京石油設計院機械室技術員。名字用的是謝凌，謝志揚是我的「乳名」。多年來我反抗中共領導的打擊與壓迫，說他們是官僚，是專制魔王，說人事部門是閻羅王等等。因此肅反運動我被列入對象，公開宣佈我是反革命份子，進行殘酷打擊與無情鬥爭，偽造揭發材料迫我承認，長期進行精神折磨，非法被關在設計院單人宿舍裡，日夜派人輪流監視，無止境地被該院人事科程文學進行逼供信，直至被該院的保衛科人員細打和腳踢至傷。當時由於無法忍受這種殘酷的逼供，只有承認是國民黨特務。誰知一旦承認，更要追逼「事實」。於是又被迫偽造國民黨特務的罪狀，由於越來越恐怖地無止境地追下去，我拒不「交代」了，只圖一死了之。我效法了肅反時該院被迫逃出奔向鐵路臥軌自殺的孫以超技術員。但因被監視嚴密，無從實現，痛苦更甚。在再度逼供時，程文學則以「拒不交代，忠於反動派國民黨」和「從嚴」恐嚇，使我無可忍受。我繼續表示因他們是逼供，故我拒不交代。程則一怒之下說：「你有種就敢喊蔣介石萬歲，看看能不能立即槍斃你！」當時，我正在求死不得，就激情地高呼「蔣介石萬歲」！強烈要求立即把我槍斃。程又怒斥說：你有種就寫出來。我也寫了「蔣介石萬歲」！程又說：「有種就簽上名字」。我也立即氣憤地簽上「謝凌寫」的字樣。於是，他們緊張起來了，我也安心等待槍斃。至當天晚上，我被押送到該設計院的會議廳裡。事前已佈滿了人，拿出逮捕證宣佈逮捕我。但並沒有把我立即槍斃，還是押送回原來宿舍關起來，使我十分「失望」！不知今後還有多少恐怖的折磨。

我的專案五人小組是由石油部幹部司司長蘇風領導的，蘇風還能實事求是，發覺程文學的逼供是不可能獲及真實材料的。經切實調查後，給我

做出肅反結論，並且把這份結論覆印一份給我。結論中把肅反時所有逼供不實之材料作廢，認為我不存在歷史與政治問題，並恢復工作，補發工資。但是，我對結論中所謂該院揭發檢舉認為我是「思想是反動，行為是惡劣」之不實之處，要求全部取消，不能讓該院仇視我的人事科與黨委領導人在我的檔案上任意污蔑。我指出這正是他們在繼續打擊報復，完全顛倒是非黑白，不能接受。另一方面，根據當時中央「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指示，要求：第一，在什麼場合與規模錯誤地宣佈我是「反革命份子」，則應以同等場合與規模宣佈更正，恢復我的名譽；第二，我不能同意把我不存在有任何歷史問題與政治問題的結論僅限於幾個人知道，而必須在全院公開貼出，讓大家知道；第三，根處「有錯必糾」該院黨委要承認謝凌的肅反是黨委打擊報復行為所造成；第四，根據「有錯必糾」，在肅反中違反政策進行逼供訊與細打的人，必須公開認錯，並應該受到紀律處分。

但是，該院不但不承認錯誤，還堅持他們違反政策的種種做法。我又一再與上級機關石油部黨委和幹部司司長面談，並且向中共中央國家機關黨委監委提出了書面申訴。

但是，由於北京石油設計院人事科科長是當時石油部部長李聚奎的老婆，而該院黨委書記也得到李部長勢力的支持，軍閥作風嚴重，使得石油部司長和黨委與國家機關黨委監委不能主持公道，與正確處理這一問題。他們發生意見上的原則分歧，拖延了很長時間，作不出處理決定，而「反右」運動開始了。

(二)

反右開始時，叫「幫助黨整風」。由於無人敢

出來說話，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就先對敢於說話的對黨領導不滿的份子設了陷阱，誘騙他們說話，以便全部暴露，一網打盡。所以該院黨委也按既定的方針，裝出非常「溫良恭儉讓」的面孔在全院中逐個三請四請參加他們佈置好的「大會」發言，鼓勵大家出大字報，說什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保證不報復、打擊、處分」等等。全國報紙和各種中央傳達全國上下一齊配合，所有鷹犬走狗則不動聲色。

這時，不少知識份子和熱心愛護中共和國家的人士，開始大上其當。其中我也是一個。

肅反後，我的問題早已引起全院同情，人們已在議論紛紛。我又曾經在肅反後因設計院黨委壓制我的合理要求，公開貼出抗議書，初步暴露了他們的醜惡面目。該院的工程師和技術員因身受過這一切，自然會生同感，不滿情緒也甚高。這樣，也就迫使該院黨委七次派人到我宿舍邀請我參加「大會」發言。我終於被請到了。我也照實訴說一番，希望黨委改變作風，大膽自我檢討，承認錯誤，對國家對人民負責，不再搞利用職權任意整人鬥人，顛倒是非黑白的事，尤其是不要搞打擊報復和惡霸作風。在我的發言中，重點揭露他們逼供信和關起門來細鄉毒打我，並要求恢復我的名譽與把我的肅反結論公開等等。

我的發言，立即引起全院公憤。人們紛紛要求公允處理幹部問題，圍繞着謝凌問題貼出大字報，譴責領導的錯誤。

這一來，該院爲了洗脫肅反時違反政策細人打與逼供信等等的惡劣行爲，開始對我進行威迫利誘。他們多次派該院工會主席王昆玉找我個別談話，表示只要我「聽黨的話」不繼續再出大字報和公開承認所謂逼供毒打的事全是因意氣捏造而成的，「組織」自然會給我升級加薪分配家屬宿舍等等的照顧，否則，如何如何不利等等。就在這個時候，多年來求之不得的要求調家屬來京的事一下子解決了；在宿舍分配十分緊張的時候，也分配到和平里的原國務院的住宅宿舍了；還連升了兩級等等。當時，我感到他們的行爲更加卑劣。他們所給我的，也應是早給的。我早已被人爲地多次壓低工資級別，所以當然受之無愧。但此種作爲政治上的交易，我是始終不答應他們的。我還貼出大字報揭露了王昆玉的談話勾當。

大概，黨內接到中央的「反攻」文件了。原先一聲不響的鷹犬走狗這時一齊出洞了。第一炮就是對我圍攻。說我污蔑領導，一貫反黨反社會主義。找到我和國務院朋友私人通訊中寫過「天下烏鴉一



般黑」的話大造文章。把我爲揭露對全國選舉的包辦作風而投不記名的棄權票一事，查出來作爲「破壞選舉」論罪。又把我許多大字報一言一語都作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來批判。

跟着，引起了全院出大字報爲我鳴不平，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不知爲什麼，這些鷹犬走狗突然又有紀律地一齊停了下來，只是到處偷攝大字報。

後來，得知該設計院黨委向上級機關石油部黨委提出「不把謝凌給以極右份子的開除與強迫勞動處分，設計院的右派份子將無法收拾了」，企圖迫使石油部黨委的同意。但是，石油部以蘇司長爲首的領導幹部對有關謝凌問題的整個事件發生過程都十分清楚。他們本着負責精神，不同意簽署該設計院提出有關處分謝凌的要求。於是兩者發生意見的分歧。爭論持續了一個月之後，因石油部黨委蘇司長不同意而交回設計院自己決定處理。據知，蘇司長在石油部內部的鬥爭裡，被李聚奎勢力壓倒了。在把我押送勞教場之後不久，蘇司長也以「反黨集團」罪名不知弄到什麼地方了。而李聚奎也就成了一貫的毛澤東份子了。

設計院黨委憑着李聚奎軍人系統的勢力，突擊在兩天內把我打成「內定右派」的極右份子。在把我押送離院之後，相繼把所有支持過我的觀點的或同情過我的許多人，無一例外地打成「右派」份子。

這兩天內，頭一天是突然召開大會，不知何時成立的「謝凌問題調查組」無中生有地宣佈：「有關謝凌提出某些領導幹部在肅反時對他逼供與細打一事，經調查是謝凌的捏造」。另一位領導上台說：「肅反時，我們某些幹部曾細過他，是因為他不遵守監護規定亂說亂動，但並沒有打他和逼供這回事。他的所有交代都是在無人威迫下由他自己寫成的。不過，我們幹部中也有急躁的錯誤，這是承認的，不應該的。」大會草草收場了，再不容許任何人有說話的機會了。

第二天早上，又突然在石油工業部俱樂部大會堂開大會。會場軍警林立，十分緊張。用手銬銬了我押送到鬥爭台上，高呼口號之後，就宣佈我是「造謠污蔑領導、無理取鬧，開除公職，強迫送勞動教養」；立即押上了犯人的大車。經過兩三天的轉送，到了河北省塘沽附近的茶淀農場。

從此，更可怕的恐怖生活就開始了。

我的「內定右派」就是這樣被定下來的，而我當時還不知道所謂「內定右派」這個名稱。

(三)

我是1957年的秋季被送到勞動教養農場強迫勞動的。勞教場是中共和毛澤東對待異己份子執行最殘忍專政的機關。我去的是北京市最大的一個「右派」集中營。在那裡比刑事犯的勞改還要難受。不但要忍受各種不能勝任的勞役上的痛苦，還要忍受比勞役更痛苦的無盡的精神折磨。勞改尚有期限，而這種勞教是沒有宣佈期限的。所以「右派」絕望而自殺者常有出現。忍受不了這樣折磨的而又沒有勇氣自殺的人，常常變成瘋子，或抑鬱而死，或心理變態，或越獄逃跑，或被折磨而死等等。我本人也在這種折磨中，在兩次恐怖的所謂內部的「認罪伏教」運動中，引起過自殺的念頭。但由於我認識了歷史的規律，肯定了中共已經不再是什麼革命的政黨，而是變質了的法西斯統治，才堅信它總會為人民的覺悟反抗而終結，絕不會永遠存在的。所以使自己由悲觀主義轉變為革命的樂觀主義，思想上準備和他們長期鬥爭下去。有了這個信念支持，開始不為他們所謂「爭取表現，結束教養」的宣傳所騙，問題關鍵在於一是要自己能生存，二是要自己身體能更健康地活着。對於他們種種「仁政」的欺騙宣傳和誘惑，拋棄幻想，採取最靈活的多樣化的方式來抵制。這樣我才能忍受各種痛苦生存下來。否則，我早已不是被折磨而死也是殘廢將死了。

最後結果是雖然未死但身體仍避免不了被摧殘了。

我在「右派」集中營經歷了四年多的苦難，是不能盡說了的。承受力所不及的超人的強迫勞動；在攝氏零下廿多度的寒冷天氣下，監倉裡沒有一點星火；伙食太差，營養不足。每天在一望無際的風寒雨雪的鹽礮鏽土中築着「萬里長城」——防洪壩。一個又一個永無止境的勞動生產運動（所謂「大躍進」「放衛星」「勞動改造」「學先進、超先進」名目繁多的勞役）。常常下「突擊」命令，下指標，追定額，開工與收工不見天日，睡眠不足，精疲力竭。每天還要在收工後睡眠前用兩個小時，不是開鬥爭會來鬥爭完成不了定額的人，就是強迫接受管教人員的無理單調的重覆訓話。我們只能在寒風的空廣場上坐着，可是訓話的人却輪流回到設有火爐的辦公室裡取暖。這「訓話」和「鬥爭」也就成為對「右派」的一種折磨和懲罰。

由於中共一貫的政策是「製造矛盾與利用矛盾」，「右派」們為了求得爭取表現好，討好管教人員來換取早日結束教養，在「右派」群中就不斷展開你死我活的自相殘殺。使我們在工地上、在監倉裡以及在鬥爭會上，都被愚弄着。或則常常因小點的事，爭一寸床位、一口鍋頭，打得頭破血流。這也是恐怖與精神折磨的一種。我本人也經歷過這樣無數的鬥爭與折磨。

每一個「右派」被送到這個集中營時，都有一份原單位的檔案。檔案裝的是什麼，本人是不能得知的。大約相隔兩三個月，總要來一次「認罪伏教」運動。不論是冤案、錯案、偽案，一律強迫承認，自罵一番。叫作「坦白交代、提高認識」，還要追查新的材料，不斷加碼。我在被迫上台坦白交代時，堅持說真話，從側面暴露原單位領導對我製造冤案，進行政治陷害，結果遭到了殘酷鬥爭與種種威脅。白天勞動，晚上寫坦白交代和檢討材料，不准入睡。還進行監督，並用判刑加罪的公安手段來恐嚇，說我「繼續放毒犯罪」，再次強迫我說假話。如是者，四年有餘。由於我堅持不說假話，被鬥爭的次數不知幾許。

除了「認罪伏教」運動之外，還有不斷舉行的「揭發檢舉」運動，追查平日在「右派」之間說了些什麼話。於是，互相檢舉揭發，常常出現偽造材料，陷害別人，以求立功減罪。這樣，節外生枝，產生了許多新的矛盾與冤情。瘋的有之，自殺的有之，加刑的也有之。常常搞到風聲鶴唳，家散人亡。我本人在這種情況下，被認為「堅持反動立場，繼續散佈反動言論」，由原單位「動員」我妻子與我「劃清界限，提出離婚」，而被我妻子嚴詞拒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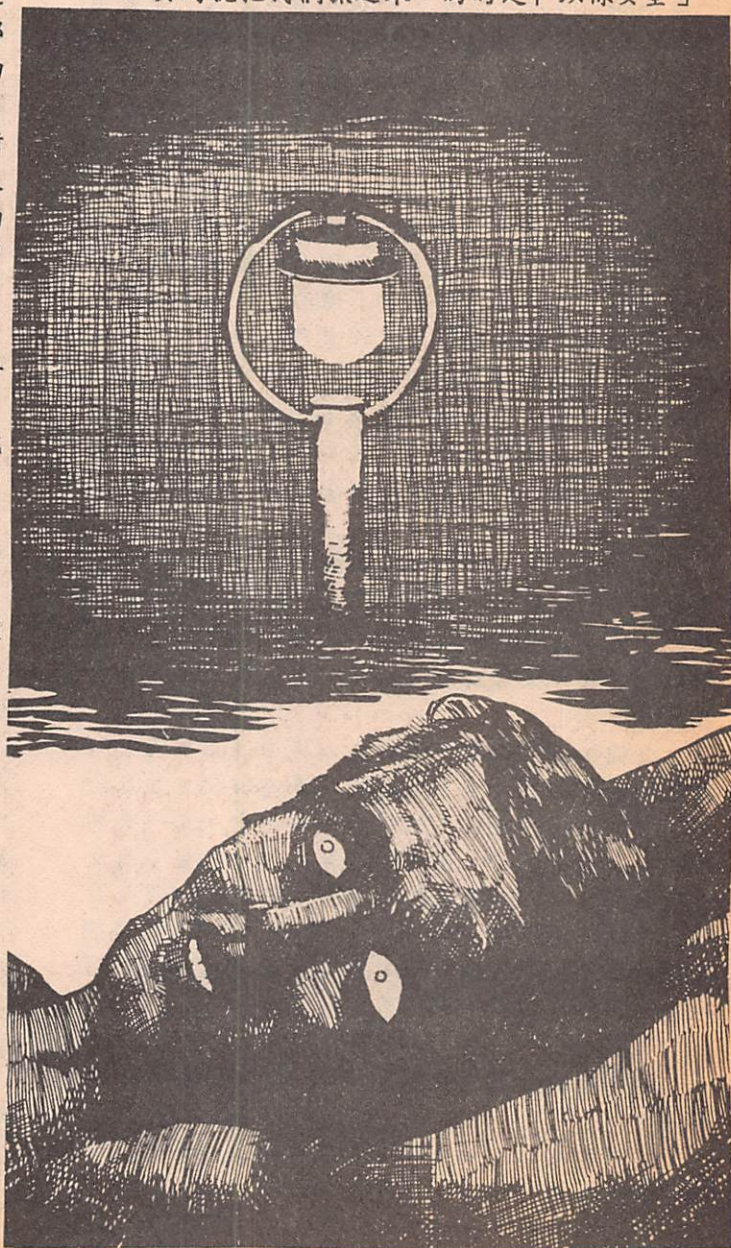
了。但亦有不少人被迫離婚帶來了家庭的不幸。由此，我妻子（與我在同一單位工作）不但早在送我去勞教前已受到牽連，因是「右派」家屬而降職，全家還繼續而受到種種更大的虐待和歧視，被剝奪享有種種社會的權力，直至下放勞動等等。在勞動中又受到不平的虐待。

我在勞教場渡過了大飢荒的時期。那時許多人是無辜死去的。當死者家屬接到死亡通知而來場取回死者遺物時，悲慘的情景使見者傷心、聞者流淚。我本人雖僥倖不死，也兩度患了嚴重的消瘦病，只見皮包骨的僵屍似的身軀。與我同組中的8人中就先後死去3個。一個壯年的軍人，平日身體最好、最強壯，勞動成績最高，但死得最快。另一個是拿着鋤頭在工地裡站着死的，又一個是睡在我的鄰鋪上，早上起床時發現死了的。又有一個時期，由於勞動時間過長，長期住在簡陋的自搭的茅棚裡，躺的是非常潮濕的地面，衛生條件惡劣，送藥與衛生人員缺乏，營養不足，一場惡性的流行性腸胃炎使一時之間死了不少人。後來才把我們一部份的「右派」分子遷到清河農場第三分場去，那是舊有的勞改場的簡陋窯洞，居住條件才有所改善。

這個「右派」集中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來自中央機關各部級單位、國務院各高等院校、新華社、出版社的幹部、教授、學生、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名導演、工程師、技術員等等的高級知識份子。與我同過組的，就有名導演王海（鬱病而死）、記者、編輯、教授、工程師等等。

當接近總結束教養時，大家最關心的是脫離專政機關的管制，所謂「回到社會去」。最高的願望是回原位或分配到別的單位工作，免於失業。大家都早已知道，像我們被專政過的人失業了是永遠找不到工作的。最害怕是「留場就業」，這無異等於「無期徒刑」，永遠被專政，連家人也只能帶進這個公安管制下的專政農場。比「留場就業」似乎好些的，就算是遣送回原籍接受農民的監督勞動了。我當時所僥倖的是身患嚴重肺結核病。身體殘弱不堪，就先「保外就醫」了。因肅反後思想受到刺激太甚，產生過自傷，入院動手術後，右手指筋斷裂已成殘廢，不能做重體力勞動工作。後又由於帶傷勞動而加深了病情。像這樣的人對專政農場來說，在沒有必要時是不受歡迎的。所以才得免於「留場就業」，交回原單位處理。而不幸的，就是結束教養後，原單位以各種方法，迫使我和全家人被遣送回原籍監督勞動。十多年後，我偶然遇見同場的人說，他們絕大部份的人被送到東北和新疆的農場去了。名又是「留場就業」實則仍未脫離專政機關。

我大約是1962年初「保外就醫」的。「保外就醫」的一般折騰，在此不說了。在1962年至63年6月期間，派出所無緣無故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場合下把我帶上手銬用犯人車裝送到北京市北苑農場這個監獄去關起來。但也莫明其妙，關了一兩個月三個月不等，又把我放回家去。如是者不知多少次了。有時，才放了幾天又關起來了。初時我以為自己又犯了什麼罪，因為每次關人都要寫「自我坦白」的，但寫了也沒有下文。後來，與同倉的「犯人」混熟了，才知道，凡是教養過的人員，不論是否結束教養，只要是居住在北京的，中共不能放心。因此，北京每有諸如某國要人來訪，或什麼節日之類，公安局就把我們抓進來，為的是「以保安全」。



而我們則恐懼萬分，家屬妻子兒女見到這般情形，終日流淚，奔走探望。探望時又必受公安人員各種恐嚇與為難。特別是天寒地凍，相隔遙遠，等前立後。有時還撲個空，不准相見。而家裡却是在貧困壓迫下，請假困難，探望一次實不容易。我原已有病，療養在家，如此折磨，對病情當然不利，此亦增加家人的極大憂慮。可是中共是不管這些人的死活的，只要服從政治需要，什麼都可以做到。

我也在這四年多的教養期中，從這一大群無所不有的「右派」人物中，得知了有關「內定右派」這回事。初時，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罪名怎樣叫法，只有自稱是：「無理取鬧」。勞教幹事也一直不稱我什麼。但是，早在入場後不久，曾是有相當地位的黨員領導人的有些「右派」朋友，在互談自己的案情時，都說我是「內定右派」，他們說，勞教場是有嚴格分類的。我們所在的清河農場三分場全是清一色的「右派」份子，沒有一個例外。他們並且把「內定右派」的不公開處理的規定告訴我。黨內把這類份子劃為「極右」中的最危險的份子，是從匈牙利事件發生後所取得的經驗。所謂「無理取鬧」也就是社會中的「壞份子」，是破壞社會主義的急先鋒。說這是毛澤東有此規定，文件中是要求嚴格而靈活對待這一類人的。為了在處理上不要引起社會上的注意與產生不利的影響，罪名從小、內部從嚴等等。還有一些「右派」說得更可怕，曰：「此類人如遇到國家危急之時，首先暗殺處決」。

這個秘密，當時我聽了既感到可怕，但又不能盡信。回憶處理過程與當時局勢，則又非常可信。不管怎樣，共產黨對我這樣的「右派」從嚴處理是無疑的。我祇望時局有所好轉，才能避過這場絕望的災難。

這個秘密的傳說，終於在以後由1963年至1981的將近廿年來的許多事實證明了基本如此。並且於1979年把我再拘留在監獄的一年半中，第一次開我的萬人鬥爭會時，由於某些原因，一些黨員違反組織原則，公開向萬人鬥爭會上的群眾公佈我是「北京石油設計院的大右派」。這時我才相信這個秘密的可靠性。事後由縣公安局作「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否認。說是什麼「弄錯」了。

(四)

以下是我全家被迫遣送回原籍監督勞動管制的經過。

1963年6月6日被遣送回原籍廣東省高要縣廣利公社水坑鄉。被管制期間情況如下：

由於不能以「內定右派」或「右派」名義公開

管制，所以在農村中只有縣委、公安局、公社的少數領導人和大隊書記知道。而公開的名義却是「因病下放回農村勞動」。

這是不利於他們公開管制的形式。因為我們在群眾中不公開自己的歷史，也不把自己看成是被管制的，仍以「因病下放回農村勞動」自居，把自己當作一般公民來行動。

於是，大隊書記執行對我的管制以及對我家屬虐待與歧視時，只能通過「非法」迫害的形式。這樣，使我有可能是作出各種各樣合法反抗的嘗試。當然，這也和時局不斷發生變化有關。儘管如此，我的全家被害仍是慘重的。但是在種種嘗試中贏得對中共更深入的認識，也爭取得到相對的自由與主動權。

這廿年來，大陸的政治運動是驚險的，也是不斷的。在各個運動中，大隊都能找到許多「理由」把我抽上台去鬥爭。每次鬥爭，都極力使群眾對我們全家人孤立歧視。我採用敢於說理反抗的態度，揭穿他們的不實之詞與誣害，暴露於群眾。結果，群眾雖然在中共全國的野蠻統治下不敢作聲，也不敢接近我們，但心中是同情與支持我們的。大隊企圖利用某些群眾的無知與愚昧來對待我們，使我們成為無形的管制份子，開始是十分成功的，逐漸，却越來越失效了。只有大隊的死黨與愚忠份子對我們進行始終如一的甚至越來越大的迫害。

這裡，我不妨舉幾個例子說明。

約68年期間，大隊在公社主任支持下，以捏造的「十大罪狀」對我開群眾鬥爭大會，迫我在大會上「低頭認罪」、「改過自新、服從生產隊監督勞動」。結果，我們全家人在會場擺事實講道理，揭露了他們是無中生有的。主持大會的書記就壓制我們發言。

又一次，大隊強迫我們全家人勞動。我們並不是害怕勞動，也不是無理拒絕勞動，而是反抗大隊唆使生產隊甚至強迫生產隊對我們強加非人道的勞動與無酬勞動。對我有勞動力的兒子，除了無理壓低工分之外，還進一步把我全家三個孩子的勞動工分，全部抵還他們所捏造出來的所謂欠「副業上繳款」一千多元。結果等於長期做無酬的勞動。我本人和我的妻子，從北京來時，就有醫生的證明，是因嚴重慢性病而失去了勞動力的不能參加體力勞動，群眾也看到了這個事實。而大隊却強迫我們做重體力勞動。所以，我們為了生存，作出各種反抗。大隊却以「不勞動則不分配糧食」（即不賣給糧食）來剝削我們全家生存的權利。

中國大陸不能自由買賣糧食，黑市糧又是非法



的，且價格高出幾倍。這種迫害手段是非常殘忍的。目的是為了迫使我们接受大隊的無形管制。因此，我們一面反抗，一面以微薄的外匯收入忍受着買黑市米過活。根據公民有購買自己糧食定額的權利（即使是犯人也有不能侵犯的糧食定額分配權）。我們向公社、縣、專區和南方日報反映並要求依法解決。從發信到親自上訪，使我認識到兩件事。第一、中共的法定是假的。人民的生存權受到侵犯時，上訴是無用的。第二、我親自到公社、縣、南方日報等處上訪時，都得到統一的答案，那就是「經調查研究，你是被管制的，應服從大隊處理，好好勞動」。也就證明了秘密的「內定右派」管制這一事實是存在的。

這種迫害長期折磨着我妻子和女兒。妻子除了原來的風濕心臟病加重之外，又患了急性腎病，經廣利公社衛生院診斷病情嚴重，囑咐立即轉縣級醫院（離廿多公里）留醫。但是，中國大陸全國一樣，農村戶口的，如果沒有獲得大隊的「外出證明」與「求醫證明」，無論那個醫院都不接收。大隊開始以各種理由藉口拖延了兩天不開證明，終於在第三天才表示「不能開給」。這使病者病情更加重了。我們被迫在沒有任何證明的情況下，把病者從廿多公里的地方，用大板人力車送到肇慶市縣立醫院去。結果因無證明而拒收。這樣又耽擱了一段時間。入夜，不要說病者無院可入，連隨同送病者的人的合法住宿也是個大問題。因為旅館也是要證明的。露宿街頭會被公安局抓去。而病者却每秒鐘都處於危險的狀態。這時，真是欲哭無淚，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我硬着頭皮，再把病者拖到約兩公里的肇慶專區醫院去，苦苦要求。同樣被拒絕接收。全肇慶也只有這兩間醫院了。絕望之餘，我直奔該醫院的急診室去，也顧不到管理人員的阻止，只是大喊救命。急診室只有一個醫生，急病的人却有三個。這些，我本能地不顧了。一見醫生就痛哭陳情，懇

求先去看看病者。幸得該醫生（後來打聽才知道是龍醫生，右派份子）立即出來看了看，才把病者抬入急診室優先急救。據龍醫生說，病者的病情是十分危急的。他答應我們證明可以後補。急救後，即辦理了住院留醫手續。出院時，病者因誤了醫期，已由急性腎炎轉了慢性腎炎了。從此，她得了這個被害的後遺症。而她的生命，却是「右派」醫生救了的。

我的女兒謝雁羽也有同樣情況。她的病是因勞動過度造成的。從在工地上突然不省人事開始，以後的過程與她母親幾乎相同，只是我們再沒有等待大隊的證明了。

十多年來，我們所受的迫害是不斷的也是沉重的。爲了要知道中央各級對我們的問題採取什麼態度，而絕對不是對他們抱有什麼希望，我把這十多年來的經過，把我們全家人對大隊和公社的某些領導人的控訴，一齊發信給「紅旗」、「人民日報」和國務院等單位。結果，「紅旗」的覆信中，說是轉交給廣東省委處理了，叫我去找省委聯繫。我接到信後，還等了半年多。由於大隊與公社又加緊迫害我們，我就決定到省委去看看。省委的「門神」經過一番問明來處與查清檔案之後，面孔不同了。他們擺出一副公安人員對待專政份子的態度說：「你只能回去服從大隊處理，此外再沒有你的出路」。這意思就是說我是專政對象，沒有道理可講。

至1977年4月27日，已是鄧小平恢復權力與「四人幫」被打倒以後了，我又突然被大隊誘捕。當日，由公社武裝部把我五花大綁押到公社的監獄去，用大鐵鍊鎖了兩天，然後再押回大隊開鬥爭會。他們以「流竄犯」宣佈逮捕我，強迫我在逮捕證上簽名，然後押送到了肇慶市木崗監獄。我被剃光了頭，再掛上「罪犯」二字的黑牌照了像，關進了監獄的第六倉。不聞不問不審有一個月，突然又從監獄五花大綁押回廣利公社的廣場上。廣場上事先在

爭台上佈置了六挺輕機槍，出動了高要縣公安局
察和公社武裝人員警衛，個個都是荷槍實彈的，
還有縣級、公社級、大隊級的各級領導人。所召集
的是全公社散居於遠近各生產隊各大隊的幹部
和農民，約六七千人左右。這個大會叫「萬人鬥
爭大會」。廣場上有兩部大卡車（貨車），是用來
載被鬥爭的人到全公社各村各鄉的角落去「遊鬥」
的。車上裝有廣播錄音器，鬥爭台上也有廣播器。
和我押來的犯人一共有六人，每人事先都掛了犯
人的牌子。

我胸前掛的是「反革命份子謝志揚」的黑牌。
我第一個被押送到台上。仍然是五花大綁地被強
迫跪在台前低頭。接着是開動錄音擴音器。第一聲
就是宣佈「謝志揚是北京石油設計院的右派份子」。
以後是羅列我各種罪名，諸如反革命份子，唆使
份子，偷盜份子，流竄犯等。然後是檢舉我的「罪
行」。大會氣氛十分恐怖和緊張。輪到第二個、第
三個上台的，全是宣判了十多年徒刑的各種各樣
的刑事犯。呼口號之後，鬥爭會結束了。緊接着就
進行所謂「遊鬥」，就是把犯人綁在車上，駛往
各村各鄉的廣場上，把車停下來，召集群眾以「萬
人鬥爭大會」的形式，重複一次。從早到晚輪迴的
鬥爭。每次都用錄音廣播器重複地說「謝志揚是
北京石油工業部北京石油設計院的右派」。

當晚又把我押送回肇慶的大監獄去。一個月後，
法官找我說：「你不是右派，在萬人鬥爭會上宣佈
你是右派是不算的。只有法院正式宣佈你是右派
才有效。但法院並沒有宣佈你是右派」。法官如此
突然找我僅僅作出這個聲明，當然我不知是什麼
用意。後來，我把自受到處分以來的事，聯繫到各
個時期與各種現象，並回憶起我在清河農場三分
場的「右派們」對我所透露的「內定右派」秘密，
才悟到這法官對我說的話，實在也是「此地無銀
三百兩」。所謂「內定右派」又一次得到證實了。

我在肇慶監獄的受難與折磨，以及怎樣坐了的
冤獄與迫使他們無罪釋放我，這裡就暫不說了。

我是在1978年10月被釋放的。釋放後，我立即
信向中央有關單位申訴，要求平反。我也估計到
他們是會堅決抵賴和拖延時日或置之不理的，所
以，按自己的計劃，每兩個月就去追一次，同時根
據具體情況進行追究。結果，不出所料，還是由
置之不理到拖延時日直至抵賴發惡、玩弄手段、
拒絕平反。

那時，我在廣東申請移民出國，將近得到美國
批准時，我決定再上京一次作要求平反的最後一
次。結果又以不承認我是作為右派處分的理由而

被拒絕了。還是堅持認為他們當時處理得「正確」
，連冤案也不能成立。他們玩弄了什麼「不要算歷
史帳」，什麼「為了『四化』向前看」等等打發我
回廣東去。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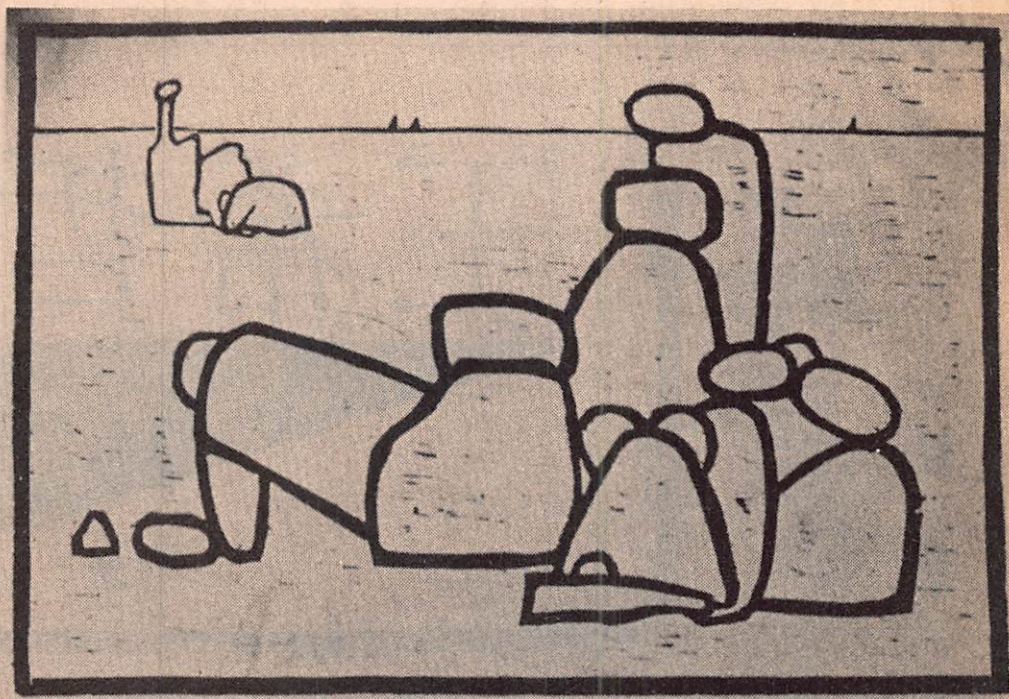
這是一個人權的問題。如果世界還有人權存在
的話，我就要向全世界承認人權的人、向世界上國
際性的有關人權保障機構提出對今天中共的控訴，
對毛澤東及其集團的控訴！再不容許任何國家把
繼續嚴重侵犯人權的罪惡行為說成是「內政」問
題而不准干涉。我強烈要求全世界的人權組織有
效干涉這種侵犯人權的「內政」。人民不是某個
國家統治者的私物。某些國家的統治者對本國
人民的人權侵犯，就是對人類的侵犯，對世界文
明的侵犯！為此，我提出如下呼籲：

1. 要立即清算中共有史以來的侵犯人權的罪行；
2. 要立即制止中共繼續以任何形式侵犯人權；
3. 要求中共立即釋放以任何侵犯人權的形式所
造成的一切政治犯、思想犯，例如魏京生、
王希哲、何求、羅孚、戴枕等等；
4. 要求中共立即公佈尚未平反的「右派」和「
內定右派」的名單，並且予以徹底平反，且
不得以任何藉口拒絕或拖延！
5. 全世界的人權維護者團結起來、組織起來，
尤其受過中共侵犯人權的人，積極揭發與批
判中共歷來侵犯人權的事實，以求徹底擺脫
人類的法西斯災難。



化石

土
申



我立了十年，變作一頭化石。在北方寂寞而全不出色的山嶺上，不能自己的被日子留住，我眺望遠處西江流水，站過三千六百五十個黃昏，苦戀明日的第一線晨光。

一天，孩子來了。在山嶺另一邊走來一個約五、六歲的女孩子。布衣褲一色樸實地蓋在身上，又稍嫌單調了些兒。跳著輕慢腳步，她走到我眼前，亮著萎瘦眼睛看著我好久，露出為難的樣子，躊躇在決擇之間，她終於緩緩地把手伸進到褲袋內，搜出一把種子。五彩色的種子，有紅色、有白色、有藍色、有……，還有幾種未及命名的顏色，抖一抖，滾落在我身上。她被我的身體感動了，我剛毅的外表贏取了坦率的信任。她是如此深信終有一顆種子，會萌長出芽來。她認為最健康的生命，祇

能由最堅強的地方裏來。沒有鋼、沒有鐵的山頭上，她欣然地選擇了我這塊石頭。

日子過去了，她亦來過無數次。但種子在未枯萎前，已不知被風捲到那裏去。因為我祇不過是一頭化石，更是置棄在最荒蕪的稀嶺上。吶不出喊！因為我是一頭化石，哽泣也不能夠！

十年人事幾番新！

十年人是幾翻身？沒想過！被「良心」化石了我。遙遙地，我嘆一口氣。十年了，孩子們不知變了什麼樣子？活過的，現在還活著嗎？

可悲的是我，擁著十年前的理想，良心仍是一樣的良心。

沒背棄「良心」，却賣出了十年的日子。

(電影文學)

王希哲

作者：小 楓

路漫漫兮修遠
吾將上下而求索
——
屈 原

(續)

(中山五路百貨商店的櫥窗前。一張長達幾十張的大字報把一溜玻璃櫥窗全遮盖了。大標題是「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署名李一哲。下面是密密麻麻的群眾圍觀如堵。和遠處的署名「宣集文」的市委宣傳部的大字相映成趣。它的題目是「一株瘋狂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李一哲大字報」，前面一個觀眾都沒有。只有那個便衣特務靠着牆在吸煙)

(酒鬼吃力地擠出觀眾群。搖搖晃晃地走到「宣集文」的大字報前。醉眼朦朧地掏出一支斷截鉛筆來。在大字報上批了一行字。)

便：(一直在偷偷注視他)喂。你在寫什麼？

酒：(頭也不抬)李一哲永垂不朽。

便：你瘋了。

酒：我的意思是李一哲快要死了，這是死人花園上的字，嘻嘻……。

便：你……。

(四)

(一九七五年，料峭春寒)

(省委保衛組辦公室內。方處長和李國。)

李：市委宣傳部那幫「秀才」都是飯桶。那麼多個理論專家，鬥不過三個毛娃娃。現在不單是廣州，全國都知道了李一哲大字報了，聽說北京、上海也蠢蠢欲動了……。

方：你也不能這麼說……。

李：我看乾脆把他們……(附在方的耳旁)

方：不行。

李：我敢打賭……。

方：(架起腳在桌上)好嘛，就賭你剛搬進去的那間華僑新村的房子……。

李：你……(臉色一寒)。

趙：(推門進來)賭什麼？

(兩人急忙跳起，立正。)



方、李：首長。

趙：（笑）你和他賭什麼？

李：（搔搔頭）我們說着玩。我看我們對李一哲還是要「有利、有理、有節……」

趙：（哈哈大笑）你不要怕，你已經贏了。（突然地停下步來）（嚴肅地）押起來，但不是關進監獄。關在單位裡，不准出來串聯活動。

方：您是說：軟禁？

趙：不，共產黨人不搞軟禁。這是「群眾專政」。這是主席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一種發展創造。

李：（擊掌）真高。他們不能再出來貼大字報了。

方：也不能「串連」了。

趙：（對方）馬上訂一個計劃，把李一哲大字報印發到各單位，組織各種形式的批判大會。你對省、市委宣傳部和黨校說去，批不到李一哲他們就下放。在黨校學習的，不能畢業。

方、李：是。（互相使了個眼色，轉身要走。）

趙：回來。

（方、李轉身回）

趙：主席說：「要文鬥，不要武鬥」，特別是你。

（用手點點李）

方、李：是。

（趙目送方、李走出，陷入沉思。電話鈴聲，

趙拿起話筒）

趙：喂，誰呀……小鐵他媽？……對，是我呀，沒人在旁邊……什麼！……你說什麼？……小鐵他……他牽涉進「李一哲」的外圍？……不可能！……誰說的？……不行！……政治局已經表態了，……你得馬上把小鐵關在家裡，不准到社會上去，……對，對，……你親自打個電話給老張，小鐵的事不准漏出去半個字，……我馬上就回來教訓教訓這小子。……

趙：（放下電話，急急地來回踱步，搓着手）「自古忠臣出逆子」，「自古忠臣出逆子」！……

（方、李正在步出省委大樓，坐進軍用吉普裡去）

李：喂，老方，剛才你說到我住進的華僑屋……。

方：（一拍他的肩膀）開開玩笑，開開玩笑嘛，咱們老哥嘛，還不放心嗎？哈哈……。

李：（表情複雜）……。

（劉華的女友客廳。一次「地下」的舞會。昏黃的燈，窗戶都用黑布遮住，以防聲和光的洩露。一台老式的錄音機，正在播着「送你一支玫瑰花」。一群青年正在婆娑起舞，看得出來，這是一場龍蛇混雜、衣着奇特的社交娛樂，既有過氣的香港牛仔服裝，又有顯示身份的高幹子弟們，質地好的軍裝和便服。然而他們恍惚都忘掉了階級的界限、「舞場」的狹小與舞技的蹩腳，一齊沉醉在這種偷來的「娛樂」中。漂亮的女主人跳得最出色，像蝴蝶一樣穿梭應酬。此時，她在和一個穿海軍軍官服的對跳。）

女：你們「海司」的好開通，不像（廣州）軍區大院裡的那幫「老土」。

海：哪比上你風流。

女：別笑我了。你看你的領章，只脫下了一邊。那是國旗的象徵哪！「省委書記公子」！

海：（一摸自己的領章）糟糕，脫了一邊，忘了一邊。

（鏡頭移到牆邊沙發上，一邊坐着劉華，他專注地奏着電吉他，為音樂加重節奏。一邊坐着王希哲和鄭明。大概是怕人認出罷？王的工人帽拉得很低，還戴了眼鏡。）

王：都是你，帶我來這種地方。（拿起杯喝了一口）無聊。

鄭：輕鬆輕鬆嘛，人家劉華是好意。

（劉華的女友「飛」了過來，大咧咧地倒在沙發中，熟練地點起一根烟）

女：怎麼？不玩玩？

鄭：想坐坐。

女：喂，你們最近有什麼好玩意兒？

鄭：沒有哪，大多坐在家看書。

女：（微笑）看什麼書？哦，我明白了，「國家與革命」？「反杜林論」？「資本論」？……

王：（不滿地）你呢？

女：（挑戰地長長地噴了一口烟）我看「茶花女」、「基度山恩仇記」、「金瓶梅」……。

鄭：你怎麼不看看「紅樓夢」。主席說這是一本好書。

女：哎，魯迅說「金瓶梅」更好，是四大奇書之一。

劉：（轉過面來，沉聲喝道）你給我滾開。

女：（順從地）走就走。鄭明，來，跳舞去，我教你。

（兩個姑娘到跳舞的人群中去了）

（音樂聲已轉為香港的流行曲：「午夜吉他」）

王：喂，劉華，說實在的，你怎麼甘心跟這些人（把嘴往舞場一嘍）成天混在一起？

劉：你管不着。

王：你真的認為他們是對的嗎？這些頹唐派。

劉：（重重地彈着吉他）是的。

王：你們就這樣來反對林彪、黃永勝？喝酒、打牌、學英文、跳舞、偷渡……。

劉：（啪的一聲，停住了吉他）你甭說了，這又怎麼樣？你有你的想法，他們有他們的。

王：我們應該相信毛主席能挽回現在這個局面。

劉：收起你的那一套吧，中央裡沒有人能挽回。

王：（誠懇地）劉華，想當初，文革初期，我們起來造反……。

劉：（打斷他的話）想當初，又怎麼樣，我們受了騙！我們不再受騙了！

王：（氣得滿臉漲紅）你！

劉：在這一點上，我們沒有共同語言。

王：劉華，你不要忘記，今天是你請我來的。

劉：（冷冷地）是的，我過高估計你了，我以為你和李正天不一樣……。

王：你滾！

劉：不是我滾，是你出去，出去好好的跟着毛主席幹革命！

（王一挽袖口，想打）

鄭：幹什麼？幹什麼？你們想幹什麼嘛，玩得好好地……。

王：（一摔手，轉身就走）

鄭：對不起。（一直追出門外）小王，小王……。

（舞場裡又響起悠揚的流行曲：「東風吹，又染紅了花蕊……」）

（一月的午夜，寒氣逼人，風把中山五路邊的大字殘骸吹得破爛不堪，只隱約看得見半個大標題和副標題：「七評宣集文——李一哲」）

（鄭明氣咻咻地追上了王希哲）

鄭：你怎麼了，你這個人真是……。

王：都是你！

鄭：人家有人家的想法嘛。劉華也是在「反抗」。

王：這是什麼「反抗」？我和他的「分歧」在於對毛主席的評價！

鄭：你不是也說過「毛主席是人不是神」嗎？

王：可是他是個偉大英明的人。林彪錯在把他「神」化了。錯誤都是下面這幫人搞的。

鄭：劉華問過我：「他」就沒有錯誤嗎？

王：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發現。就是以後他有了，我也相信他會自己糾正。

鄭：好，好，好，我不跟你爭論了，好好的想出來樂一場，弄得怪沒意思的。

王：我說過不願來這種地方的嘛。

鄭：我覺得最近我們愈來愈談不攏。

王：那就分開好了。（停下脚步）

鄭：你……。

王：明，我想革命的伴侶應該是志同道合的，要是你喜歡跳舞的話，你回到他們那裡去好了。

（鄭一頓足，回頭就跑。）

王：鄭明，鄭明，（急追兩步，停了下來，嘆了一口氣。）

（鄭跑向黑暗的街道，只有在昏暗的街燈下，才看得見她閃爍的淚花。）



（王垂頭喪氣地慢慢走回家去。）

（他走到家門前，正想敲門，角落裡轉出四個頭戴鋼盔的工人糾察員，把他圍住）

工：你是王希哲嗎？

王：……。

工：你被捕了。（四人動手）

王：你們有逮捕證嗎？（一邊掙扎）

工：（用手中的紅白棍指指臂上「工糾」的紅臂章。）

王：你們不要無法無天！

工：對！對你我們就是要「和尚打傘」。押走！

（廣州，河南康樂園，中山大學。校道兩邊綠榕，校園中心是孫中山先生拿手杖的銅像）

（鏡頭移到中大禮堂。裡面正在開鬥爭大會。會場掛滿紅綠標語，又是什麼「打倒李正天」「鬥垮鬥臭反革命份子」之類的口號，一個幹部模樣的人坐在主席台上主持，李還是永遠穿着他那套不合身的軍裝、大皮鞋和深度眼鏡，這次批鬥會比以前「文明」多了，讓李坐在一張矮凳子上，後面站兩個「工糾」，並沒有按頭綁手之類的「儀式」。）

主持者：今天，我們要批倒批臭李一哲的反革命言論。李一哲不是口口聲聲要「民主」嗎？我們今天就給他最後一次的「民主」，他不是叫說要「公平」的「辯論」嗎，好，我們今天就以平等的地位來辯論，看看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

李：（霍地站起來）慢着。我有話說。

（主講和全場都愕然，後面兩個打手想動手，被在第一排座上的方處長和李國用眼色制住）

（李一手抓起那張矮的出奇的凳子，端到講台一放，把主講者的高凳一下端過來，自己坐上去）

李：你說「民主」、「公平辯論」。為什麼給我坐一張帶侮辱性的矮凳子……。

（場內群眾從愕然中驚醒，都哄笑起來。）

主：（惱羞成怒，但又怕打亂批鬥的發言）住嘴，不准笑，剛才會前不是「約法三章」不准笑嗎？要同仇敵愾……。

李：哦，原來這種所謂的「公平民主辯論」是預先策劃好了的。

主：誰說的。

李：你說的。

（眾又哄堂大笑）

（李國在下面急打眼色，台上台下幾個人連忙跳起來，領呼口號：「打倒李正天！」「打倒李正天！」眾連忙應和）

（廣州珠江邊，來往如鯽的機帆船。廣東魚鱗

廠。廠禮堂內。同形式的批鬥會）

（身穿捲起袖口的工人服的王希哲，他一如往昔，越是在亂哄哄的大場面中，越是顯得英俊瀟灑神采飛揚，和後面押着他的打手的橫眉立目恰成對比。）

主講者：王希哲，你知道嗎？你已經是第二次走上這種歷史的審判台了。

王：你說錯了，是第五次，就在這文革的幾年裡。

主：（對群眾）看！他承認了，已經是第五次受到人民群眾的批判。

王：對不起，你又說錯了兩個字，不是「人民」，是「你們」。你們不能代表人民，不能代表廣大的「工農兵」群眾。

（方處長和李國又在下面作手勢）

主：（領意）好，我們就讓老工人來說說看。

（一個老實忠厚模樣的老工人上台，全場靜，王希哲也靜下來）

工：（巍戰戰地從衣袋裡拿出毛主席語錄）首先，讓我們敬祝我們的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舵手、偉大統帥，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群眾急急忙忙七手八腳地掏語錄，應和着「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工：敬祝我們的……

（他老糊塗，這是前幾年叫慣的「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永遠健康！」口號。）

工：（猛醒）嘔！不對，呸！我檢討！

（眾哄然大笑，觀眾席上劉華旁邊的女友笑得彎了腰）

（方和李國面面相覷）

李國：（咬牙切齒）膿包，誰的好主意，讓這老混蛋上台的。

（主持人偷眼看看方和李的怒容，拿出手帕來擦額上的汗）

工：同志們，不要笑，我要用我在解放前的親身經歷，用階級苦，階級仇來控訴工賊、叛徒、特務……嘔，不對，……叛徒、特務、工賊、劉少奇的反革命路線，來控訴「李一哲」的反革命罪行……）

（他一邊說一邊彎腰拉起褲腳，把腳抬到講台上）

工：看，這就是四十多年前，我當工人時被資本家踢的傷疤……。

（台下有些人又忍俊不住）

(會場觀眾後面有兩個女民兵，她們摟着「工糾棍」在胸前，倚着牆在「警衛」。其中一個上身穿工糾裝、武裝帶、胸章、袖章，下身却是香港流行的緊牛仔褲，顯得不倫不類。她嘴裡「波，波」地吹着進口的口香糖，我們姑且稱之為女甲。)

女甲：哼，老土，丟人現眼。

女乙：噓，不要那麼大聲。

女甲：怕什麼？他是我的老子。在家裡動不動就拿出這一套老黃歷。煩死！

(鏡頭轉到台上)

王希哲：老伯伯，你過去受過的苦，我們很同情。可是(微笑)要是林彪一伙上了台，你不又要遭二遍苦，受二茬罪？

老：對呀！……

王：所以你要反對林彪、黃永勝一伙。

老：對。……

王：我也要反對林彪一伙，大家團結起來共同對敵。

老：對，對。……

(台下又亂了起來，主持人又急得出汗，方、李在細語。)

王：那我們都不能把矛頭對準要求民主，要求說話的年青人，我們年青人有什麼罪嘛！……

老：對。……哦……不對，不對……

主：(一個箭步，邁到講台，把麥克風搶過來)時間到了，老伯伯請回去。把王希哲押下去。

(對面露微笑的王希哲喊：)王希哲，你別囂張，我們明天再開會，一定批倒你！散會，散會……

(全場起身，主持人一手拉住旁人，附在耳邊說「跟着那小子回看押房，給我修理修理。」那人說：「是。」)

主：(又撲回麥克風邊)大家慢走，慢走，還有一個廠革委會緊急通知：全廠停工三天。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理論，批倒李一哲。先抓革命，後促生產。……

(可是他的聲嘶力竭，已淹沒在全場亂哄哄的散場當中了)

(五)

(監獄。一輛黑色的轎車開到大鐵門前，「嘎」聲停下。一個軍官下車，打開車門，車上押下戴着手銬的王希哲。大鐵門開了，走出一個看守員。

他帶着一個登記表。)

看：(托托眼鏡，垂着眼準備在表上寫，木然地)姓什麼？

王：王希哲。

(看守一巴掌搥過去。打在王的臉上，王撫着一邊臉孔，愕然。)

看：(托托眼鏡，依然是垂着眼簾，看着登記表。)

王：王……

看：(在表上寫，頭也不抬)名什麼？

王：希哲……

(牢房裡，橫七豎八躺着囚犯，王希哲被推了進去，一交摔在地上，挾着的書包裡的書散了一地，那是「毛澤東選集」「列寧選集」……)

(犯人們默默地注視着他一本本地撿起書來，連身體都沒動一下)

王：(想找個位置躺下)勞駕。

(沒有人睬他，甚至連目光都是呆滯的)

王：(對一個大個子)勞駕。

(大個子木無表示。旁邊一個滿臉橫肉的犯人突然飛快地勾了一下王的腳踝，在王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時，就一個「狗吃屎」便在地上了，書又散了一地，王伏在地上抬頭望望，四周還是那種麻木的眼光。)

(牢房門打開了，獄卒在叫：「開飯了」、「開飯了」，接着是飯盒推了進來，每盒三兩，光只是飯，沒有菜，這是中國大陸的監牢規定，再加上各級直至廚房的克扣，盒裡的份量便是可想而知的了，犯人們都瘋了一樣，爭先恐後的搶着拿，狼吞虎嚥地吞。王希哲也餓了，拿着自己的飯盒馬上就打開。誰知，旁邊伸來一隻手，一把在王的飯盒裡抓了一半，王抬頭，原來那大個子已經吃完他自己的，正把搶來的飯團往口裡送。王大叫，獄卒連忙上前喝止，但飯團已被咽下。獄卒敲了他兩棍子，混亂中，王的飯盒也摔在地上，飯粒散了一地)

獄卒：你們這群狗！(對王說)等下頓吧。

(轉身出去了)

王：……(望着其他犯人正在地上一粒一粒將飯搶起往嘴裡送，搖搖頭，躺下，拿出書來看。)

(大個子挨到王身旁躺下。)

大：你不應該把那剩下的也摔了，這個地方，你不強，就沒吃的。

(未完待續)

CHINA SPRING

TABLE OF CONTENTS

Vol. 1 No. 5 August 1983

The Four Modernization and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of the Ching Dynasty.....Editorial Board of China Spring

DOMESTIC COMMUNICATIONS

A dirty trick behind the negotiation of the hijacking incidence.....China Spring Commentator

Let me edit another "A Selection of Deng Xiao Ping's Works".....Liu Ping

The New Life Movement and the Five Moral and Four Beauties.....China Spring Resource Center...

OVERSEAS STUDENTS' FORUM

Summary of a panel discussion by students from the PRC.....China Spring Resource Center...

Some thoughts on studying abroad for a second time.....Liu Zhen.

A letter to Mr. Hu Yao Bang.....Na Ming.

THEORY AND PRACTIC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of Marxism.....Sha Lin.

Which one is better, the New or the Old?.....Qiung Wang

Some comments on the policy of fixing of farm output quotas for each household.....Yi Wen.

ON THE MAINLAND OF CHINA

A second wave of "Going and Working In the Countryside".....Shu Shen..

Distribution and Wages.....Editorial Board of Xiao Cao....

Democracy under dictatorship?.....Chen Wei.

ON TAIWAN

Was Han Yu Chinese?.....A Xiu Bo....

ON HONG KONG

Fat Sheep, Fox and Wild Boar.....Mu Sheng.

When will the secret trials be ended?.....Wei Yang.

THE FUTURE OF OUR MOTHERLAND

A different opinion on the federal system.....Xiao Sheng

One Party Dictatorship and Two Party Co-rule.....Wang Yun.

LETTERS TO THE EDITORS

Encouragements, Criticisms and suggestions to China Spring.....

ESSAYS

Good Luck, Mr. Hu.....Shao lin.

An effort to lower the mean age of communist cadres became a joke.....Wu Jian X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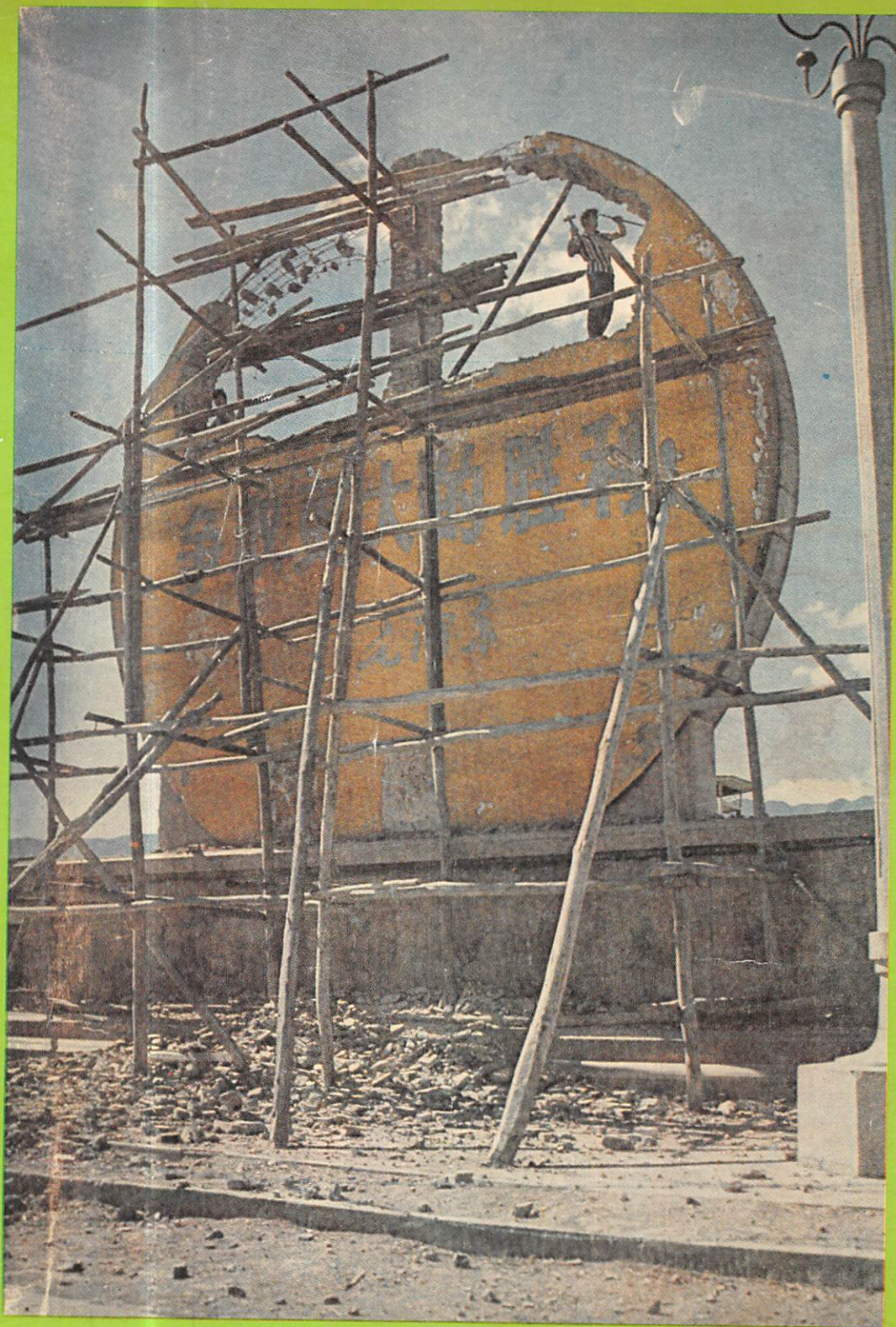
From freedom of speech to jail.....Qian Shan

SPECIAL REPORT

Accusations of a so-called "Rightist".....Xie Zhi Yang..

LITERATURE

Wang Xi Zhe (play).....Xiao Feng



爭取更大勝利 (攝影)

編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主編：汪岷

通訊處：P.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Y 10185
U.S.A.

電話：(212)507-1914

定價(零售)

美國：2.00 美元

加拿大：2.00 加元

香港：4.00 港元